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财经新思维

余丽生 / 著

CaiJing
XinSiWei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新思维
余丽生
PDG

余丽生 著

财经新思维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经新思维 / 余丽生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58 - 7990 - 4

I. 财… II. 余… III. 经济 - 研究 - 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7014 号

责任编辑：金 梅 莫霓舫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财经新思维

余丽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三佳集团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8 印张 180000 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 - 7 - 5058 - 7990 - 4 定价：2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换种思维看财经

记得高尔基曾经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歌德也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约翰生甚至认为：“一个家庭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里没有窗户。”在中学时代，虽然家庭不富裕，也没有什么藏书，但却使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还曾经有过文学的梦想。

进入大学，学校的图书馆使我大开眼界，世上竟然有这么多书，我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我开始了真正的读书，各类书籍都有所涉及，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尤其是开始接触财经专业以后，财经书籍引领我走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世上原来还有比



文学更吸引人的书籍、比文学更接近社会的书籍，以前的我是多么的渺小和无知。我开始全面而系统地学习，虽然不能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但也没有浪费光阴，读了一些书籍，应该对得起学校的图书馆，对得起学校提供的读书条件。是大学的读书生涯，使我懂得经济理论不仅能够改变世界，而且能够创造世界，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科学，这使我确立了从事财经工作的人生目标。

唐代诗人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参加工作后，读书的习惯一直陪伴着我，不仅读有字的书，也开始读无字的书；不仅读书本，而且读社会实践的书，开始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大学学习。就像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利用可能的条件，到基层、到乡镇、到农村、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向基层学习，向改革开放的实践学习。在调查研究的同时，我也开始了真正的财经研究，撰写财经方面的调研文章，成为财经理论界的一员，从一个读者转变为一个作者，既是读者，又是作者。

从大学读书期间算起，从事财经写作一晃已20余年。在20多年财经工作实践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虽然财经的书越来越多，但有些财经的书和文章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缺乏可读性，导致财经读者的队伍越来越少，财经书籍的发行越来越困难。

我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换种思维看财经”。能否改变这种现象，给财经增添人文色彩，增加思想性，使财经文章和书籍更有可读性，不能埋怨，也不能抱怨，得靠你、我、



他——大家的努力，不少经济学者已开始这方面的努力。我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利用“别人喝咖啡”的业余时间，主要借助于“财经热点问题”和“地方财经创新问题”两个平台，利用财经随笔的形式，开始了财经研究，开始了财经写作，力争达到认识的创新、观点的创新、方法的创新，使完成的研究成果有内容、有思想。

一是借助“财经热点问题”这一平台。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主要研究发展问题，即“发展经济学”，它必须和国情结合起来，和发展的热点问题结合起来。也只有和热点问题结合起来，才能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服务，才能用于指导实践。财经研究要敢于抓热点问题，要善于抓热点问题，这是财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借助“地方财经创新问题”这一平台。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的不少改革是从地方、从基层开始的，在地方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再总结经验，进而推广。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选择，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可以避免泛泛而谈、纸上谈兵带来的改革风险，这也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法宝。改革的思路不是闭门造车能够制造出来的，它更多的是来源于实践，不少地区在改革中，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改革成果丰硕。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及时吸取这方面的失误和教训，这也是财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在财经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有关财经研究方法论的书籍很少，这和庞大的财经理论工作者及实际工作者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是一些经济学者没有时间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也许是一些经济学者不愿意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不少人曾经向我请教过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我也曾经向不少人毫无保留地介绍过这方面的体会，在财经研究的普及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在内部刊物发表的“关于财政课题调研及其撰写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还被多处转载。但这种努力毕竟是有限的，在此基础上，我对财经研究的方法论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把体会和经验总结提炼出来，与更多的人共享。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而是所有财经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事，是大家的事。

如何使经济学的书籍和经济学的文章让大众看得懂，让经济学走近普罗大众，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努力，需要财经理论界和财经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虽有这方面的想法，也开始向这方面努力，但只能算是开始，离实际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依然需要实践的检验，需要读者的检验。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说过：“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人将各有两种思想。”作为一家之言，我愿意把我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本书主要是我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



本书之所以取名《财经新思维》，不仅体现在选题的新，这些财经选题都是社会比较关心的话题、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前改革开放中的热点问题，而且体现在政策见解的新，笔者对许多财经问题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见解，有新的政策主张，且政策建议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同时，体现在研究方法的新，本书虽够不上完全意义上的随笔，但和学术论文不一样，贴近随笔，可读性强。

在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只有中华文明保持了文明的连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本世纪，中华文明又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机遇。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去解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遇到了好时光，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理应展翅飞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小平同志说过：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成功的实践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照搬，一切得靠摸索。这给经济学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给经济学者提供了探索问题的机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肯努力，只要肯付出，一切皆有可能。

本书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有关报刊发表，有些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我把它们整理出来，奉献给：



世纪新思维

伟大的中华！
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

余英生

2009年9月15日
于杭州古韵·河畔居

世纪新思维

目 录

换种思维看财经 / 1

望 财经热点冷思考

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必须明确方向 / 3

创新地方政府理财思路 / 11

基层财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有抓手 / 20

农村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 33

给农村学生“上大学难”支招 / 40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改革待破题 / 49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财政有作为 / 60

治理收费公路财政责无旁贷 / 67



财经创新理思路

- 独具魅力的省管县财政体制 / 85
- 综合改革强财政 / 96
- 消赤化债活乡财 / 108
- 爱你没商量的教育券 / 119
- 众说纷纭消费券 / 129
- 素质提升促转移 / 141
- 推陈出新话扶贫 / 154
- 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待中等职业教育 / 166

财经评论献良言

- 应对金融危机财政先行 / 177
- 宏观调控的重大举措 / 181
- 防范财政风险不放松 / 184
- 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188
- 大力发展资本经营 / 191



以经济结构调整提升经济素质	/ 194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197
必须重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	/ 200
推进再就业工程建设的财政作为	/ 203
贫困地区财政要振兴	/ 206

切 财经研究传真经

大兴财税调研之风	/ 211
财税调研无捷径	/ 216
财税写作觅路径	/ 222
财税课题研究不神秘	/ 230
经济学能走近普罗大众吗?	/ 237



财经热点冷思考





公共财政改革和 发展必须明确方向

俗话说：不能只顾埋头拉车，必须抬头看路。否则，会犯南辕北辙的错误，结果是“欲速而不达”。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也不例外，只有方向明确了，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

所谓公共财政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用通俗的话说是“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的财政逐步向公



共财政转型，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加快了公共财政改革的步伐，公共财政新框架开始在我国各地逐步建立。未来的公共财政怎么改？尤其是地方公共财政如何改？如何让公共财政从理论走向实践，制定公共财政改革路线图，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这是各地公共财政构建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是地方政府必须正视和回答的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作为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被提出以后，全国各地都加大了财政改革的力度，积极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努力。但如何构建地方公共财政，各地的思路 and 做法并不一致，不少地方感到茫然，甚至出现了一些实用主义的做法，对公共财政存在不少曲解，认为“公共财政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种“只变形式，不改内容”的做法，对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会导致人们对公共财政的误解和公共财政改革方向的扭曲。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可以说使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豁然开朗。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明确地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一项具体任务提了出来。应该说，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公民对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治安、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公共服务的需求。但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等于“平均化”，是大体均等或相对均等，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内应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直至全省或全国的制度统一。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个过程，是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朝实现的，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必须朝这个方向前进。

城乡一体化——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立足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据统计，1950～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大约从农业上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向农业支出1577亿元；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额4500亿元。改革开放以后，1979～1994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取得大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农业支出3769



亿元，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值约 12986 亿元。1994 ~ 2000 年，国家向农业投入 5986 亿元，农业缴纳税金和地方费用 9733 亿元。在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公共交通、消防、绿化）时，一般不会要求居民负担费用；当城市兴建公共投施（如道路、桥梁、学校、公园）时，居民根本不必承担任何费用。而农村则不然，不仅公共服务十分有限，公共设施十分落后，而且是最必要的服务和最简陋的设施也要当地农民负担。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严重短缺，地方财政实质是城市财政。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公共财政加快了向农村覆盖。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各地先后实行了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让农村居民真正感受到地方公共财政的阳光。但从这些制度本身来看，仍没有脱离城乡“二元”结构的阴影，仍然是城乡两种制度、两种身份，双线运行。

按理说，公平分配税负和提供公共服务与公用设施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尽量为所有公民（包括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公民）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城乡两种制度、两种身份显然是不符合地方公共财政发展要求的，但有了制度比没有制度是一大进步，有差距的存在，说明改革还不彻底，发展还不完善。下一步是城乡两种制度、两种身份的磨合、衔接和统一。设计城乡一致的公共制度，逐步出台城乡一体化的财政政策，这是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立足点。



区域功能化——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必由之路

区域经济如何发展？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全社会，各地在公共财政构建过程中，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有不少教训值得总结。如我国在地方发展经济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现象，到处建开发区，到处建工业园区，到处招商引资，导致不少地方出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甚至是环境污染。又如在发展农村教育过程中，不少地方建了不少学校，甚至村村建小学，引以为自豪的是在不少农村最漂亮的房子就是学校。但好景不长，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学龄儿童减少，农村整合教育资源，不少农村学校招不到学生，教室成了摆设，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再如，在目前推行的新农村建设，地方政府按要求为农村通了电、通了有线电视、通了自来水、通了电话等，但有些地方由于农民家庭收入低，农民用不起自来水、用不起有线电视，户户通自来水、通有线电视也是徒有虚名。至于康庄公路，问题也有不少，如对居住在高山远区的农民，国家花了大量的资金，修建了农村康庄公路，但由于安保措施的不到位和地质灾害的频发，有些康庄公路的效果难以显现。同时，有些康庄公路也破坏了山区的生态。如何规划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给地方公共财政构建带来新的命题。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指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思路，地方公共财政构建必须转变



观念，更新思路。按照区域功能化的要求，正确认识发展问题，树立绿色 GDP 观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在某种程度上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保护好青山绿水也是发展。对生态屏障地区、对西部地区，国家提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这也是发展。浙江省对全省主要的八大水系上游地区的 45 个县市（区），根据生态公益林面积、水域面积、空气质量等指标，省财政给予财力转移支付，这也是对保护青山绿水的支持，对保护生态发展的肯定。这些都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在构建地方公共财政过程中，必须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进行合理规划。对工业发展要进行合理的集中，通过建立工业园区的形式，实现公共资源的共享。对居住在山区、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村居民，不是一味地进行“输血式”的扶持，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让这些农村居民整体搬迁，异地脱贫，这才是治本。如此等等，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才会日新月异、前程辉煌。

全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

——地方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的

改革是为什么？发展又是为什么？这涉及改革观和发展观问题，这是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财政构建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改革和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达到共同富裕，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有市场缺陷，会出现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需要政府的调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哪些是弱者、是弱势群体？应该说，我们的一线工人，我们的农民，以及那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城市的“三无人员”和农村的“五保对象”等，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公共财政政策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的要求，进行调节，达到社会的和谐，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应该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地方公共财政加大了对社会分配的调节，建立了更加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对农村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农村特产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困难居民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三无人员”和农村“五保对象”纳入了财政供养，等等，公共财政覆盖到城乡、覆盖到各个社会群体、社会各个阶层。今后，地方公共财政要加

大社会分配的调节力度，一方面，要强化对社会的强势群体调节，通过开征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特殊行业暴利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另一方面，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要加大扶持力度，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让全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





创新地方政府理财思路

没有创新就没有突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达到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天下治”，核心在于制度设计，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从企业的角度，创新更多地体现在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更新、新工艺的采用。从财政的角度，创新更多地体现在新理财思想的提出、理财观念的更新、新财政制度的设计，而这些财政制度设计，关键看是否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福利的提高。



一个地方的经济能不能发展，财政有没有作为，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财思路的创新具体体现在公共收入、公共支出、财源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当前，面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如何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创新理财思路，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创新政府公共收入结构，确保政府财政的完整性

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政府的公共收入，即财政收入和政府收入，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国家基本是一致的，但在我国这两者之间是不相等的，是有区别的。在我国，财政收入通常指一般预算收入，主体是税收收入，占90%以上。但在我国除了一般预算收入外，还有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和其他收入，政府收入是由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2004年7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提出了非税收入概念，对政府收入进行了重新划分，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并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

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彩票公益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根据政府收入新的划分标准，政府收入可分为税收收入、预算内非税收入和预算外非税收入，前两者构成一般预算收入。目前，我国政府非税收入规模是比较大的。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规模大约为10523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39.8%，中央政府非税收入为1627亿元，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1.2%，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非税收入为8896亿元，占本级财政收入的74.8%。从非税收入的规模看，以前我国的财政管理主要局限在一般预算收入，可以说我国的财政管理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因为从非税收入的概念可看出，它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目的或提供某些产品（服务），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省以上政府确定的项目、标准，向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政府性资金。它几乎涵盖了除税收以外的所有政府收入，是政府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地方社会 and 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应纳入财政管理。创新理财思路必须将税收收入结构、政府财力结构通盘考虑，统筹安排，确保政府公共收入的完整性，以增强财政的实力和政府的调控能力。

创新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把政府 职能的实现作为财政工作的重点

如何创新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即财政支出结构？标准是什么？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决定的。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凡是市场能作用到的地方，政府就要退出，凡是市场作用不到的地方，即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才能介入。私人产品的提供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介入这些领域，将以其非市场活动方式否定市场机制的正常活动功能和运行秩序，将否定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相反，公共产品存在的领域则是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地方，政府介入这些活动既不存在否定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问题，反而能够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配制资源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其核心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公共物品或服务是典型的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之所以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提供这类物品或服务，它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具有如此特点的物品或服务，显然企业不愿也无能力生产，必须由政府担当起提供的责任。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属于经济建设型的财政，财政承担许多应由市场承担的职能，存在越位、缺位，甚至是错位的问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构建公共财政，必须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该保障的要保障，该控制的控制，该压缩的要压缩。财政支出要做到结构优化，必须要科学界定政府支出范围和标准，坚持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控制和压缩一般性支出，坚持勤俭办事，反对铺张浪费，集中财力办好事、办大事，财政支出在范围上应当趋向于公共领域，以弥补市场失灵。首先应当解决“越位”问题，必须打破过去财政部门大包大揽的格局，应当按照公共财政的框架要求，主动退出市场



能够起作用的竞争性、经营性领域，做到不“越位”；其次对市场配置失效的领域，如公共管理、国家安全、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等，财政要给予重点保障，做到不“缺位”。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必须保证地方各级政权建设，满足教育、科技、农业、文化、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加大对“三农”和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落实好国家再就业政策、城乡低保、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孤寡老人集中供养、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入学等各项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确保社会保障资金及时到位。

创新财源建设思路，确保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源建设是财政工作的基础。发展经济，培养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是财源建设的核心。财源建设的重点是什么？这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资源有效配置的。研究资源配置的着力点在于资源的稀缺性——相对于人类需求而言的稀缺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作为国情来宣传，这实质上是很大的误区，是对国情的不了解，或者说是片面认识。实际上，相对于我国的13亿人口，我国的资源是相当稀缺的。从总量看我国是资源大国，但按人口平均，我国则是资源小国。我国人均国土面积仅12亩，为世界人均量的29%。我国的山地丘陵占2/3；半干旱、干旱地区约占国土的1/2。东部半湿润、湿



润地区集中了 90% 以上的人口，每平方公里 225 人，特别是在沿海和平原地区，生存空间狭小。各类资源的人均量是：人均耕地 1.65 亩，为世界平均数的 1/3；人均草地 5 亩，为世界平均数的 1/2；人均森林面积 1.5 亩，为世界平均数的 1/6；人均森林储积量为世界平均数的 12.2%；人均水资源是 2300 多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数的 1/4；人均可开发的水力资源装机 0.31 千瓦，所占比重最大，也仅为世界平均数的 3/4；人均矿产储量总值 1 万美元左右，至于各类矿产资源如果按 13 亿人口平均，绝大部分均低于世界人均占有量。资源的稀缺性，需要我们在财源建设上必须作出科学的选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主要靠的是体制优势和机制优势，即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权相对明晰的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廉价的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形成了以加工工业为特色的经济结构。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地方发展经济的体制优势和机制优势逐步丧失，而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严重。地方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辉煌，必须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重点发展能耗低、附加值高的产业和行业，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地方经济的必然选择。相对于第二产业，我国的第三产业又是滞后的，现代服务业更是滞后。第三产业是和城市化、现代化相适应的，尤其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第三产业必须要有一个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表现在第三产业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衣、食、住、行等的商业流通活动，已扩大到为生产服务的广告、运输、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等活动，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旅游、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及一些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滞后是劣势，但也是发展的潜力所在，财政

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把财源建设的重点用在发展第三产业，增加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入，是和分税制改革相适应的。为了改变财政包干体制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属地征收原则划分流转税所造成税收经济杠杆调节作用的扭曲，该发展的发展不起来，限制发展的反而发展，使得国家产业政策不能正确贯彻实施，不仅造成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还妨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分税制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范围，把来自工业产品的消费税的全部和增值税的大部分划归中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盲目发展高税率产品的倾向，对过去难以解决的争上小酒厂、小烟厂、小棉纺厂等重复建设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把来自第三产业的税种划归地方，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第三产业的积极性。同时，把财源建设的重点用在发展第三产业，符合公共财政的发展要求，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理财思路必须坚持依法理财， 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

衡量理财思路正确与否，关键看是否依法理财、依法治税，是否规范执法。创新理财思路必须坚持依法理财、依法治税，可以说，依法是前提，创新是根本。在依法理财、依法治税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各种分配关系。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同时，面临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干预的核心是制定市



场规则，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创新理财思路必须体现市场经济的法治精神，即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调整财政的分配行为。实践证明，创新理财思路是符合市场经济的法治精神的：第一，调整公共收入结构，体现市场经济的法治精神。调整公共收入结构包括调整税收收入结构和政府财力结构。一方面是调整税收收入结构。税收收入是按税法要求征收的主体财政收入，其基本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税法是征税的依据。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由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构成，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抓主要矛盾，学会“弹钢琴”。在我国的税收工作中，一直存在“抓大放小”问题，即在税收管理中，主要抓重点税源，对一些小的税源重视不够，甚至有些小税源没有征收。调整税收收入结构体现了“抓大不放小”的治税思想，即在税法规定的范畴内，在抓好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征收管理的同时，对那些管理力度不够的小税种加强征管，对那些没有开征的小税种重新开征，树立“小税种，大财源”的思路，以增强税法的严肃性。另一方面是调整政府财力结构。在政府的收入中，税收收入是主体，除了税收收入外，还有非税收入等。非税收入是政府通过出台法规政策，以收费的形式取得的收入。调整政府财力结构主要是针对政府出台的各类基金、收费等非税收入，按法规政策的要求，没有收的要收起来，没有收足的要收足，以做大财政“蛋糕”。第二，调整公共支出结构，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法治精神。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我国《农业法》、《教育法》、《科技进步法》等对财政都有明确的要求。《农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国家财政每



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教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科技进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由于受政府财力的限制，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提供是不够的或是不充分的。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地方生产性支出要控制，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要压缩，减少各类会议费、招待费、差旅费、通信费等支出，保证农业、教育、科技、文化、环保等支出，这和我《农业法》、《教育法》、《科技进步法》的要求是不谋而合的。第三，创新财源建设，支持第三产业发展，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法治精神。构建公共财政，财政要逐步退出竞争领域，并不等于财政不要支持经济发展。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政府鼓励发展的产业和行业，财政的介入也是符合公共财政发展要求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式是有讲究的，公共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总的原则是不与民争利，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处于弱势的产业和行业。支持的手段可以采取财政投资、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第三产业滞后，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这和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不相符合，也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社会的就业水平，从当前来说，第三产业是我国的弱势产业，扶持第三产业发展，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基层财政公共 服务能力提升有抓手

在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56 个民族的国土上，大大小小地分布着 2000 多个县（市）。由于国土面积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民族问题复杂，自秦始皇设立郡县制以来，县级政权一直是我国的基层政权，是巩固政权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在我国行政体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为了增强国家财政宏观调控的



需要，财力逐步向上集中，而与此同时，随着公共财政职能的扩大，公共财政不断加大向农村覆盖，基层政府财政的事权不断扩大，基层财政的事权和财权矛盾突出，导致基层财政困难，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下降。

如何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增强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财政部从 2005 年开始推行“三奖一补”的财政政策（“三奖”即：一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和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二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三对产粮大县给予奖励；“一补”是：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对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从根本上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必须从国情出发，从地方的实际出发，发展经济、完善体制、加强管理、强化监督，壮大基层财政，使基层政府有实力、有财力、有能力、有效力提供公共服务。

壮大地方经济基础，使基层财政 有实力提供公共服务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在所有与财政有关系的因素中，经济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财源培养了，财政收入的来源才有保障，才有可供分割的“蛋糕”。否则，财政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增强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关键在于发展经济，这是基础。

发展县域经济，培养地方财源，在这方面基层政府是有作为的，政府的政策能起积极的引导作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

的县域经济比较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一些沿海省市抓住市场取向改革的先机，发挥体制和机制的优势，大力鼓励乡镇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迅速壮大，在前些年评选的“百强县”，主要集中在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而在这些沿海省份中，浙江的经验尤为典型。在“全国百强县”中，浙江省的数量最多，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把强县政策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抓手，不断下放权限，从1992~2008年，浙江省先后实行了5次权限下放政策，从最初的“强县扩权”到后来的“扩权强县”。同样，浙江省的财政也非常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理财思路，先后实行过“亿元县上台阶”、“两保两挂”、“两保两联”、“两保一挂”、“两保一联”等财政政策，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县域财源建设。到2007年浙江省的所有县（市）地方财政收入都超过亿元，这使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有了保障。

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分税制财政体制给地方发展经济明确了方向，各地要结合地方优势，重点发展能耗低、污染少、高附加值的产业和行业，积极培养地方财源，为地方财政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一是要发展效益农业，培养基础财源。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先后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国家财政直接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几乎很少，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原材料，而且为服务业提供产品。当前农业的主要问题是“增产不增收”，农业的效



益低，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不高。要改变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的面貌，必须坚持多种经营，“农林牧渔”全面发展，重点发展效益农业，推广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时，对一些生态源头、生态屏障地区，要坚决“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保护好生态，这也是一种发展。

二是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培养主体财源。工业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财源培育的主要方向。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但要提高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从制造业大国变为制造业强国，必须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建设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完成从传统低端、低附加值制造到现代高端、高附加值制造的转变。要优化发展通信设备、生物与新医药、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和新能源等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重点行业。同时，还要运用电子信息、现代生物、新材料、高效节能及新型环保等高新技术，改造机械、化工、纺织丝绸、轻工食品、建筑建材等传统产业，增强传统产业的竞争能力。

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培养新兴财源。服务业又称第三产业。服务业是和城市化、现代化相适应的，尤其是在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的显著特点是第一、二产业的比例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在这一时期，服务业必须要有一个大发展。从财政税收角度来看，第三产业是地方财力的主要来源。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单单是直接增加了营业税和所得税收入，还可以带动其他收入的增长，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制约着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既可解决

企业冗员问题，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又可繁荣地方经济。服务业的大发展表现在服务业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衣、食、住、行等的商业流通活动，已扩大到为生产服务的广告、运输、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等活动，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旅游、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及一些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要积极发展物流、通信、信息、金融服务以及文化、教育等服务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方面的物质文化需求。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使基层财政 有财力提供公共服务

体制是核心，在财政“蛋糕”既定的前提下，如何建立合理的财政体制，科学地划分财政“蛋糕”，使财力在各级政府之间合理分配，这是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确保基层财政有财力提供公共服务的关键。

在中央和地方分税制财政体制既定的前提下，省以下的财政体制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体制设计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到地方可用财力，关系到基层财政公共服务能力的提供。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分灶吃饭”的理财思路，全国各地先后推行了“市管县”的财政体制，“市管县”的财政体制适应了“市管县”的行政体制，扩大了市一级政府的理财自主权，也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但是，我国由于国土面积大，自然环境的差异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从全国的角度看，有东西部的差距和南北的差距。即使在同一个省内，也有地区之间的差异，比如，江苏省的苏南和苏北差距大，苏南经济发



达，而苏北经济落后；山东的胶东半岛和沂蒙地区差距大，胶东半岛经济发达，沂蒙地区经济落后；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和粤北地区差距大，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粤北地区经济落后；浙江省的杭嘉湖宁绍地区和浙西南地区差距大，杭嘉湖宁绍地区经济发达，浙西南地区经济落后，等等。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一时难以解决的，而推行“市管县”的财政体制，容易出现“市刮县”的情况，从而导致政府财力“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财力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分税制以来，基层财政困难跟“市管县”的财政体制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全国不少地方基层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浙江省的情况却不同。浙江省县级财政的人均支出水平比较接近，分税制以来没有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这跟浙江省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分不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力推行城市化的过程中，浙江省也一直坚持“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有些省份无论是经济发达县，还是经济欠发达县都不愿意实行“市管县”的财政体制，怕“市管县”后出现“市刮县”。浙江省的经验表明，“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有利于增强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已明确指出：“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因此，各地应创造条件，积极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

一是要增强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要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前提是要增强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使省级财政有



能力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分税制以后，省以下也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但各地的做法不完全一致，有的按税种在省以下划分收入，有的实行总额分成，浙江省实行的是分税、分成的体制，新增财力省级财政集中20%。这样，不管税源如何变化，对省级财政收入的影响不大，确保了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各地在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时，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不能削弱，以确保省级财政有转移支付能力，这是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的基础。

二是要加快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省管县”的财政体制的核心是省级财政直接和县级财政结算，不用通过市一级，避免了“市刮县”，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管理层次。在中央的支持下，全国有不少省开始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的要求，各省要加快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没有试点的要抓紧试点，已试点的要抓紧全面推广，加快缓解基层财政困难，提高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并为“省管县”的行政体制推行创造条件。

三是要加大省对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省级财政的有了调控能力，就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大对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要起到调节地区财力的作用，避免财政资金的“雁过拔毛”和财力在地区之间的“苦乐不均”。重点要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从而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实现地区之间基



本公共服务的大体均衡。

健全财政预算管理手段，使基层政府 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管理是手段，在财力既定的情况下，是集中管理还是分散管理，是多头理财还是集中理财，直接关系到基层财政的能力，关系到基层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在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力高度集中，单位和部门几乎没有预算外收入，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相当于政府收入。当时的政府财政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政府财政的能力强，几乎集中了所有的政府性资源，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也高，超过了 3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调动了地方和部门当家理财的积极性，给经济注入活力和生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放权让利”的改革也导致财力分散，大量的预算外资金迅速膨胀，不少地方预算外收入占据半壁江山，和预算内收入是平分秋色。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即“两个比值”），影响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推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经过十多年的运行，“两个比重”有了明显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但基层政府财力分散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基层财政困难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如何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既定的情况下，不少地方政府财政积极开始探索，通过财政管理制度的创新，变多家理财为集中理财，变分散财力为集中财力，增强了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浙江省义乌市财政综合预算改革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从2000年开始，义乌就在全中国率先开始探索以“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财政监督全过程”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预算改革，即“三个子”的综合财政改革。一是“收入一个笼子”，将所有的政府性收入，无论是税收收入，还是非税收入，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共性资源收入，都归口于财政税务部门统一管理，资金全部纳入财政单一账户体系（国库或财政专户）。二是“预算一个盘子”，编制综合预算，将预算内、外资金通盘考虑。三是“支出一个口子”，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保证了财政资金的安全。通过财政预算综合改革，义乌市财政可用财力大大增强，不仅实现了集中财力办大事，而且政府性负债得到了有效控制。浙江省及时对义乌市的财政综合改革进行总结，从2007年开始在全省推广“三个子”的综合财政改革。

由此可见，基层财政不能眼睛只盯在上面，只寄希望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通过分配制度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变革，增强基层财政的实力，增强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基层财政也是有潜力可挖的。

一要统筹政府财力。基层财政困难、政府财政能力削弱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财力分散，政府各部门代表政府参与财力分配，参与财政“蛋糕”的分配，有些部门甚至自成体系，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要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必须清



理分配秩序，巩固财政在政府财力分配中的主导地位。要取消政府各部门的银行账户，一些有收费职能的部门必须要做到“收钱不管钱”，收支要脱钩，所有的非税收入要纳入财政统一的账户，按预算的要求，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所有的财政性收入，包括预算内、预算外收入，以及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不断增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资源转让收入，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收入，都要由政府财政统一管理，统筹安排。

二要编制综合预算。财权集中了，财力统筹了，基层财政要根据“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理财原则，按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工作的轻重缓急，将基层政府的各种财政性收入，即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通盘考虑，编制综合预算。综合预算反映基层政府支出的全貌，是基层财政安排支出的依据。综合预算必须要体现保“吃饭”的要求。保“吃饭”、保稳定、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是基层财政的第一要务。在满足了基本的“吃饭”需求，基层财政再根据财力的可能和地方建设的需要，集中财力办大事，满足重点建设的需要。综合预算还必须要体现“民生财政”的要求。公共财政的核心理念是“民生财政”，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满足城乡居民基本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文化等方面公共需求，综合预算的重点要支持民生工程。同时，综合预算还要“收支平衡”。“收支平衡”是基层财政的基本要求，《预算法》也要求地方财政“收支平衡”，而综合预算本身有利于基层财政的“收支平衡”，对能不负债的就不负债，对确实要负债的必须控制在可控的合理的范围内，以保证基层财政的安全和科学发展。



加强财政资金监管，使基层财政 有效力提供公共服务

基层财政除了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外，还要看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否有效益，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必须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居民社会福祉提高发挥作用，这是基层财政的理财能力。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管，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可以确保基层财政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有效力。

经济学上把所得和所费的比例称为经济效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资本价值最大化。而作为政府财政也要讲效益，无非是社会效益，把资源配置社会效益最大化作为财政资金使用的目的，这是政府理财和企业理财的主要区别。长期以来，财政部门只注重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对资金使用的结果很少关注。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使用结果如何，产生了多少社会效益，有没有铺张浪费，等等，财政部门缺乏追踪了解。1998年我国把公共财政作为财政改革目标提出以后，我国预算开始了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的改革，各基层财政先后推行了政府采购制度、会计集中核算、财政国库集中收付、政府投资项目的价格审核、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等改革，加强了对政府财政资金的监管。目前，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工作刚刚开始，有些办法和制度还处在摸索阶段，但已取得不少成效，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从全国各地财政部门统计的情况反映，政府采购每年都有10%以上的资金节约率，政府投资项

目也有大量资金的核减，项目资金的核减率也都在10%以上等。这些成绩的取得，节约了财政资金，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当于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了更大的使用效益，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也使基层财政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有效力。

财政监管的实践表明，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不仅能抑制腐败，更重要的是能减少财政资金使用的浪费，避免无效的公共服务所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基层财政要不断挖掘潜力，强化财政监管，提高效力，实现财政资金使用上的“精打细算”，以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一是要细编部门预算。部门预算是财政综合预算的基础，是财政综合预算的依据，也是加强财政资金监管的前提。这要求部门预算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清”徒有虚名的抽象预算，部门预算必须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预算要按照精细化的要求，抛开传统的“基数+增长”的简易模式，用零基预算的方式，将预算内外资金通盘考虑，科目要细化到类、款、项、目等，编制综合性的部门预算。部门预算要反映部门收支的全貌，并作为财政预算安排和开展财政资金监管的依据。

二要开展对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建立以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为核心的监管体系，是财政监管的中心环节。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重要环节，目前这项工作已在基层财政部门起步，虽然评价体系还不健全、评价方法还不科学，但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对转变部门观念，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资金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资金的到位情况、资金的使用情况、资金的结余情况，都起到监管作用，可以有效避免资金的截留、挪用等违规现象的



发生。基层财政部门要重视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这一环节，并把它作为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和下年度财政预算的重要依据，作为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和编制财政预算的重要依据。

三要公开理财。公开、公平、公正是理财的基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公开了有利于推进公平和公正，公正了就可以做到公平和公开。基层政府的财政统一，政府的理财就要公开，即政府的预算要公开，接受监督，避免“暗箱操作”。一方面要接受人大的监督，政府预算的全貌，即政府的综合预算和部门的部门预算，要向人大公开，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的预算要向社会公开，要接受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真正体现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要求。





农村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投入，在农村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了农村人口素质。可以说，农村教育形势大好，一片欣欣向荣，但是，成绩往往容易掩盖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直接关系农村教育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应该引起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的重视。



两个应引起关注的现象

案例之一，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在下降。2009 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国家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总理的话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高等院校里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在减少。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 82.3% 和 17.7%。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占 30% 以上。

案例二，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在下降。据部分重点大学的调查，重点院校农村生源比例仅为 30% 左右。1999 年至 2001 年的 3 年间，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村新生比例均在 39% 左右。但自 2002 年起，农村新生比例开始下降，2007 年跌至最低，仅为 31.2%。南开大学近 3 年来统计数据显示：2006 年农村新生比例为 30%，2007 年这一数据为 25%，2008 年为 24%，下降趋势比较明显。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几年的统计则显示，农村新生比例最高时也不超过 1/3。

13 亿人口，8 亿多在农村。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的越来越多，农村小学和中学的办学条件逐年改善，而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应该引起政府的深思、社会的关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农村的发展，关系到农村人口的素质，关系到城乡差距的缩小。



农村教育质量待提高

这两个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和反思。

引起高校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比如说培训大学生成本高，农村家庭难以负担；农村教育的硬件投入少，办学条件差，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我国已经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农村也开始集中办学，教学条件不断改善，国家对困难家庭学生的大学生活费负担也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根据有关调研，高校农村学生比例低，关键是农村教育师资力量弱，教师素质差，教育水平低，导致农村中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低，尤其是升入重点大学的比率更低。人民网专门作了调查，人民网网友认为四大原因造成农村生源下降，其中农村教育人才流失，导致农村教育水平下降，占 52.5%；农村学校的投入少，教学环境差，影响教育质量，占 26.3%；大学招生倾向本地生源，农村学生吃亏，占 17.8%；农村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相对较少，占 3.4%。

看到人民网的调查，使我想到了李白在诗中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农村教育的“庐山真面目”终于可以看出来了，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水平低，农村教师素质低，使得农村学生不能或无缘考上大学。这也使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农村教育深处的危机，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中小学仍有 37.9 万名代课教师，其中 81.8% 分布在农村学校。农村教师补充退出机制也不健全，一



些不合格人员占据着教师岗位，无法腾出编制补充年轻、优秀教师。2004～2006年全国约有10%的县连续3年未补充公办教师。一些农村学校五六年没有录取新教师。另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调研组调查，仅云南省现有代课人员2.28万名，其中2.14万名在农村，这些代课人员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或培训，业务素质普遍较低，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优秀教师向城市集中，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遍素质低，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任其这样发展，后果是严重的：一是农村孩子不愿在农村读书，产生不少“教育移民”。既然农村教育水平差，教育存在“误人子弟”，一些有条件或有能力的农村家庭，就想方设法送孩子到城镇或大城市的学校去读书，这一方面使得城市的不少学校学生人满为患，教育资源过度使用，同时不少学校抬高择校成本，农村学生的家庭负担加重；另一方面使得不少农村学校招不到或招不满学生，国家投入的大量教育资源浪费。二是农村孩子不想读书，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读书仍然是中国不少地区农村孩子和家庭改变命运的方式，既然在农村学校读书考不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因为考不上好大学，意味着找不到好工作，不少农村孩子就不愿意读书。加上我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为“素质教育”后，国家扩大了大学的招生规模，提高了大学生的收费标准，也取消了大学生毕业后工作的包分配，客观上使一些农村困难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重庆晚报》在这方面也有专门的报道，2009年重庆市高考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放弃高考的学生多数是农村考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读书



“无用论”思想在农村的蔓延。

推进农村教育质量大提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农村教育发展落后、教师素质低、教育质量差是长期形成的，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解决农村教育问题，要看清问题的症结，找准问题的突破口，简单的修修补补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必须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来进行，把握好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提高农村教育总体水平和质量，推动农村教育大发展。

思考之一：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教育有差异，教育资源和优秀教师集中在城市，核心问题是城乡教师待遇不一致。目前我国农村学校教师不仅教学条件不如城市，而且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导致农村教师不安心农村教育，有条件的、有水平的总是想方设法往城市调、往城里挤。“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农村教育问题还是要从教师的待遇着手。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已明确，教师的待遇不得低于公务员。国家也明确规定中小学教育实行以县级为主进行统筹。因此，各地必须按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统筹城乡教师资源，提高农村教师的收入水平。只要把教师的待遇提高了，尤其是农村教师的待遇提高了，使他们能够安心农村教育，这样农村教育水平提高就有可能，农村教育水平提高就有希望。同时，城乡教师的工作岗位也应实行轮岗，优秀的教师也应到农村去支教，使农村的学生也有机会享受到良好的教育。

思考之二：城乡教育集团化。教育资源城乡共享，教育资



源城乡分布均衡化，还有一个思路是教育集团化。就是以名校为龙头，组建教育集团，实现教育资源在集团学校间的共享，这是可行的，不少地方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因为每个县市都有相对的名校，以名校为核心，发挥名校的品牌效应，在县市范围内组建几个名校集团，将部分农村乡镇学校纳入名校集团，实行集团化管理，在名校集团内师资统一待遇，统一调配，统一使用，统一管理，达到以强带弱、以大带小的效果。这样做，可以提高一个县市范围内的教育整体质量，实现教育资源在城乡配置的均衡化。同时，也可以改变农村学生都想设法往城市挤，城市学校过度拥挤的局面，农村学生在农村也能上名校，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村学生、家长何乐而不为呢？

思考之三：鼓励大学生下乡助教育。农村教育落后，农村教育水平低，关键是农村缺教师——缺有水平、有教学技能的教师，还有不少农村教师岗位仍由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代替。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是有困难的，要农村学校培养出优秀学生，要农村学生考上好的大学也是有困难的，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源头着手。目前，我国一方面农村缺乏大量的教育人才；另一方面，这几年大学大规模扩招后，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找不到工作，又存在大量的人才浪费，这为农村学校引进人才提供了可能。国家应出台专门的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到农村，到中西部地区、到老少边穷地区去支教。国家可以规定：如到农村支教的大学生，工作满几年以上，可以回到城市学校工作；如到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支教的，工资由国家教育部统一支付，工作满几年后可回到城市学校工作，等等。通过这些政策的引导和政策支持，来改变农



村教师的队伍结构，提高农村教育水平。

思考之四：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大提升。改变农村教育的状况，提高农村教师的教学水平，还得从农村实际出发。对大量农村教师，尤其对一些年轻的教师，应通过培训或继续教育，来提高教学能力。各级地方政府可通过政府组织、财政买单的形式，借助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平台，对农村教师，尤其是那些不符合现代教学要求的农村教师进行系统全面的轮训，提高农村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技能。

思考之五：全面推行集中办学。一些农村学校教育水平低，与学校多、教育点多，教学教育资源分散也有很大的关系。有些农村学校只有几十名学生，几个教师，教师既要教语文，又要教数学，甚至还要教体育；既要教低年级，又要教高年级。在这样的学校，要谈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只能勉为其难。要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必须推行集中办学，集中教育资源，提高规模优势。农村学校也要推行寄宿制，撤销一些分散的教育点。规定一个乡镇只能办一所中心小学，一个或几个乡镇办一所中学，通过农村学校的撤扩并，扩大农村学校的规模，提高农村学校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给农村学生 “上大学难”支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传统美德。而大学又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渴望上大学、上理想的大学是每个青年学子的梦想。但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够上大学的，不少农村学生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大学梦”难圆。这种因公共服务不均等而导致的机会不均等，是政府需要考虑的，是政府要引导的，也是政府有责任、有义务要想方



设法予以解决的。

由一则报道想起

2009年4月人民网转载了《重庆晚报》的一则报道，重庆市应届高三学生中，有上万学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且这些学生多是农村学生。这条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对高考制度的关注，对农村学生的关注。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教育是家庭的希望，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希望。

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在重视素质教育的今天，高考仍然是选拔人才的主要形式，也是最公平的形式，目前国家还没有更好的形式来代替高考。我国历来有把读书比作“寒窗”的说法，高考则是对“寒窗”的检验，国家、社会和家庭都非常重视高考、关注高考。而放弃高考，意味着放弃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意味着放弃更好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对农村学生尤为不应该，因为我国本身就存在城乡差别，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如果再“让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对加快农村人才的培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是不利的。这种现象任其蔓延，将影响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影响农村现代化进程。

也许有人会说，成才的道路千万条，农村学生可以自学成



才，也可以在社会的大学里成才，放弃高考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在目前的农村，学生放弃高考，至少是家庭的损失，是教育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应引起全社会的深思，引起国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思。

农村学生为什么要放弃高考

为什么放弃高考的都是农村学生？难道农村就不需要知识，农村就不重视教育？答案是否定的。

放弃有放弃的原因，放弃有放弃的道理。我们认为，农村学生放弃高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农村的教育质量差、教学水平低，农村学生难以考上好的大学；又比如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好，使上大学对农村学生失去吸引力，如此等等。这些原因固然有理，但为什么放弃高考的偏偏是农村学生，偏偏是最需要知识、最需要改变面貌的农村学生？显然这些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农民收入低，农村家庭难以承受上大学的负担。我们知道，教育对国家来说是事业，而对家庭来说是投资。投资就要考虑成本，考虑未来的收益。如果投资成本过大，投资者难以承受，而未来的收益又难以预测，投资者往往会选择放弃。教育投资亦然。

上大学属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属于素质教育、精英教育。我国在国家财力困难的前提下，已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和义务教育相比，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大，但高等教育国家不能完全承包，国家也无力完全承包，国家对高等教育收费是应该的，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高等教育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目前，我国对高等教育已全面实行收费制，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收费并不算高，和培养大学生的成本相比，国家的负担仍占大头，收费仅仅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补充而已，可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高等教育的收费又偏高，上大学对农村家庭来说负担还是重的。目前，我国高校的收费标准高低不一，一般高校年收费 5000 元左右，职业技术学院收费 8000 元左右，艺术院校年收费 10000 元左右，民办高校年收费 15000 元左右，再加上学生的生活费，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至少要 1 万元以上。而我国农民的年收入虽然每年不断增长，2008 年农村居民的纯收入达到 4761 元，比上年增加 621 元，但和高校的收费相比，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也难怪会出现上百万农村学生放弃高考的现象。

可见，农村学生“上大学难”是农村学生放弃高考的主要原因。

为农村学生上大学出谋划策

在我国现有的收入水平下，上大学对农村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学生就不能上大学，就上不起大学，其实国家还有不少优惠政策向困难家庭、向农村家庭倾斜。只要国家、社会、家庭一起努力，多管齐下，农村学生上大学是完全可能的，农村家庭也是能够承受的。

招数之一：社会支助。大学虽然不是义务教育，国家没有义务承担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但对农村困难家庭的学



生，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就像义务教育的“希望工程”一样，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帮助农村困难学生完成大学的学业。一是国家给予一定的资助。对一些农村困难家庭、低保家庭的子女上大学，可以通过国家财政，给予一定的资助。全国各个高等院校都建立了“奖学金制度”、“助学金制度”等，不少地方政府也建立了一些制度，如“低保家庭子女上学资助制度”等，帮助困难家庭子女上大学。二是企业资助。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也乐意帮助大学生上学。不少企业也通过这样做来回报社会，有些企业通过这种形式，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有些企业通过这种形式从高校引进了人才。三是社会募捐。通过建立基金的形式，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帮助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四是助教结对。鼓励一些城市的家庭，和农村困难家庭的子女结对子，实行一对一的帮扶。

招数之二：定向培养。解决农村学生上大学难，国家也可以面向农村，为农村定向培养人才，以改变城市学生不愿去农村工作而导致的我国人才分布十分不均衡现象。目前，一方面，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才济济，有些地方或单位甚至是“人满为患”，不少人才的作用难以发挥；另一方面是农村尤其是边远农村人才稀缺，要引进人才是困难重重，这跟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弊端是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大而全”、“小而全”。一些高校不顾条件的许可，总是想方设法由专科性学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变，导致专科学校不专，高校的专业分工不明显。一些重点为农村培养人才的农业院校、师范院校等，也偏离了方向，培养的毕业生很少去农村、去基层。其结果是，大学生就业难和大学生稀缺并存。本来，高等院校是



应该有分工的、有层次的，有专科性的、有综合性的大学，有面向城市、有面向农村培养学生的大学。针对农村人才缺乏，而城市的大学生又不愿意到农村工作局面，国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面向农村学生，在一些农业、师范、医学等方面的大学，采取低收费的形式，定向培养农村急需的农业、教育、医疗方面的人才。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村的人才问题，又可以解决农村学生上大学难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招数之三：贷款助学。为了帮助困难家庭大学生圆大学梦，完成大学学业，国家在大学大量扩招的前提下，又推出了助学贷款。通过低利率的政策性贷款，帮助困难学生，这是一项好的制度，但从各高校执行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银行也不愿意开展这项业务，主要原因是贷款的回收率低。许多学生毕业后，有的是不愿意归还贷款；有的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能力归还贷款，如此等等。一项好的政策，执行的效果不好，影响了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对助学贷款这项政策，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出现问题而否认政策本身的优越性，还得多管齐下，推进这项政策在高等院校的开展。一方面，高等院校要加强对学生的信用教育，培养学生的信用意识，使学生明白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要完善助学贷款的管理制度，比如建立信用担保制度、信用抵押制度等，以确保高校学生毕业后能主动、及时归还助学贷款。

招数之四：勤工俭学。凡在国外有读书经历的人都知道，勤工俭学，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国外不少学生是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的。我国大学采取收费制后，上大学，对不少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开支，我国的一些学生也开始了勤工俭学。对农



村困难家庭的学生来说，为了完成学业，减少家庭负担，应鼓励勤工俭学，但学生毕竟是学生，学习是第一位的，要处理好勤工俭学和学习的关系，否则会误入歧途，得不偿失。我们认为，学校对农村困难家庭学生勤工俭学应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一是学校的学生会专门成立勤工俭学的机构，帮助联系学生勤工俭学事宜；二是学生的勤工俭学要和学生的专长结合起来，和学生的专业结合起来，如家庭教师、社区举办的培训班老师等，主要是利用学生的智力实现勤工俭学的目的；三是学校的一些社会服务职能，如学校校园、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卫生，甚至学校厕所的卫生等工作，作为勤工俭学的岗位，学校可以承包给学生；四是一些适合学生工作的岗位，比如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的服务员，学校可以主动和快餐店挂钩，帮助学生勤工俭学；五是勤工俭学要在业余时间进行，这既不影响学生的学习，又可以增加学生的收入，同时还可以锻炼学生，使学生能够了解社会，更加容易融入社会，也便于将来就业。

招数之五：发展夜校。有一次在国外培训，遇到一位华侨大学生，和他聊起大学教育。他跟我说，他白天做生意，或打工，或当导游，晚上读夜大学。国外的大学跟我国的大学有所不同，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有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一样的规模，不少大学规模很小，有的甚至只有一栋教学楼。因为国外的大学基本不管学生的后勤（吃饭、住宿等），但学校的教学楼使用频率高、效率高，白天有日校的大学生上课，晚上又有夜校的大学生上课，夜校的毕业文凭和正常的文凭一样，政府和社会都承认。国外的做法给我们启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效仿呢？完全可以，完全也应该。我国应大力发展夜校，因为我国的高



等院校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高等院校的硬件资源丰富，同时，高等院校的软件也很丰富，不少高校的教师工作量少，教师资源闲置严重，这些都为发展夜大学提供了条件。当然，夜校和正常的高校应该有所区别，夜校的生源要以农村学生，尤其是家庭困难的学生为主，招生的录取分数要低一些，收费标准也要低一些。这样，可以使农村困难家庭的学生有能力完成高等教育。

招数之六：发展职业教育。“条条大道通罗马”。成才的道路千万条，上大学是成才的主要途径，但不是成才的唯一出路。在国外，也不是所有的学生中学毕业后就上大学的，除了一部分学生上高等院校外，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上职业学校的。通过职业学校几年的培养，有的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就业，有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理想，再进入更高级的高等院校深造。在我国由于受“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影响，上大学成了千军万马必须跨越的“独木桥”，职业学校发展不快。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但观念也是可以转变的。这几年，由于大学生分配难、就业难，再加上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难上加难，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由于有一技之长，不少学校的毕业生未毕业就被“订购一空”，就业形势良好，使人们对职业教育有了新的认识，职业教育开始被社会、学校、家庭接受。其实，在现代社会里，合理的人才结构是“金字塔”形的，而倒“金字塔”形的人才结构，会导致人才配置浪费。在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大量需要的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这是提高我国产品档次、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而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和大学生相比，动手能力强，适应能力强，社会需求量大，就业容易，且职业学校



学生的培养成本低，学生家庭的负担轻，这对广大农村学生来说，选择职业学校是比较合理、比较现实、比较可行，农村学校和家庭应引导和鼓励学生向职业学校发展。更何况国家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可以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又可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新型农村养老 保险改革待破题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也是文明社会的标志。21 世纪初，我国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着手，掀开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改革序幕。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在农村先后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农村社会保障改革，初步形成了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



成部分的农村养老保险始终没有破题，党的十七大也仅仅提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为何难以全面推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破题的症结何在？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有这么一个案例，说湖南祁东七旬农民付信达来北京抢劫，被抓入狱。他对媒体说抢劫的目的是为了享受监狱待遇，以便养老，他在祁东当地已两年没吃上肉。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是付信达抢劫案却反映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反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缺失，给我国的农村养老问题提了醒，应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我国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步于党的十六大以后，按照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目标，我国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向农村延伸，开始向农村覆盖。2003年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覆盖到90%的农村居民；2006年以来，500多万农村孤寡老人和城市孤寡老人一样纳入财政供养；2007年开始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应该说，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还刚刚起步，不少地方还没有建立，这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的“小型化”发展现状极不适应。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的人口结构称为老龄化社会。20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 10%。2005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近 1.44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11%，而老年人口近 60% 分布在农村。据预测，到 2020 年，农村 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例为 15.6%，而城市则为 9.0%；2050 年，这个数字为农村 32.7%，城市 21.2%。在当下，有超过 1 亿的农村老人，依然靠农耕社会的“养儿防老”模式度过晚年。显然，农村比城市面临更大的社会养老压力，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

“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我国政府历来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农村面临的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村养老等三大问题，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的免费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覆盖，农村的教育、医疗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农村的养老问题还没有破题，农业时代的“养儿防老”模式在农村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城市的计划生育国策得到了普遍实行，但在广大农村，尤其是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以开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空白，农村“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有些农村甚至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这严重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影响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我国土地承包经营经过 30 年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效应，解决了 13 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面临很大的问题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

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生产、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利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要解决农业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转变，关键要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由于农村没有建立养老保险，一些农民，包括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即使土地抛荒，也不愿意放弃土地，这影响了农村土地的正常流转、影响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三是影响农村内需的扩大。应对金融危机，要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以便扩大内需。我国 13 亿人口，8 亿多在农村，农村有广阔的市场。扩大内需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村。国家也不断出台政策，如“家电下乡”、“手机下乡”、“汽车下乡”等，以打开农村市场，但要取得明显效果有难度。由于农村没有养老保险，农村虽然有潜在的需求，可要把潜在的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农民有后顾之忧，农民不是不愿消费，而是不敢消费，这也影响了农民的消费，影响了农村市场的开拓，影响了内需的扩大。

农村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

农村养老保险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国家“七五”计划就提出，1991 年民政部选择部分县市进行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提出“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采取个人账户基金储备积累模式”的农村养老保险方案，农村养老保险开始在部分地区推行，但由于缴费比例少，基金缺乏增值渠道，养老保险享受



的待遇低，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民缺乏吸引力，有些地方甚至出现退保现象，农村养老保险基本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

近几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按照“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各地又开始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浙江省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少县市率先开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改革，并受到农民的欢迎，被称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浙江各地的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嘉兴模式。“嘉兴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城乡一体化”，基金采取积累制的方式筹集。浙江省嘉兴市2007年9月3日出台了《嘉兴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从10月1日起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按规定的缴费基数和比例缴纳，采取按年缴费方式。缴费基数分别为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两者之和的平均数，个人缴费比例为8%（今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个人缴费的比例将逐步提高到10%）。农村居民可任选其中一个基数缴费，城镇居民可选择后两个中的一个基数缴费。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时，统筹地财政分别按当期缴费基数的5%给予补贴（农村居民统一以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按5%比例补贴），其中3%用于建立参保人员补贴账户，2%用于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市本级由市、区两级财政分别按2.5%的比例承担；各县（市）由县（市）、镇（乡、街道）两级财政分别承担。参保人员因特殊原因当年未及时缴费的，允许次年按当期的缴费标准补缴，财政按上一年的标准给予补贴。参保人员年满60周岁，缴费年限满15年的，可按规定办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领取手续，由社会保险机构发给《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领取证》，从核准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次月起领取养老金。

二是余姚模式。“余姚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采取一次性缴费的方式筹集资金，有点“买断式”的味道。浙江省余姚市2007年7月25日出台了《余姚市农民养老保障试行办法》，当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农村养老新制度。按新制度的规定，余姚市农村年满60周岁的男性、年满55周岁的女性，均可参保。参保时可选择3个不同的缴费标准，分别为1档21000元、2档18000元、3档15000元，一次性缴清所选择的费用。其中，55~65岁的女性、60~70岁的男性可以在办理手续后的次月，依照保费标准按月领取210元、180元或150元养老金。如果年龄男高于60岁或女高于55岁的参保者，缴费额将依次降低。并规定对男年满70周岁、女年满65周岁及以上的人员既可以选择一次性缴费参加农民养老保障，也可以选择享受每月50元的老年人员生活补助金。

三是余杭模式。余杭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基金的筹集采取“累进式缴费”和“一次性缴费”相结合的方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2008年8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办法》。新办法规定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按余杭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00%确定，缴费比率为20%，其中个人缴费比例为15%，财政补贴比例为5%。对待困难家庭的参保人员，个人缴费比例为5%，财政补贴为15%。对今年已满6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在2008年12月31日前既可以连续缴费满15年后按月领取养老金，也可以在2008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补足15年的养老保险费后按月领取养老金；一次性补足缴费年限的养老保险费按照办理补缴时的缴费标准进行补

缴，并按规定享受财政补贴。

从浙江省各地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看，共同特点是建立个人账户，基金的筹集采取“个人缴费，政府兜底”，实现权利和义务相结合，地方财政每年要注入农民养老保障基金及发放生活补助。如据余姚市测算，参保人员交付的个人本金可以支持6年。6年后将由政府财政“买单”。要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余姚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不低于上年待遇支付总额35%的资金，预计每年需拨7000万元注入农民养老保障基金及发放生活补助，平均要为每位参保老人补助近3万元。不同点是各地缴费的标准和老人的养老待遇不一样；政策的级次也不一致。如嘉兴市实行了城乡一体化，在全市范围内实现了政策的统一。

从浙江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看，推广进度快，如余姚市10万名60岁以上农村老人已有5.6万名领到养老金。对一些没有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村老人，各地也有补充的规定。如余姚市对没有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村老人，每人每月可以得到政府50元的生活补助；余杭区对农村老人也有每月50~16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农民也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养老待遇，农村养老保险普遍受到农民的欢迎。

积极推进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破题

随着社会老龄化、人口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推进，农村养老保险是绕不过的弯，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必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明



明确提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迟改不如早改，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各级政府应未雨绸缪，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可能，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的破题。

一是工作方法上“先试点，后推广”。我国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改革从2003年的新型合作医疗起步，经过几年的运行，已在全国全面推行，使广大农民受益，被老百姓称为“民生工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基本方法是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积累了经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改革也应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和步骤，关键要做好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一项“恩泽百姓，惠及子孙”的“惠民工程”；是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缩小城乡差距的“富民工程”。但由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要采取个人缴费的方式，是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的改革，改革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在试点阶段，要做好宣传普及工作，要把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区别开来，把“新农保”和“老农保”区别开来，让农村老百姓真正看到新型养老保险的好处，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在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广普及，覆盖到广大农村，让农村百姓感到公共财政的阳光，让农村百姓也能充分享受改革的成果。

二是标准选择上“低标准，广覆盖”。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有着深刻的教训。在西方国家，由于采取高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社会保障也养了一批“懒汉”，严重影响了国家的



竞争力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社会保障还出现了赤字。而社会保障作为国家的福利政策是“可上不可下”的，国家要改革社会保障政策，削减社会保障开支，降低社会保障标准，往往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鉴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以及农村人口多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决定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必须是低水平的，必须和当地的经济水平发展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同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政策，是每个居民都应该能够享受的权利，必须要广覆盖，人人都能享受。各地可以结合 2007 年以来在农村全面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低保线为依据，在高于低保线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设计出符合当地实际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标准，以后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变化，逐步提高。

三是管理模式上“个人账户，动态管理”。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保障是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全国应该统一，但由于受国家财力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限制，我国暂时还不能做到这一步。考虑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流动的频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要避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因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所造成频繁退保纠纷给工作带来的被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管理起点要高，参照国外的做法，应建立“个人账户”，以每个居民都拥有不同的身份证号作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号码。“个人账户”是记载个人缴费金额和缴费年限的依据，“个人账户”要做实，不能空转，个人的缴费和政府的补助都要进“个人账户”。有了“个人账户”就有利于人口的流动和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的转移。当然，国家在政策上要统一规定达到一定的缴费年限才可以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这样，农村居民不管在哪里工作和生活，只要有“个人账户”，符合了规定的缴费年限和缴费金额，就可以享受当地的养老保险待遇。

四是制度设计上“城乡一体化”。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从各地试点情况看是不一致的，有的地方个人缴费高，有的地方个人缴费低；有的地方全覆盖，有的地方覆盖部分人群。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有些国家也是先从城市开始再扩大到农村，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再趋于统一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的历程中吸取经验，用较短的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以前走过的道路。在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上，应体现“城乡一体化”。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也要求“城乡一体化”，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大量的城市郊区人口失去土地，大量的人口在地区间流动，这些都要要求城乡之间的制度统一，束缚市场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必须打破。我国的医疗制度改革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先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再推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在“新农合”成功的基础上又推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人为地将医疗保险按身份划分，导致制度的紊乱。新的医疗制度改革，最终将制度进行合并，逐步推行人人应该享受的医疗保险制度。因此，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上，应该推广“嘉兴模式”，实行“城乡一体化”，把城乡居民全部纳入养老保险的范畴。不要再走医改改革的老路，先建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又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经过几年运行，然后再合并，建



立统一的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样必然增加归并成本，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五是政府职责上“财政必须介入，承担‘兜底’的责任”。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职责范畴，是公共财政的作用范围。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推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很多地方难以推广，主要原因是缺乏政府财政的支持，完全属于个人储蓄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金增值又缺乏有效的办法，导致了制度难以运转。养老保险作为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必须承担责任，这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条件。在美国，社会保障主要由联邦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税是联邦政府的重要收入，社会保障支出也是联邦政府的重要支出。在我国，由于受财力限制，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支持严重“缺位”，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公共财政职能的扩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缺位”公共财政必须要给予“补位”。既然社会保障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各级政府财政都要承担责任，政府财政预算要专门安排资金，确保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能正常推行，满足支出需要，承担起“兜底”的责任。当然，对地方财政困难的地区，中央财政也要给予相应的转移支付，使地方财政有能力承担起农村养老保险“兜底”的责任。





农村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财政有作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图。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图中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



出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短缺、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新农村建设就要求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好“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共同发展。新农村建设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跟财政有关。对财政来说，关键是要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对农村公共投入，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这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公共财政职能发展的需要。

转变理财思想，更新理财观念

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转变理财思想、更新理财观念是关键。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必须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注重社会发展，注重城市发展转向注重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进步。

一是要树立公共财政的理财思想。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首先要树立公共财政的理财思想。公共财政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要求财政退出竞争性领域，不要与民争利，财政主要作用于市场失灵的方面，即支持那些市场主体不愿干或不能干的事，这要求财政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注重社会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在农村，由于农业投资的低效益，农业属于弱质产业，需要政府的扶持，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应该是公共财政的作用范畴。



二是要树立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财思想。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一样都是公共品，同一属性的公共品在供给上应该采取相同的政策。同样，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对公共物品有同等享有权。在公共品供给政策上，如果厚此薄彼就会造成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从而加大城乡差距，导致事实上的歧视和不公。因此，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要求财政从城市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从注重城市发展转向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走城乡均衡发展之路。

三是要树立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理财思想。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也是政府理财的主体。市场经济主张效率，政府必须注重公平，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体现了政府公平的理财思想。但是，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必须体现效率的理财思想，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公共产品的生产是两个过程。农村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而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应由私人生产，这能使效率更高，政府的作用是监督和引导。

四是要树立公开、透明的理财思想。公开和透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面向社会的，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应公开公共建设项目，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的方式，向社会公开，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以提高效率。政府的信息公开了，也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只有信息公开透明了，政府的行为才能得到监督。因此，公开、透明是政府有效履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



财政应“四两拨千斤”，重点是发挥 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

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缺陷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农村公共产品涉及的范围广，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的环境保护、大江大河治理、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道路建设等，这其中既有农村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财政提供，也有农村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财政和市场共同提供。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中，财政不能全部承担，也无力全部承担，财政只能“四两拨千斤”，应更多地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财政要避免大包大揽。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公共产品短缺是长期形成的，改变农村的面貌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投资。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的初步测算，治理农村的环境污染，需要几百亿元，甚至几千亿元的投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危房改造需几百亿元的投资，等等。而浙江财政状况在全国是比较好的，但财政的可用财力也只剩有一千亿元左右，即使全部用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是捉襟见肘。因此，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财政只能是发挥杠杆和导向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尽量避免大包大揽。

二是要取消行业限制，为民间资金投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当前，不少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但民间资本实力雄厚，且大量闲置。民间资金大量闲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



民间投资渠道狭窄，投资品稀缺。因此，要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制定一些吸引民间投资的办法、程序、规定，引导民间投资。尤其对那些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村公共投资，应优先鼓励民间投资，这既为农村公共建设开辟了资金来源，也为民间资金提供了投资渠道，实现互利互惠的“双赢”目标。

三是要制定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新机制。为了提高民间资金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吸引力，需要通过发挥财政支持的导向功能，建立投资的激励机制。首先，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村基础性投入，为民间投资主体增加对农村公共投资提供示范作用。其次，政府要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民间投资给予优惠和鼓励，以吸引民间资金投向农村。最后，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民间办项目的补助。逐步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内资和外资，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相结合的多元化的投入新机制。

增加政府的财政储备，建立财政的应急机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对社会总产品进行个人分配之前，首先必须做如下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建立后备是防范天灾、人祸所必需的。而农村是自然灾害的重灾区，据公安部的调查，我国近 70% 的火灾和 60% 的火灾死亡人员



发生在农村。自然灾害大多发生在农村的事实说明，应对自然灾害是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政府应增加财政储备，建立一种有效的、能随时运作的应急机制。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一方面，传统的政府审批经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尚没有全面退出；另一方面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还在摸索、建设中，表现为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明显缺位。从适应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看，我国的政府职能需要逐步从单一的优先发展经济的目标转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上。建立政府的应急机制，是适应这一转变的重要方面。为此，政府在市场无法提供产品的领域，如国家安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等方面，合理界定新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动力。

二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的支出结构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以确保政府职能的履行。调整现行财政支出结构，符合合理配置财政资源、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改革方向。我国现行的财政目前用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支出，在整个公共支出中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确保各项重点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当对现有的支出结构进行调整，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出发，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如压缩行政管理费，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逐步减少经济建设费，集中一定的财力来重点增加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公共投入。

三是增加财政的预备费。政府应对应急的开支，主要动用



财政预备费。财政的预备费是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考虑到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偶然性，财政的预备费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规模，否则影响财政的正常公共支出。但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应对危机财政要有所准备，在每年的预算安排中要适当增加预备费的规模，以减少后续年度的财政压力，缓解财政危机。

四是编制应急预算，为突发性公共事件投入的资金筹措建立应急机制。由于突发性危机的偶然性，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必须有备无患，这要求建立一种筹资的应急机制，编制应急预算自然成为首选。应急预算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预算安排、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捐赠，以及外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捐赠，以便危机发生后，资金能很快到位，为应对突发性事件提供制度保证。





治理收费公路 财政责无旁贷

“**要**致富，先修路”。公路是交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是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的钥匙。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财政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我国依靠社会力量，按照共同筹资建设的方式，发展了不少收费公路，这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我国的交通面貌，对实现城乡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收费公路也是一



把“双刃剑”，大量的收费公路，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了地区之间的便利交流。2008年，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发现了不少问题，这应该引起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

正确看待收费公路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有10万公里在中国，约占全世界的70%。据国家审计署2006年对全国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的审计，除北京和上海外，“十五”期间16个省（市）收费公路规模增加较快，新增二级以上公路的67%为收费公路，总里程达6.35万公里。大量收费公路的建设和存在，说明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必须正确看待。那种“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采取否定一切或一味的肯定，都不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收费公路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突破了所有制界限，发展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靠社会资本和外来资本，乡镇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各种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等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旺起来，我国逐步取代了亚洲“四小龙”，成为世界加工中心。加工工业的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交通运输业相配套，否则，交通运输业就成

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受国家财力的限制，我国的交通运输业一直滞后加工工业发展，运输紧张、行路难、交通堵塞等到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发展交通，修建公路，改变落后的交通面貌。

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没有资源优势的日本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内陆国家瑞士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关键是选择了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选择了制度创新。在财力有限而又不得不大力发展公路建设的情况下，政府的选择只能靠制度创新。于是，为了促进公路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提出在坚持发展非收费公路为主的前提下，可以适当“贷款修路”，建成后“收费还贷”，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这样，收费公路开始在我国发展起来。可见，在我国发展收费公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的战略选择，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正确选择，有其必然性。

2. 收费公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迅速改变交通面貌。依靠社会力量，利用民间资本，发展交通事业，大力增加对公路建设的投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我国的交通面貌。发达国家在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事业，我国只用了几年、几十年就完成。经过这些年各地的努力，我国公路建设的网络基本形成，缓解了交通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实践证明，推行收费公路的政策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到2005年底，全国高速公路由零公里发展到4.1万公里，一、二级公路由1.9万公里发展到28.47万公里。和全国不少地方相比，浙江省的交通尤为滞后，公路建



设的任务更为艰巨。近年来，依靠国家的政策，浙江省开始了大规模的高等级公路建设。1995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用3年时间，全线拓宽省内主要干线1000公里，形成杭州向各市辐射的一、二级加宽公路网络；同时用8年的时间，建成1000公里高速公路，形成杭州向各市辐射的高速公路网络。1998年年初，省委、省政府又进一步提出到2002年年底要建设1000公里高等级公路，建成和基本建成沪杭等一批高速公路，使杭州与陆上各市均有高速公路相接，形成省会至各市之间的“四小时公路交通圈”。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浙江省的公路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由2000年的627公里增加到2006年的2382公里，一级公路由2000年的999公里增加到2006年的3410公里，二级公路由2000年的4212公里增加到2006年的7710公里，2002年基本实现了省会城市与各市（地）之间“四小时公路交通圈”的目标。

(2) 实现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目的。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公路建设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但是，在政府财力紧缺而又不得不大量建设公路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公路建设，尤其对一些预计车流量比较大，可以走市场化道路的一些高等级公路建设。这样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财力办大事，缓解交通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双赢”。同时，通过政府政策的优势，也可以合理调节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扩大投资，刺激消费。从浙江省的情况看，充分利用国家“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仅“四自”公路（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从1992年至今，全省已经批准11批，计233项，总里程达5860公里，总投资约718亿元。



收费公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大量收费公路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必须看到它的危害性。我们知道，政府大力修建公路，发展交通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保持道路的畅通，保持人、财、物的交流。而政府如果仅仅站在经济人的角度，以收费为目的，把公共产品当作私人产品来经营，就必然违背政府修路的初衷，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1. 收费公路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

国家允许地方建设收费公路，本来是在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发展公路建设的权宜之计，是公路建设的补充形式。国家规定二级以上公路应坚持“非收费公路为主，适当发展收费公路”，并不要求二级以上公路都利用银行贷款修建，但不少地方出现过度利用国家“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在政府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主要靠银行贷款建设了大量的收费公路。这种不顾财力可能，仅凭借政府的信用关系大量负债，必然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影响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审计显示，“十五”期间浙江等10个省（市）收费公路投资完成额6400亿元，其中投入的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资金高达4700多亿元，占73%。如浙江省公路建设完成投资161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达1400多亿元，占85%以上。黑龙江等5个省（市）260多条公路项目拖欠工程款87亿元，拖欠时间有的已达六七年。大量借债建设收费公路加重了建设方的债务负担，至2005年底，18个省（市）收费公路银行贷款余额高



达 8000 多亿元。此外，除国家主干公路的效益相对较好外，一些收入来源缺乏保障的收费公路，主要是部分地方高速公路等项目的使用效率明显低于预期，存在偿债风险。如吉林省 2005 年政府还贷公路通行费收入扣除运营成本后只有 5.88 亿元，仅为当年应付贷款利息 13.15 亿元的 45%，贷款本金无法偿还。

2. 收费公路收费标准高，增加了社会成本

公路作为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只要依法纳税，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居民就拥有享受权。按理说，国家发展收费公路不能也不应该以收费和营利为目的。但在国家财力困难、国家不能充分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利用社会资本发展收费公路，可以作为公路建设的补充，但收费标准必须低，且国家也应根据财力可能及时取消。但是，我国目前的收费公路不仅收费期限长，而且收费标准高，消费者负担重。2008 年 2 月 12 日，世界银行专门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高速公路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披露，德国目前货车平均每公里过路费是 0.15 美元（约合人民币 1.14 元），中国是 0.12 ~ 0.21 美元（约合人民币 0.9 ~ 1.59 元）。而在车辆通行费所占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中国以超过 2% 居首位，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中国高速公路通行费较高，而且中国的通行费可承受性是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和居民的收入水平不相适应。

同时，高速公路的收费年限长，且经常变更收费年限，甚至有些收费年限到期了还继续收费。如投资 33.8 亿元的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经测算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收费年限为 12.65 年，但批准的收费年限为 30 年，按 2005 年收费水平测



算，将增加社会负担 275 亿元。1999 年，北京市将北京至石家庄高速公路北京段等 3 条已收费 3~12 年的政府还贷公路，划转给新设立的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使之变为经营性公路，并重新批准收费 30 年。

3. 收费公路导致了公路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

土地是国有资源，也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尤其是在人多地少的我国，土地更加珍贵。由于修建公路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就要求修建公路要合理规划，适度超前，减少浪费。但由于修建收费公路有收费的政策，不少地方不管财力可能，重复建设，违规征用，盲目发展，造成大量土地资源浪费和土地闲置。审计调查 17 个省（市）667 个收费公路项目，共征用土地 272 万亩，其中违规审批、未经批准占用、以绿化及服务区建设等名义多征占和闲置土地达 96.2 万亩，占征用总量的 35%。部分省（市）在公路密度已超过 50 公里/百平方公里的情况下，仍大量建设收费公路，且多数项目未按照“占一补一”原则补偿占地数量，地方政府越权审批立项和征用土地。

治理收费公路财政责无旁贷

收费公路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的一面，治理收费公路不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发挥政府财政的职能作用，并借鉴国外的做法，吸收成功的经验和吸取错误的教训，加以清理和治理。

1. 提高对公路作为公共产品的认识，增强政府的投资



责任

公路是不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有不同的认识，存在争议。有的认为，公路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主要应该由政府投资建设；有的认为公路不纯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不该由政府为主投资，政府不负主要责任。那么，公路是不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呢？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把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大类。私人产品是指由私人部门提供的，只能由某个具体的社会成员来消费的产品；而公共产品是指那些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产品，社会某成员的消费不影响其他成员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公共产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这是衡量社会产品是私人产品或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一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三是受益的非排他性。从公共产品的特性看，公路具备公共产品的特性，完全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政府的公共财政，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因此，那种认为“公路不纯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不该由政府为主投资，政府不负主要责任”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反之，那种认为“公共财政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实用主义做法也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提高对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认识，承担起公路建设的主要责任。

既然公路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那么，国家为什么又出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修建大量的收费公路呢？这是基于当时财力的限制，国家作出的正确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力薄弱，改革发展的任务又十分艰巨。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把未来的钱提前用”、“利用民间的

资本搞建设”等“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理财方法”是聪明的、是有成效的，这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大量的公路建设，缓解了交通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起飞。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我国的财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分税制以来的十多年，我国财力增长迅速，1994 年，我国财政收入为 5218.10 亿元，2007 年达到 51304.03 亿元，增加了 8.8 倍，2004 年以来的每年新增加财力都超过 5000 亿元。如今的财力和当年的财力不可同日而语，对一些财政“缺位”的要“补位”，当然“错位”的要“退位”，在公路建设方面的欠账，政府应该给予必要的弥补，承担起公路建设的重任。

2. 取消一、二级公路收费，扩大政府对公路的公共投资

世界上的收费公路主要集中在我国，不少国家公路是不收费的，即使收费标准也很低。如俄罗斯的公路是不收费的，德国只对大卡车收高速公路费，韩国虽然高速公路要收费，但国道不收费，而在美国 9 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其中收费路段只有 8000 多公里，且集中在东部城市。我国目前大量建设的农村公路也是不收费公路，2003 年，按照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开始大规模的农村公路建设，即康庄工程建设。据统计，2003～2006 年的四年间，全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87 万公里，其中沥青（水泥）公路 58 万公里。仅 2006 年一年，全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32.5 万公里，有 458 个乡镇（镇）、17764 个建制村新通了公路，有 1708 个乡镇（镇）、43962 个建制村新通沥青（水泥）路。到 2006 年年底，我国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到 302.6 万公里，有 98.2% 的乡镇（镇）、86.4% 的建制村通了公路，有 80.6% 的乡镇（镇）、60.3% 的建制村通了沥青（水泥）路。为支持各地建设农村



公路，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公路的投资力度。2001～2006年，国家车购税用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投资，由2001年的1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27亿元，占车购税的比例由5%提高到39.5%。中央政府的投资有力地带动了全社会对农村公路的投资，2006年，全社会对农村公路的投资达到了1597亿元。可见，不论是从国外看，还是从我国的农村公路建设看，政府是有必要和有能力从事公路建设的。由于一般公路（一、二级公路）替代能力弱，甚至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后，各地应停止一般收费公路的审批，新增加的一般公路建设应由政府为主体进行投资，政府应承担起一般公路建设的责任，让一般公路建设尽早回归到公共财政建设的轨道上。

对已有的一般收费公路也要逐步取消，由政府回收。其实，不少一般收费公路也运营困难，希望政府回收。从我们对浙江省部分一般收费公路调查情况看，一般收费公路运营困难带有普遍性。如320国道建德、桐庐段收费公路，由于杭千（杭州至千岛湖）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经320国道的车辆大大减少，每年的收费收入归还银行贷款的利息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偿还贷款本金了。104国道临海、温岭段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也由于甬台温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车流量减少而还贷困难。应该说，这也为政府回收一般收费公路创造了条件，减少了阻力。其实，这几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回收收费公路了。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宁波镇海采用“四自”公路模式，建设了宁镇骆一级公路，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推进，宁镇骆公路收费站影响了宁波、镇海



的投资环境和群众的出行，社会各界要求撤销收费站的呼声日益强烈。镇海区委、区政府以2亿元资金对宁镇骆公路外方股权进行回购，从2006年4月29日停止宁镇骆公路收费，宁镇骆公路成为浙江省第一条停止收费的“四自”公路。又如，2008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政府出资5050万元，收回境内史家敖包至榆树湾全长32.7公里的史榆线经营权，拆除了收费站。准格尔旗还将逐步回收其他公路经营权，最终实现境内公路全部免费通行。可见，无论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都开始意识到收费公路的危害、对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改善的负作用。因此，各地应根据财力的可能，积极创造条件，清理一般收费公路，还公路的公益性，让收费公路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3. 保持高速公路收费，缓解政府的投资压力

世界上的收费公路主要集中在中国，但也有一些国家的高速公路是收费的，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高速公路都要收费，韩国虽然国道不收费，但是高速公路还是要收费的，且收费标准也不低，主要是为了防止高速公路的过度拥挤，而导致高速公路不高速。有些国家虽然没有收费公路或者收费公路很少，但也打算扩大高速公路的收费。如俄罗斯虽然目前还没有高速公路，但2005年1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修建收费公路，着手建设俄罗斯第一批收费高速公路，即莫斯科—圣彼得堡市高速路及连接莫斯科大环与莫斯科—明斯克公路的外环高速公路。今后，随着公路建设的增加，养路负担的加重，俄罗斯政府规划建设一些收费的高速路，在一些车流量极大，且公路质量优良的地段，将视情况设置收费站。又如，美国很少有收费公路，但如今，由于美国各大城市迅速向外扩张，高速公



路的维护成本越来越高，收费式高速公路也成为越来越多的州际高速公路的营运方式。美国国会已经授权各州政府，可以在以前无须缴费的州际公路的某些路段设立收费站，并为修建更多的高速公路筹集资金。可见，保持一定的收费公路，尤其对高速公路采取收费的办法，也是世界不少国家的做法。

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大规模高速公路建设的任务，加上高速公路的投资大、建设成本高、周期长，且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应该而且只能采取收费的形式。根据国外的经验，发达国家一般都经历了集中 20~30 年时间大规模建设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期，然后进入稳定发展与完善期。如美国在 1956~1978 年近 22 年的高速公路快速发展期，平均每年建成 3000 公里，其中 1966 年一年就建成 1.6 万公里；法国、日本等国家也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经历了相似的快速发展阶段，经过 20 年的集中建设，基本形成高速公路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对高速公路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而我国高速公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才起步，根据交通部公布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从 2005 年起到 2030 年，国家将新建 5.1 万公里高速公路，使我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8.5 万公里。按静态投资匡算，国家高速公路网未来建设所需资金约 2 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 3900 亿元、中部地区 5200 亿元、西部地区 10900 亿元。在 2020 年前国家高速公路网将处于较快的建设阶段，预计 2010 年前，年均投资规模约 1400 亿元，2010~2020 年年均投资约 1000 亿元。从浙江省的情况看，未来高速公路建设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到 2015 年要基本建成 5000 公里高速公路。仅“十一五”期间，浙江省



将要投资 1370 亿元，使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3700 公里。同时，高速公路建成后，为了保持安全畅通、整洁美观，还需要有大量的养护投入。据统计，2003 ~ 2007 年的五年间，浙江省高速公路养护经费投入 42.29 亿元，其中，2006 年投入约为 10 亿元，2007 年约为 11 亿元，2008 年将要投入 14.2 亿元。因此，未来高速公路建设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如果单靠国家投资发展高速公路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应该吸收社会资本，采取收费的形式。但是，收费要有收费的限制、收费的规则，国家要加强高速公路的收费管理，必须严格控制收费年限和收费标准。收费年限应根据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车流量等指标来确定，而不应规定统一的收费年限，车流量大的、建设成本低的，收费年限也相应短。至于收费标准可参照世界银行提出的车辆通行费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同时考虑消费者的承受力来确定，标准不能定得过高。年限到了必须停止收费，多收的钱也要严格使用，严格管理，主要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杜绝用于楼堂馆所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

4. 开征燃油税，为公路建设筹集资金

治理收费公路，关键还是资金问题。目前，我国的公路投资主要靠银行贷款、养路费、车购税、财政预算拨款和吸收社会资本来筹集资金。在国家投入少而公路建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我国的高等级公路（指高速公路和一、二级公路）又以银行贷款和吸收社会资本为主，这是我国收费公路大量存在和大量发展的原因。其结果是：一方面我国的公路建设债务、政府的债务风险大；另一方面大量的养路费用于公路建设，公路的养护资金缺乏。从国外的情况看，公路建设有专门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燃油税来筹集建设资金。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建



设，全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建设，没有采用设立收费站的方式，在资金来源上，联邦政府出 90%，州政府出 10%，其中联邦资金由“联邦公路信托基金”提供，这个基金 87.6% 来自美国政府征收的机动车燃油税。也就是说，谁用的油多，使用道路多，谁缴的税就多。通过征收燃油税筹集公路建设资金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130 多个国家开征了燃油税。

和征收养路费相比，开征燃油税，符合“多用路，多烧油，多纳税；少用路，少纳税；不用路，不纳税”的公平原则，可有效抑制对燃油的过度或不当消费，节约能源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更为关键的是，开征燃油税可以切断“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源泉，有利于治理公路收费。近年来，不少地方热衷于“公路经济”，纷纷采用贷款、合资等方式修建公路和桥梁，还有的地方甚至由企业、个人投资修路，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因素，就是想依靠收取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来获得稳定高额的投资收益。当然，燃油税改革以后，油价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只要其他收费相应取消，消费者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尽快开征燃油税以弥补公路融资缺口，也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其实早在 1997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公路法》就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养路费。1999 年 10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公路法》修正案，正式将“燃油附加费”改为“燃油税”。应该说，国家酝酿征收燃油税已有十多年，但主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力和在国际油价不断上涨情况下的社会承受力，燃油税迟迟没有出台。

当前，随着国际油价的下降，给我国燃油税的出台提供了



机会。既然燃油税是绕不过的弯，国家就应该在财力较好、政府财政有承受能力，并充分考虑消费者承受力的前提下，及时出台燃油税政策。同时，考虑地方既得利益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燃油税既不能作为中央税，也不能作为地方税，应作为共享税，可以采取二八或三七的分成比例，大头留给地方，这有利于和养路费的衔接，也符合燃油税收入多，建设任务重的实际。考虑到我国国土面积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中央财政需要集中一部分燃油税，用于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建设和地区之间的调节。



财经创新思路

闻





独具魅力的 省管县财政体制

1994年我国推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经过十多年的运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基本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也遇到不少困难，尤其是基层财政困难，不少地方基层政府运转困难，甚至发不出工资，影响了基层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实现，而这其中，唯独浙江省独善其身，基层政府没有发不出工资的，基本公共服务比较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协调，这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究其原因，由于浙江省实行的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样，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头，省管县的财政体制逐步被各地接受并开始推广。财政部决定 2012 年之前全国要全面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

看准了就要坚持

改革开放 30 年的实践证明，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任何一项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改革也一样，关键看能不能坚持。

所谓省管县财政体制，即省级政府将收入考核、转移支付、财政结算、资金调度、项目申报、债务偿还工作部署等直接下到县级政府。地级市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与辖区内的县没有对应的结算关系。省以下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并不是浙江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省以下实行的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后来由于体制的调整和经济发展变化等原因，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县（市、自治县）、乡（镇、民族乡）五级财政。浙江省于 1971 年建立地区（专署）财政；1986 年基本建立乡（镇）财政，也形成了省、市、县（市）、乡（镇）四级财政。许多原本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先后改成市管县的财政体制，而浙江省 1953 年以来一直延续省管县财政体制。



这除了省管县财政体制自身的优势比较符合浙江经济发展外，关键在于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在浙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过多次的波折和争议。早在1985年前后，有些市长、专员就向省主要领导提出浙江的财政也要市管县，由于受到县（市）的强烈反对而流产。1994年，在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并规定“原则上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背景下，以保持市领导县（市）的完整性为由，要求县（市）财政归市（地）管理的呼声非常高。1995~1997年期间，不但省财政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1998~1999年期间，省委、省政府决定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质疑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意见接连不断。省里就从调节省与市（地）、县（市）的利益关系入手，一方面加大对地级市财政的财力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地级市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撤县（市）建区，如撤销萧山市、余杭市并入杭州市，撤销黄岩市、椒江市并入台州市等，扩大地级市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不仅坚持下来，而且不断得到完善。

这边风景独好

财政体制有没有魅力，关键看实践的成效。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1994年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浙江继续实行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省与市县按分税制的要求，实行分税、分享，在分税的基础上，省财政对市、县（市）财力增量集中了“两个20%”，即地



方财政收入增收额的 20% 和税收返还增加额的 20%，对少数贫困县和海岛县适当照顾。在集中财力、增强省级财政调控能力的前提下，浙江省针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理财思路，即加大对县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把转移支付的重点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浙江省从省情出发，在坚持省管县的前提下，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推行了具有浙江特色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推进浙江省经济跨越式发展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1. 提高了行政效率

行政组织每多一个层次，信息的失真失落率就会增加，信息传递的速度要减慢，这是不言而喻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减少了市这一层级，省与县的信息沟通，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都要比省管市、市管县相对要快、要有效。省直接管县，减少了行政管理的层次，简化了各种审批程序，减少了审批环节，提高了县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使县级政府能因地制宜履行职能，其决策和管理更贴近基层实际，更加直接、近距离地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服务，也有利于全省经济政策、财政制度的统一和规范。

2. 增强了县域经济实力

县域经济发达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经济强县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提高了财政管理效率，有利于防止地级市的财政截留，调动了县（市）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为县（市）有较大的决策空间，又有较好的财力保障，使浙江省全省县域经济、财政得到快速发展。就浙江经济而言，县域经济的各项指标，包括税收、出



口、工业产值占了全省经济总量的 40% ~ 70%，县域经济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80%。连续多年，在全国百强县评比中，浙江省百强县的数量在全国各省中居第一，2007 年，全省有 25 个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行列。经济的发展，壮大了县（市）财力，2007 年，全省 58 个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全部超过亿元；2003 ~ 2007 年，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26%，比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高 2.4 个百分点。

3. 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能够较好地增强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从而可以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可以确保分属不同地区的县能享受到全省统一的、相对公平的转移支付补助，避免由于地区间财力状况的差异，造成好的地区更好、差的地区更差的状况，对促进区域、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稳定财政状况起到重要作用。2005 年，县（市）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与市级的比率为 1:3.0，县（市）人均财政支出与市级的比率为 1:2.3。2007 年，经济欠发达县（市）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较发达县（市）的比率为 1:2.17，经济欠发达县（市）人均财政支出与经济较发达县（市）的比率为 1:1.1。2007 年，从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看，最高县是最低县的 8.9 倍，而按财政供养人员计算的人均可用财力看，最高县是最低县的 3.6 倍。这说明省级财政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经济欠发达县（市）的作用更明显，欠发达县（市）财政收入增速虽然落后于较发达县（市），但是享受了与较发达县（市）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省管县财政体制保障了欠发达县（市）按国家规定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发放，保障了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费和最低生活保障费的支出，保障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困难孤寡老人集中供养、贫困家庭子女就学等方面的财政开支，保障了农村税费改革后不增加农民负担所必需的政府投入，保障了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生态保护等建设资金。

4. 实现了增强省级调控能力和培育县市自我供给能力的“双赢”

一方面，由于浙江省实行的是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增强了省级调控能力，同时也克服了层级过多和“雁过拔毛”的弊端，使得省级财政有能力和手段在全省范围内高效率地实现了财力的再配置。另一方面，通过抓住均等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促进了县市提高自身供给的能力。主要矛盾是财力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矛盾，浙江省通过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规范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消除了地方“等、靠、要”的消极状态，实现了省级公平分配和促进地方提高自身能力的“双赢”；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抓两头、带中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主要因素是“两头”贫富差距过大，浙江省侧重于抓好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这“两头”，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情况下，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在浙江省取得了成功，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那么，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能否在全国各省推广，会不会遇到水土不服，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省管县体制在全国推行是



可行的，因为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不是浙江省的创造，无非是浙江省坚持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实行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

党中央、国务院对省管县体制的高度重视。分税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运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实现了改革的初衷。但是，由于财力的层层集中，分税制财政体制也造成基层财政困难，尤其是县乡财政困难，不少县乡财政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大量的政府性债务，影响了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浙江省，由于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基层财政运行良好，市县财政并没有出现赤字。浙江省实行的省管县财政体制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高度重视。财政部从 2005 年开始推行“三奖一补”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专门安排 150 亿元，按照以奖代补、将中央财政奖励与地方工作实绩挂钩的思路，实施“三奖一补”政策。“三奖”是：一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和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二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三对产粮大县给予奖励；“一补”是：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已明确指出：“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2006 年的中央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2006 年 9 月国务院



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继续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努力改善县乡财政困难状况，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进一步明确了省管县体制改革思路。党中央、国务院对省管县体制的高度重视，为省管县财政体制在全国的推行，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1. 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

省管县财政体制在一些省推行的进展不快，有些省主要拿区域面积大、交通落后、通信不灵、民族复杂等理由来推辞，或作为反对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理由。其实，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已基本解决。从交通条件看，国家对交通的投入不断增加，航空线路、机场越来越多；铁路越来越密集，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高速公路的里程不断增加，我国已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最多的国家，有一些省已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从通信条件看，不少省、市、自治区已实现了村村通电话、通有线电视、通广播，手机信号全覆盖。从信息化条件看，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电视的普及，我国的县一级政府基本推行了电子政务，信息的传输越来越方便。应该说，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使空间距离越来越短、越来越小，可谓“交通改变距离，天涯海角近在咫尺”，“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更何况在一个省内，而信



息化又为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推行，提供了技术支撑。基础条件不断改善为省管县财政体制推行创造了条件，越来越有利于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推广。

2.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十多年来，基本理顺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但是，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不快。尽管财政部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但不少省、市、自治区省以下仍实行的是总额分成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特点是按税种来划分政府间的财政收入，但目前我国省以下有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又以共享收入为主，收入的大头在中央，地方的收入体系不健全、不稳固，加上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税收结构不统一，按税种在省以下的四级政府之间划分收入比较复杂，难以实施。如果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加上“乡财县管乡用”，省以下的四级政府只有两级财政。五级政府三级财政，财政管理的扁平化，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难以推行的困难就迎刃而解，按税种来划分省以下的税收收入就有可能。因此，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需要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进一步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有利于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推行。

3. 公共财政调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市场调节“失灵”的地方，市场经济不能自身进行纠正，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国家预算，通过财政体制的安排进行财力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国家的层面看，国家正在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都是为了推进区



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但从各个省的层面看,同样面临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比如广东的粤北、江苏的苏北、山东的沂蒙山地区等都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要扶持这些地区的发展,在“市管县”的财政体制下,市财政不仅没有这个能力,不少市还出现“市刮县”的情况,从而导致“马太效应”的产生。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而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利于缩短这一进程,实现公共财政职能的完善。

4. 各地纷纷开始推行省管县体制的实践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全国不少省积极创造条件,开始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或开始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试点,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有关报道了解到,安徽省政府决定,从2004年起,改革现行省管县、市管县的财政体制,对全省57个县(包括县级市)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2004年4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全省除恩施自治州所属的8个县市外,其余52个县市全部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2004年7月起,吉林在全省41个县市全面推行县域扩权改革,并在财政体制上实行了省管县。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2005年江西省在2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并计划在2010年前对所有县市实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为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陕西省政府决定,从2007年起,对全省15个县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据统计,2002年以来,全国已经有18个省试点“省管县”财政体制。2009年7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要求2012年底之前全国非民族自治地区要全面推行省管



县财政体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众人拾柴火焰高”。浙江省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实践，为省管县财政体制在全国各省的推行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省管县财政体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正向全国推广。





综合改革强财政

财政是经济的“晴雨表”，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财政影响经济，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样，经济反作用于财政，决定着财政盘子的规模和财政作用能力的大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义乌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县级市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县级市，中国著名的百强县，走出一条“以市场化带动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典范。义乌的商贸城、义乌的“小商品指数”影响世界，誉满全球。义乌的发展、



义乌的辉煌，离不开财政的支持。义乌的综合财政改革为义乌发展、为义乌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综合财政改革义乌先破题

鲁迅先生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是勇士。义乌综合财政改革起步早，走在全国前列，是最早吃螃蟹的。浙江省目前在全省推行的“三个子”的公共预算改革，主要来源于义乌的实践。

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为了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提高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将财力逐步向中央财政集中。在财政“蛋糕”既定的情况下，财力层层向上集中，基层财政面临不少困难。面对困难，如何解决基层财政问题，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义乌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没有等、靠、要，而是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创新财政理财机制，创造性地开展财政工作。从 2000 年开始，义乌就在全国率先开始探索以“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财政监督全过程”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预算改革，即“三个子”的综合财政改革，开创了地方综合改革的先河。

首先，统筹公共收入，这是综合财政改革的前提，即“收入一个笼子”。政府的财力是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预算内，也包括预算外，以及各种基金和资源性收入，而长期以来，财政的理财主要着眼于预算内一块，对预算外的管理分散。义乌综合财政改革从清理单位和部门的银行开户着手，将



所有的政府性收入，无论是税收收入，还是非税收费，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共性资源收入，都归口于财政税务部门统一管理，资金全部纳入财政单一账户体系（国库或财政专户），禁止政府各职能部门向服务或管理对象直接收钱。

其次，编制综合预算，将预算内、外资金通盘考虑，这是综合财政改革的基础，即“预算一个盘子”。财政改革的难点是突破既得利益，变部门财政为政府财政。义乌综合财政改革从突破部门既得利益着手，在统筹政府公共收入的前提下，将财政预算从原来的一般预算扩大到综合预算，将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部门预算外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等所有收入都统一编入部门收入预算，实行预算内、外资金通盘考虑。财政部门再通过零基预算和细化预算的形式编制部门预算，统筹安排部门支出，实现所有政府收支一本账。

再次，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这是综合财政改革的条件，即“支出一个口子”。公共财政讲究资金的使用效益，而如何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困扰财政部门的难题，而长期推行的财政资金拨付方式，部门和预算单位之间层层划转，使大量的财政资金滞留在预算单位账户，财政资金的截留、挤占、挪用情况时有发生。义乌综合财政改革从资金的支付方式着手，在清理部门资金管理的同时，改革财政内部的资金管理办法，在财政内部成立预算执行机构，对历年财政账户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将各财政业务科室的政府性资金账户进行归并，把政府性的资金拨付和核算职能统一划归国库科办理，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采取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方式，通过建立单一账户支付体系，将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都通过银行清算系统，从单一账户支付到产品和劳务供应商或用款单



位。通过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取消了一切收入过渡账户，将所有的政府财政性资金按预算级次全部集中到国库账户；所有的财政支出都要通过预算安排，并由国库直接支付，从而为综合财政改革创造了条件。

综合财政改革成效有目共睹

义乌综合财政改革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逐步健全了财政管理制度，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了义乌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确保了公共财政体系在义乌的建立和完善。

一是实现了集中财力办大事。政府财力是政府可支配和使用的财政资金，政府财力是个宽泛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政府财力是指一般预算收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规费收入、罚没收入等，其中以税收收入为主，约占90%以上。广义政府财力，除了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国有资产转让收入等各种非税收入，以及政府债务收入等。改革开放之前，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规模很小，政府财力主要由一般预算收入构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放权让利，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增长非常快，不少地方的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内收入是并驾齐驱，但不少地方这块收入由政府的各个部门掌握，没有纳入预算管理。政府财力的分散，使得政府性资金的整体作用难以发挥。义乌通过综合预算改革，将预算内外资金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为地方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



能。义乌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000 年为 5.0 亿元，2008 年增加到 37.79 亿元，年均增长 28.77%；而通过综合财政改革，义乌地方财政可用财力明显增强。2000 年，义乌市全面实施综合财政预算时，地方可用财力达到 23.60 亿元，2008 年则高达 106.6 亿元，是 2000 年的 4.52 倍，年均增长 20.74%。2000 年义乌市筹措预算外资金 5.6 亿元，支持了全市 51 项重点工程建设；2008 年筹措非税收入资金 20.93 亿元和政府性基金收入 34.45 亿元，支持了全市 70 项重点工程建设，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推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目标和改革要求，这就要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打破城乡“二元”的格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政府财政来说，公共财政就要覆盖广大农村，要向农村倾斜。而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主要是城市财政，财政也主要管城市这一块，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各种免费的公共服务，而农村居民很少能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农民种粮要缴农业税，农民子女上学要交费，甚至要赞助，农村修路要集资，等等。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财力有限，政府的财力还难以顾及农村的公共需求，难以满足农村的公共服务。而义乌市综合预算的推行，增强了政府的财力，使政府推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有了财力基础，加大了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力度。2002~2008 年，义乌市财政对“三农”的投入累计 106 亿元，年均增长 18.7%；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截至 2008 年底，全市参加各类保险的人数已达 148 万多人次，养老保险实现企业全覆盖，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人数超过 17 万，有 52 余万城乡居民参加了大病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88.02%，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率达100%。同时全面实施“康庄工程”，提前实现行政村等级公路通村率和硬面化率“双百”目标，城乡公交通达率提高到98.37%。在完成投资1.45亿元、日处理能力7万吨的义乌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基础上，全面启动总投资5.0亿元、日处理能力31万吨的城乡一体布局的6个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建设垃圾填埋场三期工程，共计投资3800万元，填埋容量达349.4万立方米，逐步实现城乡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按照“政府补助、市场运作、信贷扶持、农户自筹”的思路创新筹资机制，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市财政每年专项安排农村建设资金达1亿元以上，大力推进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2008年底，市财政共计拨付新农村建设资金4.77亿元，全市共有538个村完成了村庄整治，151个村开展了旧村改造，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联动”的城乡发展新格局。

三是规避了政府的债务风险。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财政不允许发生赤字，但地方财政存在大量的负债是不争的事实，发达地区也不例外，这实质是变相的地方财政赤字。其实，地方政府债务，有些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有些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资金调度使用得当，而实行综合财政改革，就是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好办法。因为实行综合财政，推行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后，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都在财政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下运行，各预算单位的经费只通知用款额度，当实际发生支出时才将资金从国库中拨出，这样资金沉淀的地方是国库而不是预算单位的账户。同时，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财政资金管理分散、各支出部门和支出单位多头开户、重复开户的混



乱局面，这有利于财政部门对资金的统一管理和统一调节，大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控制。因为家底清楚了，财政部门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能不借债务的尽量不借，能少借债务的尽量少借，可以大大规避地方财政风险。2004年年底，义乌市镇街两级政府性负债总额达15.68亿元，其中银行借款14.18亿元，每年仅利息支出就近亿元。至2008年年底，义乌全市市级财政负债总额为7.58亿元，镇街级的政府性负债余额为3.62亿元（均为借用市财政间隙资金），债务率（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53%，负债率（负债占可支配财力的比例）为16.11%，远低于浙江省规定的分别为10%和100%的限制水平，债务率与负债率完全控制在警戒线之内，政府性债务做到适度、有为、可控。2007年浙江省政府专门在义乌召开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现场会，推广义乌市的做法，控制并逐步消化地方政府债务。

四是从源头上确保了政府机关的廉洁高效。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财政性资金分散，财政性资金得不到有效控制。实行综合财政改革，推行财政国库集中收付，设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所有的财政性收入由执收部门直接缴入国库，不再经由任何部门和中间环节。所有的财政性支出根据事先编制的部门预算，由财政预算安排，工资性支出由银行直接支付；大宗购置、维修支出实行政府采购，由国库将资金直接拨付给供应商；预算单位零星支出，由单位支出财政审核拨付。一切都在公开、透明条件下运行，没有中间环节，这样就对财政性资金起到了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截留、挤占、挪用、贪污等问题就能得到制止，从制度上、资金的源头上有效遏制腐败。当家理财，权力比较大，风险也比较大，但风险是相对于制度而言



的。“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如果有了制度，权力受到约束，风险就能得到控制，即使有风险也是安全的。在没有推行综合财政改革以前，由于财政管理制度上有不少漏洞，给一些不法之徒可乘之机，义乌市在财政性资金管理上出过问题，有过教训，但义乌市推行综合财政改革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涉及财政性资金的腐败案件，综合财政从制度上、从源头上确保了政府机关的廉洁高效。

义乌综合财政改革经验值得总结

义乌综合财政改革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得到了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肯定，义乌综合财政改革是浙江财政改革的一个成功典型，改革的不少做法已开始在浙江省推行。在推进公共财政改革的过程中，义乌综合财政改革的经验值得肯定，值得推广。

一是综合财政改革必须从财政自身改革着手。正人先正己。改革是个痛苦的过程，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必须要有自我牺牲的准备和牺牲的精神，否则，改革往往会落空，或半途而废，甚至成为一句空话。义乌综合财政改革财政部门率先垂范，在清理部门资金管理的同时，改革财政内部的资金管理办法，在财政内部成立预算执行机构，对历年财政账户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将各财政业务科室的政府性资金账户进行归并，把政府性的资金拨付和核算职能统一划归国库科办理，实行一个“口子”拨付。这样，财政部门的率先垂范，减少了改革的阻力，有利于改革的迅速推进。



二是综合财政改革需要政府和部门的大力支持。改革是一场革命。综合财政改革，变部门财政为政府财政，取消权力和利益的关系，避免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一些部门的利益会受到影响，改革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这需要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这样，改革才能推进，改革才能成功。义乌综合财政改革是从“削藩”开始的，即从清理预算外资金开始，将部门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实行“收缴分离、罚缴分离、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预算外资金管理模式，割断“权”和“利”的联系，取消各部门的奖金、福利待遇与预算外收入挂钩，在此基础上，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管。同时，及时出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金制度改革方案，全市统一奖金发放项目，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调控。这样，弱势部门受益，强势部门不吃亏，综合财政改革得到政府各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受到社会的欢迎。

三是综合财政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各项改革政策措施的出台，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托、互相支持的，任何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离不开其他政策的配套和支持，而任何孤立的改革都是难以成功的、难以持久的。义乌市的综合财政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即“三个子”，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收入一个笼子”是前提，只有将政府的各种财政性收入统一纳入财政国库这个“笼子”，政府的预算就能反映政府收入的全貌，政府就可能统筹财力，通盘考虑，也才能增强政府财政的调控能力。“预算一个盘子”是核心，政府财政性收入的集中，政府各部门就可以按零基预算的方式编



制部门预算，按照轻重缓急的要求，将政府的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使政府预算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政府的预算就能公开透明，经得起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支出一个口子”是支撑，有了政府性收入统一的基础，财政部分就可以依据部门预算，按照用款进度，从财政国库单一账户直接将资金支付到用款单位或供应商。综合预算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互为依托，构成一个整体。

义乌市综合财政改革得到的启示

义乌市综合财政改革，作为地方公共财政建设的一种模式，它的成功运作、它的改革思路，对地方公共财政的改革和发展、对地方公共财政建设是有启示的。

一是构建公共财政地方是有作为的。1998年，我国提出了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提出，使财政改革有了目标和方向。但是，公共财政改革目标的提出并不等于已经建立了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如何构建，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标准的方案。由于各地的理解和做法不一致，以致出现“公共财政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实用主义做法，给公共财政的建设造成紊乱，影响了地方公共财政的建设和发展。义乌市的综合财政改革，提出了“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的改革思路，目标明确，思路可行。这给地方公共财政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地方财政如果能够做到“三个子”，可以说地方公共财政的框架初步建立。



二是振兴国家财政是可以实现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振兴国家财政的重大任务。当年，江泽民同志在给《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的批语中指出：“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固、安全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证”，因而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前提下发挥国家财政宏观调控的需要。振兴国家财政的目标提出已有10多年，但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振兴。而基层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财力分散，大量的财政性资金游离在财政管理之外，不少地方财政仅仅管到预算内这一块，导致财政职能的弱化。义乌市的综合财政改革，仅仅是财政分配制度的调整，地方财政的可用财力大大增加。笔者曾经也就某地的财政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作过测算，如果仅预算内一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20%；如果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等，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0%以上，基本达到分税制改革提出的财政收入占GDP 30%的目标。可见，只要分配合理得当，振兴国家财政，是能够实现的。

三是解决基层财政困难地方是有潜力可挖的。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财权的层层集中，事权的层层下放，导致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困难，县级政府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下降。如何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目前普遍认为，国家应该下放财权，甚至是给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义乌市通过综合财政改革，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没有调整的前提下，通过财政管理的改革，调整财政分配关系，壮



大了地方政府可用财力，实现了集中财力办大事，逐步缩小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缓解了基层财政困难。义乌市的实践表明，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地方是有潜力可挖的。地方政府不能眼睛总是朝上，寄希望于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而应该着眼于地方实际，挖掘潜力，增收节支，确保地方政府职能的实现。





消赤化债活乡财

乡镇财政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财政，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改革思路，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建立了乡镇财政。这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镇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矛盾，不少乡镇政府出现了大量负债，其实质是乡镇财政赤字，严重影响了乡镇财政的发展。浙江省青田县从“消赤化债保平衡”着手，加强乡镇财政管理，消化了乡镇



政府负债，并建立了乡镇财政无负债的长效机制。青田县的做法引起了国务院、财政部和浙江省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温家宝总理专门批示，要求财政部派人调查研究，总结青田的做法和经验。浙江省省委书记赵洪祝也批示，要切实解决乡镇、县乃至市严重负债问题。

在基层财政困难，政府负债有不断扩大趋势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县，青田县“消赤化债活乡财”的做法和经验无疑值得肯定，对解决乡镇财政的债务问题有示范作用，对指导乡镇财政发展有借鉴意义。

“消赤化债活乡财”的实践

青田县位于浙江省南部，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县，辖10个镇、21个乡、1个管委会、436个行政村，总人口48.3万，人均耕地不到三分。青田县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基础较差，财政比较困难，曾经是浙江省8个贫困县之一，1997年才基本脱贫，是浙江省的经济欠发达县。2000年青田县乡镇财政负债面100%，负债额高达2465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25%，地方财政收入的50%，这对经济欠发达的青田县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经过7年的努力，到2006年全县所有的乡镇消化负债，实现了乡镇“零负债”。2007年、2008年继续保持乡镇“零负债”，乡镇无负债的机制得到了巩固。青田县消化乡镇负债的举措可用“调职能，健体制，严管理，强机制”来概括。

一是“调职能”，即调整乡镇财政职能。乡镇负债跟乡镇



财政的职能过大是分不开的。乡镇财政成立以来，乡镇财政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且上级有关项目的安排都要求乡镇配套，乡镇收不抵支只好负债。根据负债的原因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收入锐减的实际，青田县对乡镇财政的职能作了调整。加快了县级财政向农村的覆盖，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低保、合作医疗、集中供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科技进步、扶贫开发、生态保护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金，除少量按规定配套外，其余均由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保障，2004～2007年，县财政分别投入了2.48亿元、2.75亿元、3.5亿元、3.6亿元。对农业综合开发、乡村康庄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实施主体由乡镇政府调整为县政府有关部门，防止乡镇举债搞建设，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在安排农村公益事业和农业生产开发项目时，应足额安排资金，原则上不得留有资金缺口，一般不要求项目所在地乡镇安排配套资金。如确需配套的，应充分征求乡镇的意见。同时，实行乡镇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所有乡镇政府性投资项目，在报计划部门立项前，必须由财政部门审核建设资金来源。在条件不成熟、没有落实资金、没有纳入计划的情况下，乡镇一律不得擅自上项目，更不得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同时，青田县根据乡镇负债主要发生在乡镇的各类投资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的管理漏洞，2004年撤销了乡镇下属的9个各类开发公司、融资公司，消除了乡镇通过投资、融资公司向金融机构举债的可能性。乡镇的主要职能是为民办事，县财政专门安排资金给予保证。

二是“健体制”，即健全乡镇财政体制。财政体制实质是财权的划分，直接关系到乡镇财政的可用财力。乡镇负债的主



要原因是财力得不到保障，消化负债必须从体制着手。青田县财政体制的调整着眼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县财政对乡镇因税费改革而减收的资金，全部通过转移支付补助给乡镇，每年人均公用经费预算安排比县机关平均高 2000 ~ 3000 元，并每年安排 200 万元专项经费用于乡镇为民办实事，各类资金安排更大力度地向偏远和欠发达乡镇倾斜。同时，根据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的实际，实行乡财县管，将乡镇一级不完整的财政同部门单位一样纳入预算管理，建立了确保乡镇政府正常运转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保障机制。

三是“严管理”，即严格乡镇财政管理。乡镇财政的负债和乡镇财政管理混乱分不开，青田县消化乡镇负债从加强乡镇财政管理着手，县财政专门成立了乡镇财政管理中心，撤销了 32 个乡镇的 176 个银行账户，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将乡镇财政收支全部集中到乡镇财政管理中心进行核算和管理。对财政经费实行分类管理，严把专项经费专用关口，防止乡镇专项经费与经常经费混用，并建立了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统一平台，全面实施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投标制度。出台了政府资金绩效考评办法，对乡镇财政资金实施绩效考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是“强机制”，即强化乡镇财政运行机制。要使乡镇对消化负债有积极性，还要强化机制建设。青田县专门出台了“一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即乡镇政府做到当年收支平衡和按计划消化债务的前提下，按人均数给予乡镇一定额度的奖励。对化解乡镇债务工作有成效且化解目标任务完成好的乡镇，按其化解债务额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同时，把财政考核内容纳入县委、县政府对乡镇工作的综合业绩考核内容中，把



乡镇政府性债务纳入乡镇主要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从机制上保证减少乡镇举债。

“消赤化债活乡财”的意义

“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这是地方财政理财的基本原则，也是《预算法》对地方财政的基本要求。而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青田县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保平衡”的做法，不仅符合地方财政的理财原则，而且符合《预算法》的要求，这对加强乡镇财政管理，维护乡镇经济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乡镇财政赤字多、负债重的重要原因是一是乡镇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乡镇财政收不抵支。青田县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乡镇的职能要作相应的调整，乡镇的有些职能要收到县级，有些职能要收缩，有些职能要转变。财是政的基础，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乡镇职能的调整，一些职能的上收，意味着乡镇支出的减少，必然要求乡镇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这有利于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二是有利于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青田县通过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乡镇政府支出由县级财政给予转移支付，乡镇的公共建设项目由县级部门安排资金，不需要乡镇配套资金，乡镇政府的工作重点就从以前筹集资金、抓收入的事务中脱离出来，转向服务民生、服务群众，重点配合县级政府做好农村道路、自来水、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实现了乡镇职能的转变，这有利于加快公共财政向



农村覆盖，有利于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好农村的稳定。

三是有利于规范乡镇政府的理财方式。作为最基层的乡镇财政，财力薄弱，管理也薄弱。以致乡镇财政总有一种依赖思想，认为乡镇财政的困难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乡镇财政的困难上级财政总会给予解决的，不少乡镇存在对乡镇债务控制不严、花钱大手大脚现象。乡镇财政改革就怕一些乡镇政府不负责任的思维方式，最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形式主义作风。青田县消化乡镇财政负债，把消化乡镇财政负债和乡镇的可用财力挂钩，这有利于乡镇财政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有利于规范乡镇财政的理财方式。

四是有利于乡镇财政管理的规范化。由于机构不健全、人员素质低，乡镇财政一直是我国财政管理的薄弱环节，以致不少乡镇不同程度存在财务管理混乱、账物不清、多头开户、专款不专用、财务开支监控不严现象，乡镇负债在所难免。通过“消赤减债”实践，以此为契机，青田县进一步健全乡镇财政管理制度，对乡镇的财务进行了集中核算，加强了对乡镇财政的管理。这有利于乡镇财政管理的规范化，有利于对乡镇新负债的控制。

五是有利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包括农村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农村水利建设等，不少是由乡镇财政提供的，这样，一些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乡镇财政实力比较强的乡镇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就比较高；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乡镇财政实力比较弱的乡镇的公共服务水平就比较低，造成乡镇之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乡镇财政



“消赤化债”以后，青田县调整了乡镇政府的职能，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主要职能收到县级财政，由县级财政统一提供。县级财政就可以结合财力情况和各乡镇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通盘考虑，统筹规划，这有利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

六是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取消了乡统筹、村提留，取消了农村义务工和农村积累工，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不少地方农民实现了零负担。但是，不少地方由于乡镇财政困难，一些乡镇政府就想方设法向农民收费，农民负担面临反弹问题。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直接关系到农村综合改革的深化。青田县乡镇财政“消赤化债”，就使得农民负担反弹的源头被截断，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消赤化债活乡财”的启示

乡镇财政作为我国最基层的财政，乡镇财政的收支平衡有利于巩固基层政权、维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乡镇财政的“赤字多、债务重”严重影响了乡镇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消赤化债”是乡镇财政发展的共同问题和难题，尤其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乡镇财政赤字负债大有扩大的趋势。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青田县，着眼于乡镇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在地方财力有限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保平衡”。青田县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做法，对全国各地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是有启示的。

一是要处理好有为和无为的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职能不断扩大，财政不仅要满足政权运转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需要；财政不仅要满足城市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农村的需要。财政收支的矛盾是永恒的，需求无限和有限财力的矛盾是永恒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财政就可以持续发展；处理得不好，财政就会陷入赤字和负债的泥潭。青田县乡镇财政负债的消化，一方面是县级财政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低保、合作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减少乡镇财政的配套投入，要求各部门安排农村公益事业和农村生产开发项目，原则不要求项目所在地乡镇安排配套资金，这为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提供了条件。“消赤化债”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为了确保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各地在处理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以及防止“消赤化债”后乡镇债务的反弹，乡镇财政一定要处理好有为和无为的关系，乡镇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一些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或领域乡镇政府要退出，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让市场发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作用，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元化。同时，上级政府要为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创造条件，该由上级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要预留缺口，也要尽量减少甚至避免乡镇财政的项目资金配套，给乡镇财政的运转留有余地。



二是要处理好财权和事权的关系。“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事权是财权的基础，财权是事权的保障，是维持一级政府正常运转的前提。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通过所得税分享改革等举措，财力逐步向中央财政等上级财政集中，基层财政困难加重，尤其是乡镇财政。而农村税费改革，国家又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乡统筹，虽然这些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却是乡镇财政的重要收入，这又使得乡镇财政更趋困难。在乡镇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国家财政开始向农村覆盖，大量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要提供，乡镇财政的事权反而增加。“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这样乡镇财政陷入困难，出现赤字和负债是自然而然的。面对欠发达地区的实际，要在短时间内增加乡镇财政收入、改变乡镇财政的面貌是困难的。青田县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是从改变事权着手，减少乡镇政府的事权，将一些原来由乡镇政府承担的事权集中到县级政府，由县级财政统一安排资金，这就解决了乡镇政府的后顾之忧，使乡镇财政有了回旋的余地。乡镇财政困难是地方财政工作中的共同问题，困难的原因也是共性的，青田县的经验表明，各地要解决乡镇财政困难问题，消化乡镇财政负债问题，必须调整乡镇政府的事权，减少乡镇政府的职能，使乡镇财政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

三是要处理好激励和约束的关系。乡镇财政能否正常运转，机制是前提。这种机制体现在激励和约束的结合，只有激励没有约束，乡镇财政可能难以规范；只有约束没有激励，乡镇财政可能会束手束脚。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关键要调



动乡镇政府的积极性，使乡镇政府既有内在的压力，又有外在的动力，仅靠县级财政的孤军作战是难以取得实效的。青田县为了乡镇财政的“消赤减债”，推出了“一奖一补”政策，建立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把消化乡镇财政的负债和乡镇财政补助及奖励挂钩，把乡镇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结合起来，避免了“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做法，变逆向思维为同向思维，取得了实效。消化乡镇负债是一个积极性还是两个积极性，是孤军作战还是协同作战？显然，各地在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过程中，要发挥乡镇政府的职能作用，要建立一种运行机制，激励乡镇政府，变被动为主动，提高乡镇政府“消赤化债”的积极性。同时，这种机制也要有利于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以巩固“消赤化债”的成果。

四是要处理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乡镇财政的赤字和负债是由乡镇财政收支矛盾造成的，乡镇财政要“消赤化债”，必须加强乡镇财政管理，控制乡镇财政支出。乡镇财政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财政，承担了不少事权，也有支出的冲动，乡镇财政的管理也要与时俱进。但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全面推进，乡镇财政运行和管理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镇财政收入萎缩。而现行的乡镇财政管理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迫切要求改革，使之与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职能相适应。乡镇财政管理改革必须和乡镇财政的创新结合起来，仅仅局限于现有的管理模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难以起到对乡镇财政支出的约束作用。青田县为了解决乡镇财政的“消赤化债”问题，专门建立了乡镇财政管理中心，撤销了乡镇银行账户，实行“乡财县管”、会计集中核算，切实加强了对乡镇财政的监管。我国分税制的财政



体制决定了乡镇财政改革的方向是“乡财县管”，即通过县级财政直接管理和监督乡镇财政收支，规范乡镇的财政收支行为，促进乡镇依法组织收入，合理安排预算支出，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不合理增长，防范和化解乡镇债务风险，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维护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稳定，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乡财县管”是乡镇财政管理的创新，是乡镇财政管理的发展，既有利于调动乡镇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规范和节约乡镇支出，也有利于堵塞乡镇乱收费、乱开支和乱进人、乱举债的漏洞，控制了乡镇财政供给人员和债务的不合理增长。目前，全国不少地区都开始推行或推广乡财县管。实践证明，县与乡的财政关系实行“乡财县管”是可行的，是符合乡镇财政发展实际的，更符合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发展的实际。





爱你没商量的教育券

2001年9月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在全县发行教育券，在教育界产生了震动，引起了国家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的重视，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纷纷前来取经。长兴的做法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我国，教育券作为新生事物，长兴县“敢为天下先”，积极实践，勇于创新，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对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教育券的来源有依据

教育券制度最初的理念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中就提到“如果允许领取慈善基金的学生以及大学自费生自由择校，则可能引起大学间一定程度的竞争”。与其“自由放任”、“廉价政府”的思想相一致，斯密主张尽量避免政府对公民教育的直接干预，通过学生自由择校引发学校间的竞争以提高教育效率，从而开启了教育券的本质思路。教育券制度是由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 1955 年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弗里德曼针对当时美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教育制度僵化，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状，提出应改变对公立学校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由政府把经过预算的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直接发给学生，学生凭教育券自主选择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弗里德曼自由市场模型中的教育券可归为“无排富式”教育券，即所有适龄儿童可以获得等面额的教育券，自由选择不同收费标准的学校，不足部分由学生自己支付。1964 年，英国经济学家皮考克和怀斯曼对弗里德曼模型做了修正，主张应将教育券与学生家长的收入联系在一起，即教育券的价值应与家庭收入成反比。显然，皮考克和怀斯曼的收入关联模型开始引导人们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去看待教育券政策。1966 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的补偿模型进一步强化了教育券的这种公平功能。詹克斯建议给予贫困家庭儿童第二张补偿性的教育券，即“排富式”



教育券，以克服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学的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隔离。1983年，莱文提出了义务后教育阶段的教育券模型。所谓义务后教育是指政府或私立机构在义务教育阶段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机会，如大专院校、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提供的教育和培训等。莱文认为，教育券在刺激教育多样性和增强学生主体地位方面具有优势，“相对于义务教育，教育券在很大程度上更适合于中学后教育领域”。2002年，莱文进一步指出，教育券应以一种义务后教育津贴的形式出现，以突出教育券对终身学习的支持。莱文模型的创新性在于提出教育券应具有终身效力。

教育券理论深刻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的改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的选择教育运动中，由政府资助的教育券制度得到初步实施，90年代开始在一些地方逐步推广。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如智利、哥伦比亚、瑞典、芬兰、英国、波兰、澳大利亚、肯尼亚、荷兰等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都已经把教育券的设想付诸实践。从各国的政策安排来看，教育券制度的目标在注重教育效率的同时更多地强调教育公平。如美国的密尔沃基家长选择方案只资助低收入家庭学生进入私立的、非宗教学校就读；克利夫兰奖学金计划只资助低收入家庭儿童选择学校；佛罗里达州的“A+”教育券计划只资助那些就读于教育质量被评为最低级别即F级的学校的学生重新选择质量更高的学校。哥伦比亚的詹克斯模式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私立高中职业教育券计划都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券模式。



教育券是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理论规范。”制度作为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一般是可变并可以创新的。制度的变迁是新制度的提供者、需求者在制度市场上交易制度商品的博弈过程。在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选择集合中，如果存在一种制度安排，其实施的预期净收益大于现行制度，则当前的制度安排就处于非均衡状态，追求利益的动机将必然导致制度变迁。我国教育财政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模式——教育资源由政府行政配置、校长由政府任命考核。政府在教育领域既是管理者又是主要的投资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诸如所有者缺位、激励不相容、效率低下等制度性缺陷越演越烈。显然，现行的教育服务供求模式已不再是教育制度集合中最优的一个。

教育券作为实现公共权力干预与市场调节良好耦合的、以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均等教育公平为双重目标的一场革命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创新性在于：一是通过教育资源配置权力的市场化，使政府从对哪个学校拨款及拨多少款等微观管理事务中脱离出来，专司教育布局、教学监督、质量评估、政策制定等宏观管理职能。其制度优势是：既有利于克服传统分配体制下教育效率低下的弊病，避免公权行使过程中的“设租”、“寻租”现象，还能公众参与公共教育事务的决策过程提供制度通道。二是通过教育决策权的公众化，确保公民受教育权



得以全面有效地履行。公民的受教育权不仅是指拥有一个受教育的场所和机会，还应当包括选择教育形式的权力，而教育券正是确保公民受教育权得以有效履行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优势表现为：学生可综合考虑个性、经济条件、学费价格、学校特色等多方面因素自主择校，以实现自身“受教育权”的效用最大化；每位符合条件的适龄公民都可获得与其家庭经济状况相对应的教育券，以实现各阶层公民的教育公平化；教育经费由“隐性补贴”变成看得见的“教育券明贴”，以实现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透明化。三是通过办学权力的自主化，使学校能够提供多元化、个性化、高端化的教育产品。在政府“齐步走，一刀切”的“大一统”办学模式下，学校缺乏自主性，教师缺乏积极性，学生缺乏创造性，这与时代发展对教育产品的高端化、个性化需求日益脱节。而教育券作为一种倡导“校本管理”的制度设计，其制度优势表现为：为学校走特色化、多层次的办学道路提供了制度保障。由于学校获得的教育券以及其代表的经费与学校吸引的学生数量有关，学校就会在生存压力和发展动机的驱使下，以教育服务市场的需求为导向，按照独立市场主体的模式进行运作，进而形成独具魅力的学校品牌；黏合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解决财政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问题。出于经济人的考虑，一般家庭是不会放弃教育券这种既得利益的，于是，当教育券只能抵补部分学费后，家庭会以储蓄补足学费余额。另外，若政府将教育券的实施范围定为以其是否为社会提供所需的教育服务而非以教育机构的所有制为界限，就会为大量民间资本投资教育领域提供明确的政府认可和强大的利益驱动，从而增加教育的社会投入。



长兴教育券实践有影响

长兴县是浙江省的“小康县”和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但和全国其他县市一样，长兴县同样面临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如何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2000年长兴县教育考试团到美国进行考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了解到美国的教育券制度。在加州的公共财政中，教育经费平摊到每个学生的头上，通过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学生拿着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学校收了教育券，再去政府领钱。从美国的教育券制度得到启发，长兴县从2001年9月开始试行教育券。

2001年夏天，长兴县出台了《长兴县教委关于教育券的使用办法》、《关于加快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从2001年起发放“教育券”。新人民办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可获得一张面额500元的教育券，新人民办学校职高班的学生可获得一张面额300元的教育券。9月开学时，学生将教育券交到职业学校或民办学校，可以抵充相当面额的费用；学校把教育券交到教育局，教育局在审核确有此生到该校入学后，根据教育券金额数目发给该校相应的钱。当年，长兴县发放教育券约65万元，发券学生1800多人。针对那些因特殊原因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困难、丧失或部分丧失学费支付能力的学生，2002年，长兴县教育券的发放范围扩大到弱势群体，向贫困学生发放“贫困助学教育券”。当年秋天，全县351名贫困家庭的初中生、小学生，分别发放了面额300元和



200 元的教育券，全县贫困学生无一辍学。据统计，2002 年长兴县有 2400 多名学生拿到教育券补助，其中包括扶贫助学类 300 多人，职业教育类学生 2000 多人，民办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100 多人。发放教育券 160 多万元，其中 120 万元来源于财政拨款，40 万元主要是社会各界的募捐。目前，长兴县的教育券改革还在不断深化中，提出在高中阶段全面试行教育券制度的目标，这一设想分两步实施：2003 年 9 月到 2005 年 7 月，在高中阶段试行发放教育券；从 2005 年 9 月起，在高中阶段全面实施按学生人均培育成本核算拨给教育经费的教育券制度，实行高中教育经费拨款机制的重大改革。

经过几年的实践，长兴县试行的教育券制度对公开办学，节约教育经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为：

一是教育券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改善了投资环境，吸引了民间资本投资于教育事业。长兴县的民办学校起步于 1992 年，由于没有得到政府有力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民办教育发展缓慢。教育券的发行使得民办教育也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从而掀起了长兴县民办教育投资的高潮。2001 年，长兴县成功引进外来资金 4500 万元，新建了一所中学。近年来又兴建了由民间资金投资 1.3 亿元的一所中学。

二是教育券发挥了政策导向作用，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教育体制很大的弊端是教育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职业教育滞后，培养的学生缺乏一技之长，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长兴县教育券试行两年多来，长兴县的职业教育形势有了较大的变化，职业教育招生向好，普教和职教得到了协调发展。据统计，2000 年长兴职教



招生 1403 人，职教和普教招生之比仅为 0.73:1；2002 年增加到 3306 人，招生比例达到 1:1。

三是教育券促进了竞争，提高了教育质量。长兴县教育券的推行，在进一步引进私人资金和外来资金投资教育的同时，也改变公办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学生可以凭借教育券选择学校，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四是缓解了贫苦家庭的困难，有利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长期以来，我国对困难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给予困难补助的方式是把现金发放给贫困生。这种补助方式容易造成资金挪用。用教育券代替现金，确保了专款专用，也规范了贫困助学金的管理。长兴县之所以能够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学生因贫困而失学，这也充分显示教育券的生命力。

从教育券受到的启示和思考

长兴县推行教育券的改革，经过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教育券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发挥出的特殊功能，开始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目前，浙江省已有不少县市开始效仿长兴县的做法，开始推行教育券，全国也有一些县市已经或准备试行教育券。全国有不少地方扩大了教育券的使用范围，对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的培训，也采用教育券的形式，教育券的影响远不止教育系统，可见，推行教育券所产生的效应不可低估，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和思考。

一是树立一个观点，公共产品不一定要政府提供或政府生

产。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提供，政府也一直承担着教育的责任，教育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占大头，不少地方财政教育负担重。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开始发展，有部分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教育领域，投资教育。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件好事，一方面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同时，也证明公共产品不一定由政府包办，私人能做的政府应提供方便。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由私人办，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如何支持？教育券的推行，使问题迎刃而解。私人可以通过教育的竞争，凭借争取到的教育券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公共产品不一定要政府提供，私人能提供的，政府应放手给予支持，以提高效率。

二是扩大教育券的使用范围，发挥教育券的功能。财政的作用范围跟财政的能力成正比。随着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的提高，财政实力的增强，公共财政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广，但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再强的财力也无法满足无限的财力需求。教育券的成功实践，使人们对教育券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政府可以利用好教育券，充分发挥好教育券的作用。除了义务教育外，对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下岗职工培训、农民工的培训等，政府应给予支持，但政府又不能包办，政府也可以发教育券。通过教育券的形式，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用，支持职业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职业技能。

三是按教育券的思路，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关系到民族的竞争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发展好教育、办好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容不得半点马



虎。教育券作为教育的一种制度创新，教育券的成功实践，体现了一种思维，提供了一种思路，解决教育问题靠创新。

四是发挥教育券资源配置的功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这是财政资金使用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财政困难，在财政教育投入不足的前提下，更要发扬勤俭节约的作风。推行教育券，可以支持各类主体投资教育，有利于鼓励竞争，有利于教育的公平发展，从而使教育的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功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是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除了教育制度创新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教育券作为财政教育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节约教育资金，这是教育发展中必须要做的、要坚持的，但对发展教育来说，这仅仅是治标，不是治本。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还是教育投入少。应该说，政府财政对教育投入的绝对量并不少，每年都有增长，但教育投入的相对量，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重，无论是和发达国家比，还是和发展中国家比，都显得低。不少地方教育还靠“希望工程”，这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不应该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众说纷纭消费券

2008 年底和 2009 年初，成都市和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向市民发放消费券。“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不少城市纷纷效仿，消费券开始在我国出现，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开始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而这其中杭州市的消费券由于发行品种多、数量大、效果好，受到社会的关注。

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需求决定供给，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由

财经新思维



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投资下降、外贸出口受挫、国内需求萎缩的困境，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促消费、扩内需、重民生、保增长”的发展目标，杭州市在全国率先采取向居民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来启动消费、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2009年1月20日，杭州市宣布发放市民消费券。市民消费券的发放对象为杭州市区范围内的八类人群：已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城镇老年居民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享受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的家庭享受成员；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120%~140%的困难家庭享受成员；享受生活补贴的征地农转非劳动年龄段以上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市属、区属中小学在校学生。消费券的发放标准为：市属、区属中小學生每人100元；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每人200元。消费券的使用期限为2009年1月24日至2009年4月30日。使用的商家和直销点535家，几乎涵盖了杭州市各大超市、连锁便利店、商场、家电卖场、手机连锁店、书店、剧院、影院、演出场所、健身场所、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同时，在这段时间，消费者凭消费券到指定的商家买商品、办宽带、看演出、看电影、健身、旅游，可享受一定的优惠。用消费券在指定商家购买商品类产品，100元可以作105元使用；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产品，100元可作118元使用；消费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类产品和景点、旅游产品，100元可作120元使用。

2009年3月18日，杭州市宣布推出第二阶段消费券，它包括政府消费券、社会消费券、旅游消费券、转移性消费券和



教育培训消费券五大种类。一是政府消费券。发放对象增加优抚对象、持证失业人员、1958年城市外迁人员等三类人群。标准是每人200元。二是旅游消费券。发放对象为中外游客。三是社会消费券。杭州人、新杭州人、中外游客都可以自愿购买。使用范围扩大至饭店、美容美发店。凭社会消费券，可以享受政府消费券在购物、娱乐时享受的优惠。去购买商品可以获得5%的优惠，去服务场所消费可以获得20%的优惠。四是教育培训消费券。主要发放给开工不足的企业，组织职工进行技能培训；应届毕业生、未就业的杭州户籍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参加杭州市社会保险的外来务工人员；杭州户籍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失去工作的返乡农民工；常住人口中尚未取得初中和高中文凭者等人员。五是转移性消费券。从财政预算安排的各种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和企业扶持奖励中，划出一部分以消费券的形式拨付给企事业单位。让承诺不裁员、不减薪的企业，用这些钱给员工增加收入。政府消费券和社会消费券的面值为20元，转移性消费券的面值为100元，使用期限都是2009年3月20日至6月30日。教育培训券的面值为100元，使用期限从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定点商家的数量从第一阶段的535家扩大到了2227家。可使用的行业范围，除商贸、杭产家电、旅游、文化娱乐及体育健身外，增加了餐饮、通讯、医药等。教育培训机构373家。

从实际情况看，杭州市共发放各类消费券11亿元，其中第一阶段发放市民消费券2.1亿元，受益人群达132万余人。第二阶段发放各类消费券8.94亿元，惠及包括“新杭州人”在内的全体杭州市民和外来游客，其中政府消费券1400万元，转移性消费券4.8亿元，社会消费券8000万元，教育培训消



： 消费券 1.2 亿元，旅游消费券 2 亿元。

立竿见影出奇效

消费券作为启动消费的应急措施，在经济低迷、消费萎缩，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受到社会的欢迎，成为政府反经济危机的调控手段。

促进了消费。消费券的基本特点是限期消费和乘数效应。消费券带动了消费市场的繁荣，市民发到或买到消费券，有的用消费券购买年货；有的用消费券购买家电；有的用消费券参加培训、买书、看电影；有的用消费券开通数字电视；有的用消费券参观旅游景点。尤其是消费券定点使用的商场，销售旺盛，消费明显回升。从杭州市情况看，仅“五一”期间，杭州大厦、银泰、解百等 5 家商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12.13%，世纪联华、物美、华润、家乐福等 11 家超市销售额同比增长 6.54%。消费券的拉动效应为 1:1.3 ~ 1.5。

改善了民生。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困难家庭和弱势群体，他们抵御危机的能力是最弱的。发放一定消费券给有钱人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对于农民工、下岗职工以及低保对象，则起到改善生活的作用。通过使用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一些困难家庭购买了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也有些家庭购买了家电、手机等改善生活的用品，消费券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改善了民生，一些困难家庭和“新杭州人”的利益得到了尊重和保护。



拉动了经济。拉动经济发展的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由于外需不足、出口不畅，推动经济发展主要靠消费和投资。在“保增长、扩内需、促稳定”的政策指导下，按照“财政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的消费原则，消费券的作用得到了发挥，实现消费增加带动生产增加、生产增加带动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又带动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消费对生产的刺激明显。让利较多的杭州生产的家电数源、华日、金鱼等品牌产品正月里全线飘红，甚至出现卖断货现象。数源科技公司在春节期间增加了70名一线员工加班，管理、财务、配送、采购、售后等也提前开工。松下公司针对春节期间洗衣机滚筒系列断货的情况，及时安排下沙工厂提前上班，尽快生产出洗衣机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华日公司原本计划6月份才投入使用的生产线现在提前启用。杭产家电生产规模的扩大，有效促进了上下游产业链的需求，进一步放大了消费券的乘数效应。

提振了信心。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是信心，不少消费者对未来感到悲观，尽量“现金为王”和“持币观望”，不愿意投资和消费，这直接影响经济的回升和经济的发展。在“信心比黄金珍贵”的情况下，政府的消费券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消费券的发行和消费券的宣传，改变了人们的消费预期，给企业带来了信心，给消费者带来了信心。

质疑声不绝于耳

消费券不是杭州所特有的，在经济不景气、社会需求不旺的前提下，为了刺激经济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一些国家和



地区也发行过消费券。早在上世纪美国就开始向困难群体发放食品券形式的消费券；1999年日本曾向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弱势群体发放每人2万元的消费券；2009年1月28日，我国台湾地区向每位台湾居民发放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2008年12月27日成都市向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和城乡重点优抚对象37.91万人，按每人100元发放了3791万元消费券，等等。但是，消费券的出现，人们对消费券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质疑声不绝于耳，可谓是众说纷纭。

消费券产生苦乐不均。消费券的实践证明，消费券对启动消费的效果是好的，可以立竿见影。但是，消费券发放的基础是财力，如果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发放消费券，一些经济发达、财力雄厚的地区有能力发放，而经济欠发达、财力困难的地区就没有能力发放，这会进一步影响地区发展的平衡，导致苦乐不均。如果以国家为主体，由中央财政统一发放消费券，则受国家财力限制难以施行，且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效果可能会得不偿失。消费券的发放以政府财力为后盾，消费券的作用受到了限制，这决定了消费券不可能全面推开，也决定了消费券的不可持续性，只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不可能长期采用。

消费券导致分配不公。消费券是普发，还是限发，一直存有争议，普发体现了公平，但不利于效率；限发体现了效率，不利于公平。台湾地区的消费券是普发的，不限年龄、收入和身份，人人可获得面额总值为新台币3600元的消费券。成都市、杭州市的消费券是限发的，主要是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成都市是人均100元，杭州市政府消费券是人均200元。普发体现了公平，但实质是平均主义，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因为只



有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最高，消费券能在较短时间内增加消费，刺激需求，而高收入者拿到消费券，虽然能增加消费，但会相应减少现金支出。而消费券限定向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发放，看似不公平，实质是初次分配基础上的财政“二次分配”，体现了财政的政策性，体现了财政扶贫帮困的政策导向。

消费券助长了地方保护。由地方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只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有些地方还规定购买本地产品的政策优惠，这虽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地方保护，不利于公平竞争。

消费券带来了挤出效应。从消费券的使用情况看，大部分居民用消费券购买了大米、油、调料等生活必需品，而这些商品的消费弹性是最低，不管有没有消费券，居民都要消费的，而消费券替代了现金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消费券的作用受到影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券中，美国的食物券，即美国特色的消费券发行早、持续时间长，社会评价高，是一种成功的形式，对我国未来消费券的发放是有启发的。

美国农业发达，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低廉，美国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管制严格，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农产品供应和食品安全的重视。同时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居民的食品和营养问题，美国有专门的食物券，免费发放给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



美国的食品券开始于 1964 年的《食品券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开始推行食品券福利计划。美国的食品券主要发放于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食品券规定专门的用途，只能用于购买食品，不能用于购买烟、酒等奢侈品，更不能出售。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贫困人口大量增加，据英国《独立报》报道，2008 年美国有 2800 万民众使用政府的食品券来购买食品，而上年度为 2650 万人，是 20 世纪 60 年代实施该计划以来使用食品券人数最多的。

从美国的食品券的使用效果可以看出，食品券和现金相比，虽然使用不自由，但可以避免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突击花钱和无计划地乱花钱而导致政府花了钱又不能很好地解决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温饱和营养问题，引起社会的不稳，因为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来说，温饱问题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and 家庭的和谐。

未来消费券如何发放，从美国的食品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是发放的主体是政府。美国专门出台了《食品券法案》，明确食品券由政府发放，是政府推行的一项食品券福利计划，是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加强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发挥，体现了财政政策的公平性。

二是享有的对象是弱势群体。美国食品券的发放对象是低收入者，即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人们通常所说的弱势群体。国家每年公布贫困线标准，那些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家庭自然是食品券的救助对象，但食品券也不局限在贫苦线以下的人群，那些家庭收入略高于贫苦线的家庭也可以申请。这有利于



维护低收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的稳定。

三是指定明确的用途。美国政府明确食品券只能用于购买食品，不能用于购买烟、酒等奢侈品，更不能出售。这有利于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安全，减少贫苦人口免受饥饿和营养不良。同时，有利于减少政府多余的粮食库存，减少国家粮食库存的财政支出。

四是动态管理。美国的食品券由低收入家庭自行申请，经济发展好，申请的家庭就少；经济不景气，申请的人就多，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依赖食品券的人群大幅度增加。同时美国的食品券每月发放，相当于我国城乡低保对象的低保收入。可以说美国的食品券享受对象是有进有退、有多有少的，食品券受到低收入家庭的欢迎和社会的肯定。这有利于食品券计划的长期化和长期的推行。

关键要有一种长效机制

消费券作为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的政策举措，未来怎么办？是一时之需，还是长期之举？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有必要从财政的角度作些分析，以指导未来消费券的发放。

消费券要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从消费券的发放看，消费券的渊源可追溯到凯恩斯主义，是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是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结合的产物。消费券主要由政府发放，其后盾是政府财政，消费券的实质是政府支出方式的转变。既然是财政资金，就要体现财政资金的特



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资金不同于银行信贷资金，信贷资金最基本的特征是有偿使用，资金使用要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多体现在“锦上添花”；而财政资金最基本特征是无偿使用。资金使用要体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更多体现在“雪中送炭”。财政的性质决定消费券不能发，关键看财政的实力。财政的实力强，政府就有能力发放；财政实力弱，政府就没有能力发放，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消费券的不可持续性。同时，财政的性质决定消费券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消费券要不要发放，发放多少？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决定，以发挥消费券调节经济发展的功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券应该向低收入者发放。消费券的发放必须明确对象，是全民普发，还是向特定人群发放，无非是这两种选择。从世界各国和地区发行过的消费券分析，普发是不成功的，只有向特定人群发放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0年前日本发放的消费券就被认为是不成功的案例，1999年日本为刺激内需，向25岁以下65岁以上以及弱势群体发放每人2万日元消费券，总额6000多亿日元，效果不尽如人意，消费券仅有3成被用于消费，6成以上被转化成储蓄——日本民众用消费券购买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然后把省下的钱存入银行。同样我国部分城市发行的住房消费券，目的是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结果是低收入者将住房消费券低价转让变金，而高收入者大量低价收购住房消费券，用来购买大面积住房或别墅，住房消费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产生逆向调节，因为住房是大笔投资，低收入者是没有购房能力的。而我国成都市、杭州市发行的消费券就比较成功，起到短时间扩大消费的作用，因为这两

个城市的消费券发行对象主要是低收入者，规定的使用期限比较短。因此，消费券的发行应面向低收入者，只有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是最强烈的，而发给高收入者难以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相当部分消费券替代现金，转化为银行储蓄。当然，这里的低收入者范围应该是宽泛的，既包括城乡低保对象，也应包括城市里的退休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还应包括农民工、城市的外来新居民等。

对消费券的发放给予财政援助。消费券除了政府发放外，政府应鼓励商家发放。在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以后，我国和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过度消费，即超前消费；而我国的特点是谨慎消费，消费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将在我国长期存在，这和我扩大内需的政策是有矛盾的，和我我国制造业大国是不相符合的，刺激消费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任务。目前，我国各地的消费券主要由政府发行，成本由政府承担，资金来源于财政，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的税收，这就决定了消费券资金来源的有限性和不可持续性。从消费券的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可行性看，今后消费券的成本应由消费者、厂商和政府共同承担，政府财政主要发挥引导作用，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起到鼓励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如，消费者用100元可以从政府那里购买到120元的消费券，其中10元是厂商的让利，10元是政府财政的补贴，即通过财政补贴一部分，厂商让利一部分，消费者自负一部分，发挥消费券的“乘数效应”，达到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作用。当然，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灵活的，如对不同的对象可以采取不同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财政补贴的比例可以不同，等等，使消费券起到灵活调节的作用。



将向低保对象发放的现金改为消费券。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它们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生存权是人的基本人权，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扶持贫困，解决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温饱问题也是政府的职责。建立低保制度，给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每月发放困难补助，虽然是解决生存问题的有效手段，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参照美国食品券制度，借鉴今年金融危机期间为扩大内需在杭州、成都等城市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我国的低保制度可由货币形式改为货币和食物相结合，食物可采取发放专门购买食物的消费券，这种制度设计是可行的，也符合中国国情。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由于我国的低保制度由县级统筹，低保标准各地也不一样，消费券占低保标准的比例可以和当地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挂钩，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消费券的比例可以在高于恩格尔系数 50% ~ 100% 之间的比例掌握。这样，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既可以解决基本的生活需求，也可以避免一些低保对象突击花钱带来的弊端，同时又有一定的货币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





素质提升促转移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浙江省衢州市从2003年起开始了以“培训农民、提高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为主要内容的“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培养了一大批新农民，起到了开启民智、凝聚民心、发挥民力、推动民富的作用。衢州市在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新时期的“农民讲习所”，是富有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富民工程。



衢州市被国务院扶贫办授予全国首个“国务院扶贫办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中国东部案例考察团对衢州培训模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全球反贫困工作的一项创新。2008年衢州市的“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入选为浙江省改革开放30周年典型事例100例之一，衢州保姆在《2008年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中成功入选“全国十佳劳务品牌”。

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选择

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长期形成的，解决“三农”问题也是长期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开始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目标，提出了“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思路，让公共财政的阳光覆盖农村。这样，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自然成了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抓手，成了改变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的自然选择。

一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通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建立了农村集体所有制。并通过户籍制度人为将居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建立了城乡“二元”制度和“二元”经济。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体制下，农村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既显得不突出，又没有办法转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我国在农村推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需要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以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的充分就业。要转移农村劳动力，使农村劳动力能够适应二、三产业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使农村劳动力有能力转移。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为农民培训了劳动技能，适应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

二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需要。在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中，农业的技术含量低，存在天然的弱性，既要靠天吃饭，又有较长的生产周期。作为弱质产业，农业受政府保护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保护农业是农业发展的需要，是国家的战略选择，但不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农业要走出政府保护的“温室”，关键是要发展效益农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但要发展效益农业，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单一农业向多种农业发展，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和经济效益，这要求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使农民真正掌握现代农业技术，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帮助农民普及了农业科技知识，提高了农民的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为发展效益农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三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需要。城乡一体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在发达国家，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别和城乡制度障碍，城市化水平高。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城乡差距大，城市化水平低。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是要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

业”来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城市化水平。但城乡一体化要有一个过程，人为的城市化，城市又容纳不了，只能适得其反，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恶化等“城市病”，不少发展中国家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而通过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实施，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素质，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商业转移，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自然也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了城镇化进程，提高了城镇化水平，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

四是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发展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地区之所以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主要是由于历史、自然和资源禀赋等客观原因造成的，但欠发达地区也有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只要能够认清比较优势，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的作用，能够在较短时间赶上发达地区，实现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一般来说，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高，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这既是欠发达地区的优势，也是欠发达地区的劣势。利用好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变比较劣势为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就能实现。而通过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实施，可以将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劣势变为劳动力资源优势，又可以通过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欠发达地区经济，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和发达地区经济的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

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主要举措

衢州市从 2003 年开始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提出“从 2003 年开始，每年培训农民 5 万人，使全市大多数农户都



有一名主要劳动力通过教育培训，近 50% 的适龄农民受到知识技能培训，使他们成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一定专业技能的新型农民”的总体目标。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公共财政为后盾，把农民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受到农民的欢迎。

一是买单式培训。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首先涉及到经费问题，“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衢州市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把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纳入公共财政的范畴，建立起“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财政保障机制。衢州市委、市政府明确规定，凡是第一次参加培训的农民，以及低保对象、残疾人、欠发达乡镇农民、低收入农民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外出打工又被退回的农民，参加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和绿色证书培训的，一律由“政府买单”，免费培训。从 2003 年开始连续 5 年市县两级财政每年按照万名农民素质工程的培训任务数和人均不低于 150 元的标准，筹集培训经费。规定培训全部由政府买单，对一般性转移就业培训按照每人每期不低于 15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对职业技能等级培训按照每人每月 3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衢州市财政从 2003 年起连续 3 年每年安排 50 万元“以奖代补”，专项用于市级各部门开展农民素质培训。各县（市、区）在 2003 ~ 2005 年期间，按每人不低于 150 元标准，从土地出让金和农业发展基金等经费中筹集安排一定份额，用于农民专项技能培训。市政府还出台了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 5% 作为“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经费的政策。据统计，从 2003 ~ 2008 年，全



市累计投入培训经费 1.24 亿元，其中市、县、乡三级财政投入 9064 万元，占全部的 73.4%。

二是订单式培训。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目的是为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城市化，增加农民就业。衢州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采取的是订单培训，把满足市场需求、尊重农民意愿作为根本出发点，建立了订单培训、企业参与的培训机制。首先是坚持培训与扩大劳务输出相结合，开展订单培训。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积极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开展针对性的培训，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其次是坚持培训与提升主导产业相结合，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再其次是坚持培训与本地工业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相结合，开展定向培训专业技工。订单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获得：一是培训机构和中介组织。各级政府把培训机构的输出能力作为择优选择培训机构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进行培训采购时，将输出也列为采购内容，以推进经过培训的农民尽快向二、三产业转移。中介组织的职能也在向前衍生，从单一的介绍转向直接创业培训。二是劳务市场。市政府每年举办劳务输出供需见面会和本地用工招聘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劳务输出协会。通过这一窗口及时了解协会所在地用工信息，以掌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四是以与发达地区挂钩结对为载体，向结对地输送劳务。通过与沿海发达地区政府和企业的联系，建立了紧密的劳务输出协作关系，及时了解用工信息，争取用工订单。五是衢州就业网。这也是获取劳动力资源供求信息的重要渠道。此外，其他很多部门的积极参与，发挥各自的作用。

三是针对式培训。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必须和市场的需



要、农民的需求结合起来，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衢州市在实施“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初期，农民培训的重点是35岁以上的成年农民，经过15天左右时间的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最基本的职业操作技能，加快“洗脚上田”向“洗脑进城”转变。从2006年开始，衢州市抓好1个月或3个月以上的新型农民培训，主要对象是没有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没有参加过培训的青年农民。以新型农民技能等级培训为重点，突出抓好年轻农民和预备劳动力的技能等级培训，注重培训的获证率和转移率，进一步提升培训质量。通过培训力求让他们都拥有一项专业技能、一本技能证书、一份稳定工作，回农村是新型农民，到城市是能干市民，进企业是骨干职工。同时，在培训经费的使用上，尽量向低收入农民倾斜，把夫妻双方都在家务农的“纯农户”作为培训重点，力求至少有一人通过培训实现转移就业，使更多的低收入农民通过素质培训实现转产转业并脱贫致富。

四是品牌式培训。市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品牌的竞争，劳动力商品也要有好的品牌，才能实现转移就业。衢州市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起点高，按品牌式要求对农民进行培训。把市场容量大、发展前景好、农民愿意从事的工作作为重点行业来培育。全市统一打“衢州”牌，重点是培育“三保一技”，即衢州保姆、衢州保安、衢州保绿、衢州技工。全市各地还从实际出发，以家政服务、缝纫、纺织、打井、装潢、厨师、建筑、机电等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培育了具有品牌效应的保姆乡、厨师村、缝纫村、打井村等特色乡镇、特色村。衢州保姆已被市场认可，树立了“放心、称心、安心”的品牌。而劳动力品牌的培养和基地的建设分不开。市、县（市、区）按



照“五个一”，即“有一个劳务输出介绍所、一个健全的劳务服务站、一个培训阵地和相应的培训设备、一支师资队伍、一笔培训经费”的标准，对农民素质培训基地进行了资格认定。基地制订了“学校申报，部门审核，鉴定发证”的管理流程，凭职业资格证书对培训机构进行资金补助。把培训后农民获证率、转移率作为衡量农民素质培训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对没有达到培训标准的，按资格证书获证率和转移就业率下降比率同等降低补助标准。目前基本实现新型农民技能等级培训100%基地化培训的目标。

五是服务式培训。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政府要转变职能，从管理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是重点，也是希望。按照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思路，衢州市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对农民的培训自始至终采取的是服务式培训。衢州市委、市政府把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门合力抓的工作机制。市、县（市、区）建立了由农办负责的综合办，由人事局负责的劳务输出培训办，由经委负责的本地用工培训办，由农业局负责的农业技术培训办，由教育局负责的劳动预备培训办，各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对参加培训经考试合格的人员发给职业资格证书和绿色证书，对外出务工人员发给“创业绿卡”，提供服务联系电话，规范劳务输出管理工作，依法维护外出农民的土地、山林承包权和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等合法权益，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从2003年开始，经过6年的实践，衢州市农村劳动力素



质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实践证明，农民素质培训是一项民心工程、利民工程。2003～2008年，衢州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工资性收入占比提高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843元，比上年增长12.7%，其中工资性收入达到3618元，占全年收入的52.8%，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62.4%。二是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据统计，6年多来已累计培训农民69.9万人次，农村劳动力结构不断优化，农村劳动力以年均3%以上速度向二、三产业转移，2007年全市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1.24%，比2002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有调查显示衢州市97万农村劳动力中，绝大多数中青年农民已经进入城市，有文化的年轻人也基本上脱离了农业。三是提高了农民综合素质。通过素质培训，既提高了农民的就业技能水平，也提高了农民在科技、文化、卫生、文明礼仪等方面的素质，新的择业观念、家庭观念、生活观念、卫生观念逐渐被农民群众接受。

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有益启示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把农村劳动力优势转为人力资本优势，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衢州市以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为抓手，通过对农民的素质培训，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增收的“双赢”。目前，我国有几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金融危机又使上千万的“农民工”要重新就业，衢州市的农村



劳动力素质工程对全国各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有启示和借鉴的。

一是政府要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认识。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是城乡“二元”经济模式造成的，要突破城乡“二元”经济模式，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但要突破城乡“二元”经济模式，就必须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目前在农村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面临信息不畅和农民缺乏劳动技能的“双重”障碍，面临就业无门的窘境。如果放任自由、任其发展，也许农村劳动力也会有一定的转移，可这种自发的转移是非常有限的和非常缓慢的。衢州市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表明，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是有作为的。政府必须转变观念，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认识，利用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培训，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自发的过程转为自觉的行动，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

二是政府财政要承担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以市场机制为主体的资源配置也存在盲目性、滞后性的问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以矫正市场无政府性，而财政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模式的根本问题是城乡差距问题，是“三农”问题。在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是人多地少，大量的农村人口束缚在土地上。而农业和工业相比，资本的有机构成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低，要解决“三农”问题，仅仅在农业上做文章，仅依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必须另辟蹊径。而

要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商业，必须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这就涉及到培训的渠道和培训的经费问题，完全靠农民自发来推进，不少农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衢州市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培训的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培训的渠道由政府指定，甚至政府送培训到农民家门口，这就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其实，“三农”问题是公共财政的作用范畴，而我国以前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缺乏是公共财政的严重缺位。随着我国财政实力的增强，公共财政向农村的覆盖，各地公共财政应承担起对农民素质工程投入的责任，这是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是公共财政发展的本质要求。

三是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要和农民的文化素质结合。我国13亿人口，8亿多在农村，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特点是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甚至还有不少文盲、半文盲。这种文化素质使他们对知识，尤其是现代知识的接受能力比较弱。衢州市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把培训重点和农民的素质结合起来，培训的重点是“三保一技”，即“保姆、保安、保绿和技工”。新农村建设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全国不少地方都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使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的效果更好，各地开展对农民的培训必须和农民的素质结合起来，使农民能够接受并尽快学以致用，不要为培训而培训，为完成任务而培训。重点培训一些对文化素质要求不高，农民容易学，容易上岗的行业和职业。当然，培训也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对一些年纪轻、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农民，也要开展一些相对要求更高的行业和职业培训。

四是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要和市场的需要结合。推广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对农民全面进行培训，目的是为了



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使农民能够从农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达到农民的充分就业，以推进城市化并实现农民增收。为了达到农民充分就业和转移的目的，培训必须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衢州市一开始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就 and 市场需求相结合，重点培训城市化需求大和当地企业用工需求大的行业和职业，打响衢州劳动力品牌，每年能够实现大量的农民转移。目前，我国城市存在大量的“农民工”。“农民工”的流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不少城市要么遇到企业招工难，要么遇到“农民工”就业难，关键是信息不对称，对“农民工”培训和转移没有和市场需求很好地结合。为了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各地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必须和市场需求结合。一是和城市化结合，重点培训一些城市化需求大，又适合农民就业的保姆、保安、保绿等行业和职业。二是和当地企业的用工结合，缓解当地企业的用工难、招工难的困境，实现农民就地转移。三是大企业联合，开展“定单”培训，培训大企业需要的用工。这既可以实现培训后的充分就业，又可以引进大企业的培训资金和培训师资，实现互惠互利和资源的共享。

五是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要和经济转型升级结合。当前，由于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外需急剧下降，许多企业的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沿海不少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一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又返乡了。金融危机实质是产能过剩的危机，这迫切需要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从以外需为主转向扩大内需，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这要求提高我国的产业层次，从以“低小散”为主的经济转向“高精尖”的经济，产业链从中间向产品研发和产品销售的两端

延伸，提高产品的品质和市场影响力。国家也提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这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为下一步的产业复苏提供人才支撑，金融危机往往是职业培训大发展的时期。衢州市的劳动力素质工程表明，对农村劳动力培训要因地制宜，从简单的培训转向复杂的培训，从临时培训转向更长时间的培训，从而使农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各地要树立信心，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把培训和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使劳动力素质工程立足长远，取得更好的实效。





推陈出新话扶贫

贫困是人类的不幸，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追求效率，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问题，需要政府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发展的相对公平。贫困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也存在贫困问题，存在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问题，但是，浙江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视农村贫困问题，把扶贫问题作为政府的职责，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贫困县，农村实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



坚持不懈为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按照市场趋向改革的要求，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不少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推动了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增长迅速，不少农民摆脱了贫困，尤其“八七扶贫攻坚”以来，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扶贫坚持不懈，不断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投入，创造了许多有浙江特色的扶贫之路。

1. “八七扶贫攻坚”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农村的贫困问题普遍存在。1978年，浙江人均农业总产值仅25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65元。按当时国家制定的贫困标准（年人均收入200元），浙江省农村贫困人口有1200万人，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36.1%，农村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浙江省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鼓励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发展农业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业，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拓宽了农民发展和增收的领域，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一大批农村贫困人口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子，农村普遍贫困的问题大大缓解。到1993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增加到1745元，农民人均收入低于500元（当时中国政府把贫困标准调整到年人均收入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下降到280多万，占全省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7.8%，且相当一部分贫苦人口集中在浙西南山区县，贫困的



区域性突出问题，扶贫的任务艰巨。1994 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就是用 7 年时间，到 2000 年基本解决全国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浙江的实际，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比全国提前 3 年、到 1997 年基本解决全省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重要决策，并进一步明确分级负责的责任制，省里重点扶持文成、泰顺、永嘉、云和、景宁、青田、磐安、武义 8 个贫困县脱贫，其他地区的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由所在市、县负责扶持。为了确保扶贫攻坚的顺利实施，除了原有的各项扶贫优惠政策保持不变外，进一步加大和出台了新的扶贫政策，通过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和部门结对帮扶、推进异地开发和下山移民、发展开发性农业等，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如从 1996 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安排 3000 万元的开发农业扶持资金，用于山区县的农业开发，其中安排给 8 个贫困县 1500 万元，占 50%。又如，从 1996 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安排 8 个贫困县 1200 万元下山脱贫扶持资金，鼓励和扶持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贫困山区农户到临近集镇或沿江、沿路和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落户，下山脱贫，异地致富。1995 年永嘉县率先脱贫，1996 年磐安、武义、云和 3 县光荣脱贫，到 1997 年，浙江省的 8 个贫困县以乡镇为单位，人均收入都超过了 500 元，基本实现了脱贫目标，提前三年完成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区。

2. 百乡扶贫攻坚

贫困县脱贫摘帽后，浙江省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块缩小到了一些生产生活条件特别差的贫困乡镇和贫困村、贫困户。1999 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在 1500 元以下的乡镇还有 101 个，涉



及人口 105 万人，解决贫困乡镇脱贫问题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为了巩固扶贫成功，在扶持政策不变、工作力度不减的前提下，2000 年，浙江省政府开始实施了为期三年的“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即：到 2000 年底，使这 100 个贫困乡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150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消灭人均纯收入 1000 元以下的贫困户；村级集体收入人均达到 20 元以上。在百乡扶贫攻坚期间，省、市、县、乡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都非常重视，2000～2002 年，省里每年筹集财政扶贫开发农业扶持资金 2000 万元，下山脱贫扶持资金 2000 万元，工商业贷款贴息资金 800 万元，科技培训和示范推广经费 400 万元，扶持欠发达地区的简易公路建设资金 3000 万元，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200 万元等，用于对贫困乡镇长期发展有促进的项目上。到 2002 年，列入扶贫攻坚的贫困乡镇平均人均收入达到 1922 元，比 1999 年增长 32.6%，年均增长 9.9%，增幅高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1000 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下降到 3.7 万人，比 1999 年减少了 14.4 万人，贫困乡镇如期实现了脱贫目标，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区。

3. 欠发达乡镇奔小康

在全面完成“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的基础上，2003 年，浙江省政府把扶贫工作的重点从解决绝对问题转到相对贫困问题，把加快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步伐作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作出了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的战略决策，把 2001 年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66 元）的 361 个欠发达乡镇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其中 215 个欠发达乡镇纳入省扶持范围，



其他欠发达乡镇区别情况，实行分级负责，原则上由当地市、县扶持。“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的中心任务是加快欠发展乡镇奔小康、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力争到2005年，省重点扶持的欠发达乡镇一半以上达到国家小康标准；到2007年，全省欠发达乡镇全面达到国家小康标准。

在深入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的具体过程中，浙江省以推进产业化扶贫、培训就业、下山移民为重点，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民自愿、梯度推进”原则，加快下山移民、海岛移民进程，优先安排移民点土地指标和道路建设等资金。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农民异地转移，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互惠互利的区域协作、山海协作和结对帮扶。有效创新帮扶方式，通过建立扶贫开发小区等形式实施异地开发。积极发挥欠发达乡镇的生态资源、旅游资源、水力资源等比较优势，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和工商企业到欠发达乡镇建立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旅游休闲基地，因地制宜地开发绿色产业和特色产业，带动欠发达乡镇农民脱贫致富。与此同时，浙江省积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财政支出向统筹区域发展倾斜。据统计，2001~2005年，省财政共安排欠发达地区及海岛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农业龙头企业专项资金、先进制造业发展资金、建立生态保护机制、发展教科文卫事业发展等资金共计277.8亿元。各级财政共投入扶贫资金15.8亿，共实施扶贫项目8500多个，扶贫项目直接覆盖的农村住户数达到120万户，400多万人。

4. 低收入农户奔小康

百乡扶贫攻坚经过5年的实施，到2007年全省361个欠发达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超过了4000元，80%欠



发达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百乡扶贫攻坚的目标。农村扶贫的形势和任务又发生了变化，浙江省及时将扶贫的重点从欠发达乡镇转向低收入农户，从2008年开始全面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将收入水平定为2007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户作为帮扶对象，全省符合这个要求的农户有111万户，共271万人。从2008年起至2012年的5年间，使70%以上低收入农户（“低保”农户除外）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等目标。同时还明确，让有劳动力的低收入农户至少有1人实现非农就业或从事产业化经营的特色农业；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全面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所有县（市、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2500元以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低收入农户奔小康以人均收入25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为帮扶对象，以“低收入农户集中村”为基础平台，以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按照“扶贫重心下移到村、扶贫对象明确到户”的要求，全面建立“一户一策”的帮扶机制、“互助合作”的开发机制和“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加大财政扶持、小额信贷、社会帮扶和外部带动力度，因村因户推进产业开发、培训就业、下山搬迁、社会救助，促进低收入农户提高收入水平和发展能力。

扶贫经验有启示

政府扶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解决贫困问题是个长期的过程。浙江省扶贫取得的成绩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浙江扶贫的



许多思维方式和制度创新，对全国各地的扶贫是可借鉴的，浙江省的许多做法值得学习、值得推广，各地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1. 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

贫苦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世界银行以 1985 年的美元为基准，提出了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人均每天 1 美元。考虑到近年来的物价水平和各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世界银行 2008 年 8 月 26 日宣布，将全球贫困线标准从每日收入 1 美元调整到 1.25 美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农村普遍贫困，我国的贫困标准是比较低的，1985 年，我国确定人均年纯收入 200 元作为贫困线，低收入贫困线标准是 201 ~ 399 元之间，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微调。2008 年，中国绝对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 785 元以下，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 786 ~ 1067 元。我国从 2009 年起上调扶贫标准，即贫困线由 2008 年人均年收入 786 元提高至 1067 元。扶贫标准上调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人口线”这两条线合二为一。无论是按我国的贫困标准，还是按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贫困的标准是比较低的。对照贫困的标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浙江经济发展比较快，浙江省的贫困问题早已解决。但是，贫困是相对的，由于各地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的不同，我国不仅存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即使在广大农村，也存在山区和平原、沿海和内地的差距，且这种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浙江也不例外。可见，解决绝对贫困是暂时的，解决相对贫困是长期的。解决绝对贫困后，浙江省对扶贫问题不仅没有放松，而且进一步加大扶贫的力度，扶贫的政策保持不变，而且还根据财力的可能，不断加大扶贫的资金投入，扶贫的立足点从绝对贫



困转向相对贫困。

各地在扶贫取得成效后，一方面要巩固扶贫成果，防止脱贫后又返贫；另一方面，要及时转变扶贫思路，将扶贫重点转向相对贫困。

2. 从全面扶贫转向重点扶贫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普遍贫困，扶贫应该是全方位的、全面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改革，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也及时调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农村的普遍贫困问题较快得到改变。1986年，我国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到1992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从1994年起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按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浙江省从1994年开始，政府扶贫的思路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全面扶贫转向重点扶贫，重点扶持位于浙西南山区的3个国家级贫困县、5个省级贫困县的发展，从1995年开始，省级财政对8个贫困县在内的17个贫困和次贫困县（市）实行“两保两挂”的激励政策，即这些县（市）在确定完成中央“两税”任务（1997年起改为完成逐步消化历年累计赤字任务）和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前提下，省财政的困难补助和奖励与地方财政收入较上年增长的部分相挂钩。这是政府财政扶贫的制度创新，改变以往“贫困县财政收入增长，上级财政减少补助”政府财政扶贫方式为“贫困县财政收入增加，上级财政补助增加”的政府财政扶贫方式，变“逆向思维”

为“同向思维”，共同做大经济“蛋糕”和财政“蛋糕”。到1997年，浙江省的8个贫困县脱贫，提前三年完成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区。此后，又先后推行了百乡扶贫攻坚、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等，扶贫对象从县市到乡镇、从乡镇到村、从村到户。通过这种有组织、有目标、有重点的扶贫，实行了政府扶贫的目标，巩固了扶贫成果。

目前，我国还存在不少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主要在中西部地区，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的“老、少、边”地区，这些贫困地方的共同特点是交通落后、信息闭塞、观念陈旧，需要下更大的力气，才能较快地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各地在扶贫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抓住重点，从政策上、资金上、项目上向这些地区倾斜，实施重点扶贫，只有这样，扶贫才能出成效、扶贫才能出成果。

3. 从“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

扶贫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输血式”扶贫，一种是“造血式”扶贫。“输血式”扶贫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问题，反而会使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形成依赖思想，结果只会是养懒汉，使扶贫陷入“越扶越贫，越贫越扶”的困境。只有“造血式”扶贫才是长久之计、根本之计，是扶贫的终结。从“八七扶贫攻坚”以来，浙江省一直倡导“造血式”扶贫，给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手段，主要是增强他们的“造血功能”，使他们有能力、有机会“找米下锅”、“自谋职业”、“自寻出路”。一是下山脱贫。对一些在山区的农民，浙江省一直鼓励下山脱



贫，仅武义县，从1994年开始用“搬迁下山、异地脱贫”的扶贫新思路转移农民、培训农民和富裕农民，在过去15年里，把深山区353个自然村整体搬到山下，使占全县总人口七分之一的4.7万名生活在穷山窝的农民与贫困告别。2007年，武义县下山脱贫农民的人均收入达6000多元，是他们下山前人均年收入的10余倍。二是实施山区综合开发。山区有山区的优胜，山区的扶贫还要做好“山”字文章。“八七扶贫攻坚”取得成效后，199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及时颁发了《关于加快山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经济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扶持政策、扶持力度、挂钩扶持关系等“三不变”的要求，省里专项安排和筹集资金的开发农业、下山脱贫、交通扶贫、科技扶贫等扶持山区的政策，在2000年之前继续执行。从1999年开始，省财政专项安排一笔贴息资金，扶持山区、脱贫地区和老区农业综合开发。三是农民素质培训。农村贫困的根本问题是“人多地少”，而农民又普遍缺少劳动技能，解决农村贫困的关键是要对农民进行培训，把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浙江省最早对农民进行有组织的系统培训是从衢州开始的，2003年衢州市实施“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实行由“政府埋单”，开展“订单培训”。仅2003年全市共组织培训农民11.7万人，其中劳务技能培训4.77万人，新增有组织劳务输出5.54万人，累计劳务输出37.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1.6%。衢州的做法得到省里的肯定，省财政专项安排资金，推广衢州的做法。

要想使扶贫取得实效，各地在扶贫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那种“输血式”的扶贫方式，推广“造血式”的扶贫方式。对那些生活在高寒地区、气候恶劣地区、地质灾害多发地区的



贫困人口，政府应更多考虑用移民的方式，使不适合人居住地区的农民脱贫。否则，再多的“输血”也是徒劳。当然，对那些有资源优势，有适合居住的贫困山区的人口，政府则应创造条件，给予政策上、资金上的支持，帮助他们脱贫。目前，扶贫最有效、最直接的还是智力扶贫。因为我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有限的土地容纳不下过多的农业人口，而贫困农民又缺少劳动技能，难以进入城市谋生。政府应通过培训的方式，按照市场的需要，对农民进行实用劳动技能的培训，把过多的劳动力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转移，把劳动力优势变成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人口的城市化。

4. 从解决温饱转向全面建设小康

脱贫和返贫是扶贫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因为我们的脱贫是低水平的脱贫，是以解决温饱为标准的脱贫，按照当前的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扶贫的成果很不牢固，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返贫。同时，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没有中西部的小康也没有全国的小康，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浙江省全面脱贫后，没有停止扶贫的步伐，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遵照沿海发达地区提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加快公共财政向农村覆盖，以不断巩固扶贫成果。一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从1997年就开始着手建立低保制度，将农民纳入低保的范围，对那些脱贫无望的农村困难户，给予低保待遇。二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不断提高标准，从2003年人均30元提高到2008年的人均100元，对农村困难家庭还给予医疗救助。三是加大教育支持，对困难



家庭子女，尤其是低保家庭子女的教育给予免学费和免住宿费，还在农村中小学推广营养午餐，免费提供给低保家庭子女，使困难家庭子女也能吃上肉。

解决温饱是扶贫的基本要求，但不是扶贫的结束。各地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认识扶贫，提高扶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一方面要帮助农村贫苦农民树立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提高贫困农民劳动技能，使他们外出打工有一技之长，在家务农能够增产增收。另一方面，要加大贫困农村的公共投入，给贫困地区的农民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贫困地区的农民能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





从扩大内需的角度 看待中等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浙江职业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发展的跨越，连续 7 年高中段普职招生比例达 1:1，这在全国是唯一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多年来保持在 95% 以上，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在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等职业教育在浙江省迅速发展，走



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职业教育之路。当前，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及时总结浙江中等职业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对如何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进产业升级转型，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发展职业教育系经济发展所需

职业教育在浙江的发展，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浙江经济快速崛起的必然选择。

浙江位于我国的东南沿海，省情的基本特征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0.5亩，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长期以来国家对浙江投资少，浙江经济发展滞后。“穷则思变”。人多地少使得浙江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温州人的“补鞋”、“弹棉花”、义乌人的“鸡毛换糖”、永康人的“打铁补锅”等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浙江人充分发挥体制和机制的优势，发扬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和“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创业精神，浙江的经济开始起步，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等各种经济成分在浙江各地发展起来了，“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块状经济在浙江大量出现，以“轻、小、集、加”为特色的经济在浙江形成，浙江经济迅速崛起。浙江省经济起步在农村，基础在县域，主体是民营经济。在前几年每年的全国百强县经济评选中，浙江的百强县数量基本上是名列前茅，浙江省的这种经济特点，被经济学界称为“小狗经济”。

浙江经济的发展，使得浙江对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且对



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为了保持浙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浙江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档次，增强浙江经济的竞争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不仅需要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出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而且更有赖于职业教育培养成千上万的适用型人才。

浙江省委、省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在全国比较早地把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工作来抓。2000年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求在高中段教育中普职比保持1:1。2001年，省政府又专门召开了全省职教工作会议，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必须“做大做强”，并确定了“十五”期间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要求各级政府增加投入、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促进中等职业学校上规模、上水平。在2004年9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强调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加快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要求各级政府“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职业教育”，发挥职业教育在推进城镇化进程、转移农村劳动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06年6月，省政府召开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下发《浙江省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实施“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为抓手，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指导思想，紧紧围绕“进口畅，出口旺，技能强，用得上”的各个关键环节，加大政策扶持和经费投入，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基础



础能力和竞争力，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浙江省的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2006～2007年省级财政两年投入4.2亿元，拉动地方配套投入的资金将达到14亿元，学校基本建设资金30亿元，省市县三级投入资金48.2亿元。至2007年底，全省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544所，在校生76.4万人，专业覆盖了数控机床、精密仪表、模具设计、电子电工、交通运输、医药化工、信息技术、旅游餐饮、市场营销、金融财会等近100多个领域，职业教育发展成效显著。

从浙江省职业教育的发展可看到，浙江省职业教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选择，是实现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转变、产业工人向技术工人转变的需要。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公共财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职业教育功不可没

职业教育是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就要有相应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现代社会里职业教育的作为无可替代，对推进现代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

第一，有利于社会观念的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由于受长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封建科举制度的影响。我国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培养人才，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思想教育学生，总想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为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想培养成为伟人、名人，学校、家庭总希望学生能考上有名的大学，每年的高考就成为“千军过独木桥”，结果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教育的不幸，因为社会组织结构是“金字塔形”的，基础还是由普通人组成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毕竟是少数的。“条条大道通罗马”。成功的道路千万条，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是要转变观念，改变人才培养方式，要遵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因材施教，从一种培养方式转为多种培养方式。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学生增加了选择的渠道，使一些有专长的学生、一些适合从事技术专业工作的学生有了选择的余地、有了用武的地方。这既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减少了教育资源浪费，又有利于社会观念的转变，实现“人尽其才”。

第二，有利于教育的国际接轨。职业教育是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是和经济发展相一致的。在西方国家，职业教育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的人才不少是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是很自然的事，像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制造业先进，精密仪器在世界处于垄断地位，跟职业教育发达是分不开的，因为发展制造业除了需要高科技的人才外，大量需要的是掌握先进技能的专门技术人才。随着世界产业的转移，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要成为制造业中心，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才。而职业教育的发展，既可为我国经济发展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才基础，也可以改变我国教育“一头重一头轻”、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实现教育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

第三，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船小好掉头”，根据社会的需要设置专业、培养人才。由于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具有“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的特点，



社会需要大，就业率高。而我国高等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教育和社会脱节，培养的专业和社会需要不对口，就业比较困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规律，和经济学的“需求决定供给”的规律是一致的。社会需要什么生产什么，这是企业的生存法则；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培养什么人才，这也应是教育发展的要求。中等职业教育是和就业相适应的，就业又是和收入相适应的，收入又是和消费需求、经济繁荣相适应的。“职业教育——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扩大内需——繁荣经济”是互相联系、环环相扣的经济链。应该说，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繁荣是相一致的。当前，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这恰是职业教育大发展的好时机，可为未来的经济繁荣提供人才保障，职业教育能做到这一点，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财政义不容辞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浙江省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成效显著，为浙江经济的崛起发挥了有力的保障作用，实现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目标。但是，由于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家长不愿孩子读职业学校。同时，由于受地方财力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不足，职业教育也面临场地狭小、设备老化等问题，影响了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说，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财政部门责无旁贷、义不容



辞。尤其是当前，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保增长、扩内需”已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各级财政部门要转变观念，要像重视普通高中一样重视职业教育，财力向中等职业教育倾斜，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加快推进新一轮“浙江省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2008～2010）”的实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工作来抓，实现职业教育的大发展。

第一，要把发展职业教育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增长这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而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村。我国“十三亿人口，八亿在农村”，农村消费扩大了，扩大内需的目标就能实现。虽然我国近年推行了“家电下乡”、“超市下乡”等不少扩大农村内需的举措，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核心是什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的需求难以实现。要解决农村的内需，还是要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而农民收入不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缺少劳动技能，因为我国目前农民收入的主体是“打工收入”，不少农民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不能适应工业化生产。浙江省在全省推行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致富奔小康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类职业学校要积极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培训的重点放在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劳动技术，把增加农民的劳动技能，作为职业学校发展的新增长点、新领域，实现农民增收和职业学校发展的“双赢”。

第二，要把发展职业教育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靠的是大量的要素投入，发展



的是粗放型加工工业，走出了一条“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之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一无市场优势，二无资源优势”的浙江，发展受到严重的要素制约，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在浙江已走入“死胡同”，浙江的发展必须转变方式。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发展道路，要加快推进浙江省的产业升级转型，建立现代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产业升级转型相适应，就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宜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技术工人。各职业学校要抓住机遇，及时调整好专业，培养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新发展。

第三，要把发展职业教育和城市化结合起来。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这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城市化的进程必将加快。根据《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目标，“十一五”期间浙江省要新增城镇就业 300 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200 万人，非农从业人员比重达到 80% 左右，城市化水平达到 60% 左右。城市化意味着大量的农民要转为市民，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农民和市民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身份的内涵有截然不同的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有明显的差别，这也要求对农民，即未来城市的新居民加强培训，使之更快融入城市。发展职业教育，不断吸收农村居民的子女就读职业学校，可以加快培养更多的城市居民，推进城市化进程。

第四，要把发展职业教育和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公共财政就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居民对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需要，公共财政的本质就是民生财政。当前，由于经济



闻：
财经
创新
新理
思路

不景气，不少中小企业陷入困境，企业裁员、农民工返乡，社会失业人员增加。扩大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成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是政府和财政部门需要重点考虑的。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把职业教育和扩大就业结合起来，通过职业教育的形式，扩大对失业人员和返乡民工的培训，为未来产业复苏和经济的转型提供人才保障。



财经评论献良言

问





应对金融危机财政先行

企业裁员，股票下跌，房子降价，财富缩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影响之广、影响之深，危害之大、危害之重，出乎意料、出乎想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面对危机，我们不是束手无策、手无方寸。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及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抓手。按照国家出台



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国家制定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造船、轻工、纺织、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现代物流等10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要求，财政一方面启动了结构性减税政策，全面实行了增值税转型，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对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减按5%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等。另一方面，继续加大政府公共投资，对保障性住房、“三农”、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等重点支出的支持丝毫不放松。在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4%的情况下，而用于民生、科技、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增幅均超过20%。

危机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抓住了，危机可以成为机遇；错过了，危机就是危害。但是“机遇只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如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开始有所好转，财政运行出现好转。一是生产增速稳步回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其中第一季度增长6.1%，第二季度增长7.9%，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幅大1.8个百分点。二是国内需求增长加快，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比第一季度增幅大4.7个百分点，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5%。三是财政收入出现了回升，1~4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5月份增长4.8%，6月份增长19.6%。更为可喜的是，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开始回升，第二季度，我国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双双出现大幅度反弹，其中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为115.9，比第一季度回升高10.3；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回升至110.2，比第一季度提高9.1。

经济的好转并不意味着应对金融危机任务的完成。金融危



机的影响和危害不是暂时的，期间还会反复。表现在，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效益下降的趋势还没有扭转，民间投资还没有完全恢复，就业的压力还比较大。应对金融危机需要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痛苦和漫长的，财政要有清醒的认识，义无反顾，积极应对。

一是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产能过剩的危机，是供需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经济的全球化，又加速了危机的蔓延。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长期积累的素质性、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来支撑；产业层次低、布局散、竞争力弱；企业主要依靠低成本、低价格来竞争。财政要积极筹措资金，集中用于企业技术改造贴息，推动企业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节能减排，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二是加快科技进步。任何一次大的金融危机，必然导致科技进步。哪个国家率先实现科技进步，哪个国家也必将率先从危机中走出，实现经济社会新的发展和腾飞。应对危机的过程实质也是科技进步的竞争。对一些重大科技项目和创新平台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及研发中心建设等，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对中小企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财政要给予引导，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积极扩大内需。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困难，外需急剧下降，一些外向型企业和外向型经济空前困难，这要求企业转变观念、转变生产方式，从外需转为内需。而我国 13 亿人口，



正处于城市化加快时期，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财政要积极配合国家出台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手机下乡”等国家扩大内需的举措，帮助企业调整生产结构，积极打开国内市场，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

四是更加关注民生。金融危机加剧了城乡居民生活的困难及社会就业的压力。财政要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对一些行政性支出要严格控制，对一些不必要的竞争性支出要逐步退出，重点支持城乡居民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关系居民生活的民生支出，对一些涉及民生的制度没有出台的要及时出台，制度不统一、有碍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要及时统一，以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应对金融危机是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而且必须要付出代价。但一旦闯关成功，前面的道路是海阔天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财政没有选择，财政必须满怀信心、义无反顾、迎难而上。





宏观调控的重大举措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由中央财政代理地方财政发行 2000 亿元的地方国债，用于地方经济建设。这对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也表明在国家宏观调控中财政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财政政策更加灵活运用。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要素。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形势严峻，外贸出口回落，



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而国内经济又面临着消费需求不旺，物价持续下降，城镇居民即期消费能力减弱，工业生产供过于求，产品库存积压严重的困难。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投资，2008年以来，我国先后多次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加大商业银行贷款力度等货币政策。同时，我国政府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这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在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甚至经济萎缩时的通常做法。

启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主要通过举债扩大政府开支和减税来实现的。一是减税。在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的前提下，我国推行了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1.6升以下的汽车减征车辆购置税等结构性减税措施，减轻了企业负担。同时，还把减轻企业税负的重点放在清理非税负担上，实现了清费改税。二是举债扩大政府开支。在我国银行储蓄存款不断增加，社会游资庞大的前提下是可行的。加上我国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增发国债仍有较大空间。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家增发2000亿元的地方国债，相应增加银行2000亿元配套资金贷款。这样，启动财政政策增加2000亿元的资金投入，对促进经济增长能起明显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地方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用好地方国债资金。

一是财政投资必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目前一般商品过剩，基础设施相对短缺的市场环境下，财政资金的投资只能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新增的地方财政债



券资金只能用于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用于加快铁路、公路、机杨建设和通信事业发展，用于扩大城市道路和供水、供暖、供气等项目建设，用于城乡电网改造建设，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不能搞一般性加工工业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瓶颈的制约作用，拉动经济增长。

二是新增的投资必须讲究经济效益，避免浪费。基础设施建设要尽快落实项目，落实资金，做到早开工，早见效。同时，建设项目要合理规划，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三是要错开还债高峰。国债筹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需要偿还的。因此，应充分利用银行利率下调，筹资成本较低的机遇，发行中长期国债，缓解还债压力。

四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依赖于财政政策的配合；同样，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有赖于货币政策的配合，特别是当前我国国债的发行还受到财力规模、赤字规模、债务规模的限制。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防范财政风险不放松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我国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来刺激需求，确保经济稳定增长。这4万亿元的投资，除了中央财政通过发行国债投入外，相当一部分要求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投入。而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逐月下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不同程度遇到困难。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9500亿元，而上年的财政赤字仅1800亿元，虽然中央财政赤字和我国的



GDP 相比在 3% 以内（赤字不超过年度 GDP 的 3%，是欧盟签订“马约”时为协调成员国间的利益而设定的，被称为“国际公认的财政赤字警戒线”），是安全的，但这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隐性赤字，即地方政府债务。一些地方政府不断扩大投资规模，通过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以财政作担保对外借款，地方政府的负债严重，债务率高，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财政风险的担忧，防范财政风险丝毫不能放松。

财政是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反映，是政权稳定的物质保障，财政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所谓财政风险是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一个社会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多种，但这些风险最终会综合成为财政风险。最明显的是经济风险。一是国有企业效益不高，活力不足，陷入困境，出现大面积的亏损。国有企业的困难，不仅影响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加大了财政风险，而且影响了国有银行的发展，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挂账、欠账、呆账、死账等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剧了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加剧了财政风险。二是财力分散。财力分散，影响了财政职能的发挥，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造成分配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使财政风险大大增加。三是债务膨胀。为了弥补赤字，国家只好发行债务，债务越滚越大，债务依存度不断提高。债务依存度越高，财政风险就越大。

要提高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防范财政风险，必须提高风险意识，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广开财源，集中财力，增强财政抵御风险能力。一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抓好财源的培养，把财政“蛋糕”做



大。二是加强税收征管，重点是要抓好非公有经济的税收征管，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三是要加强非税收收入的控管，重点要加强对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源转让收入的管理，该纳入预算管理的要纳入预算管理。

第二，控制支出规模，调整支出结构。一是要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控制支出规模，地方财政不打赤字预算。二是要坚持有保有压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要保证政府正常的公共支出需要，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价格补贴等要逐步取消。三是要将预算内、外资金通盘考虑，建立综合财政。

第三，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控制财政风险的重点和难点在地方，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组建城建、交通、教育等方面的政府投资公司，并通过投资公司来融资，使政府的债务更加隐蔽，更加难以控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不能放任自流，国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性质的各种投资公司的监管，从源头上对地方债务进行监管。

第四，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债务，不仅要还本，而且要付息，国家应以地方财政收入为依据，规定地方政府负债比例，实行规模控制，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同时，对债务，政府应单独预算。短期债务主要用于弥补赤字，中长期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真正发挥债务的功能，减少债务风险。

第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坚持“抓大放小”的原则，对小型国有企业，应实行关、停、并、转；对大中型企业，应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组成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应积极倡导资本经营，发展大企业集



团，增强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

第六，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国家应通过资本市场，适当补充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金，提高国有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后，应加强内部管理，增强成本观念，提高经营效益。





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初期，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个较高的速度，尤其



是我国在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粗放经营也是不可避免的。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其中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多年保持在 10 个百分点以上，这样高的速度也是世界各国罕见的。但这种速度是建立在高投入的基础上，不仅造成了我国经济时冷时热，波动剧烈，经济结构雷同，而且也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任其发展，必然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直接关系到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

发展经济必须和国情结合起来，而我国发展经济的条件是人多地少，人均资源缺乏。经济发展必须走“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的路子，走“节能减耗”的路子。早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我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党的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我们党和政府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发展规律基础上确定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基础工业、加工工业之间的关系等。当前，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从培育主导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着手，以改变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雷同、产品结构雷同的现状，克服盲目布点、盲目发展的弊端。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科技、资本、劳动是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在一些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50% 以上，而我国远低于这个数字。加快科技进步，必须增加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速我国现有企业设备的更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同时积极发展科技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生产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扩大经济规模。市场经济讲究规模经济效益，在一些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拥有一批经济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竞争能力强的大型企业及特大型企业，这是市场竞争的需要。我国也应通过改革、改造、改制、改组的形式，以骨干企业、名牌产品为龙头，培养一大批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的大型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以一批大型企业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强科学管理。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生产力。按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能源来比较，我国企业的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也是高的。因此，我国不少企业在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大有文章可做。加强管理，应推广先进的管理方法，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浪费，提高效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劳动者素质的竞争。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但我国劳动力素质偏低，仍存在着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难以推广。提高劳动者素质，必须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规范高等教育。





大力发展资本经营

随着国家创业板市场的推出，一种新的资本扩张方式——资本经营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这对鼓励创新、推进科技进步，推进科技型、创新型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所谓资本经营就是通过资本的运动和资本形态的变化，实现资本增值的经营活动，即通过资本的运动和资本形态的变化这一手段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资本经营主要通过兼并、联营、租赁、合资、控股、参股、拍卖、破产等途径实现的。

资本经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基本经



营方式，它的出现，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发展资本经营有利于促进两个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关键的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发展资本经营，就能发挥资本由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的本性，就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发展资本经营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等。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优化资源配置。而发展资本经营，通过兼并、联合、破产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使优势企业、产业迅速发展，劣势企业、产业自然萎缩，从而达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发展资本经营有利于减少经营风险。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企业为了防止经营风险，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必须走“一业为主，多业经营”的综合经营之路。而发展资本经营，企业可以通过兼并、控股、参股等形式，发展多种经营，就能降低经营风险。

发展资本经营有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方面由于重复建设，盲目发展，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大量的国有资产白白浪费了。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建设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资本经营，将国有资产的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使闲置的生产设备重新运作起来，再投资到急需发展的企业和行业上，不仅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且能达到国有资产的增值。

资本经营在我国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为了使资本经营能顺利推进，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一，明确资本经营主体。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所有，但又存在所有者主体缺位问题，影响了资本经营的发展。作为资本经营的主体必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承担资本保值增值的职责，并受政府监督的市场主体。当前，应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资本经营主体。国家可成立专门的资产经营公司，也可将行业主管部门改组成资产经营公司，还可给予大型企业集团试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来行使资本经营职责。同时，要鼓励非国有企业的资本经营，国家要为非国有企业的资本经营创造条件，实现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

第二，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本经营中的作用。资本市场是资本经营的场所，要允许各类企业都有机会参与资本经营，实现共同发展。尤其要鼓励科技创新，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应用。要发挥资本市场的“孵化器”作用，为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第三，加强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管理。在资本经营过程中需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此，应当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而作为社会中介机构的资产评估公司必须执业公正，对国有资产要科学地进行估评和定价，对有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发现，必须严厉查处，直至取消评估资格。

第四，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资本经营必然涉及劳动力的合理安置和职工的再就业，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与之配套。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起涵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经济结构 调整提升经济素质

经济结构不仅包括产业结构，也包括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甚至包括所有制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但是，要实现经济结构合理，生产的产品质量高、能耗低，以少的投入得到大的产出，取得经济效益最大化，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



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性，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加突出，表现在产业趋同化，产品雷同化，经济规模偏小，生产设备落后等方面。一些地方热衷于搞“大而全、小而全”，“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到处可见。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导致了资源浪费，效益低下，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调整经济结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素质，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调整经济结构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抓住经济结构中的产业、产品、组织、技术结构四个重点，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贯彻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一是要把好投资关，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农业、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上，增加投资力度，缓解瓶颈制约；二是抓好产业的升级换代，通过增量带动资产存量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清理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三是要防止新的重复建设。发展支柱产业，必须结合地区优势，包括地域、资源、人才、科技优势等，防止以加强支柱产业为特征的盲目重复建设。

第二，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产品的竞争。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必须根据“生产一代、开发一代、试制一代、储备一代”的原则，开发新产品，生产“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产品，不断填补市场空白，满足市场需要。同时，要树立名



牌意识，严把质量关，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

第三，抓大放小，调整组织结构。国家应重点抓住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促使企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以增强企业的经济实力。对小微亏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并转，以盘活资产存量。

第四，以科技为先导，调整技术结构。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一些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50% 以上，而我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我国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加 快 推 进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提高经济素质，必须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回顾国有企业改革，从减政放权、减税让利到制度创新已经历 30 年的历程。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了不少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部分企业资金短缺，设备老化，负担沉重，效益低下，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如



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尽快摆脱困境，已成为当前国有企业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难题。

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明确指导思想。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把公有制性质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明确改革思路。要着眼于搞好整体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要想搞好每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抓大放小”的思路，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与此同时，要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和科学管理。

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防止“急于求成”。搞改革还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一蹴而就。各地推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应从企业实际出发，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要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对各种改革思路，如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资本结构，大企业集团等，政府应给予引



导，应先试点，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再推广，不能“一哄而上”，更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搞“拉郎配”，强制推行，这样只能适得其反。

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同样，国有企业改革，也需要各项改革的配套。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重点管好宏观，放开微观，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二是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并将国有资产从实物管理转向价值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统一的养老、失业、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加快实施再就业工程。





必须重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

经济效益就是所得和所费的比，追求经济效益，实现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的目的。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同样要求讲究经济效益，以实现资本价值最大化。

我国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财政收入的大头来自国有企业，大量的



城镇职工在国有企业就业，而且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导产业、主导行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国有企业仍占绝对比重。但是，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面临着一个突出问题，经济效益下滑，虽然国家每年都采取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效益下滑非但没有制止，反有继续下滑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整体利润下降，相当一部分企业亏损，甚至有些企业发不出工资。这不仅造成了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而且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并没有下降，无非是发生了转移。由于国家价格调整，提高了农副产品等上游产品价格，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向农业部门转移；由于国有企业上交比例高，流动资金长期得不到补充，国有企业的负债高，利息负担重，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向银行部门转移；由于实行新的财务会计制度后，提高了折旧水平，使国有企业的利润转为折旧；由于政府各部门向国有企业开征了各种基金和收费项目，也使利润发生了转移，等等。

不可否认，的确存在国有企业利润向农业、银行等部门的转移问题，但这不是国有企业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导致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是设备老化，管理落后；二是离退休职工多，社会负担重；三是结构不合理，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四是体制上的原因，机制不灵活。

作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应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最大化目标。只有经济效益提高了，才能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才能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国有企业



的经济效益。

要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按照“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职责明确、管理科学”的要求，重点抓住一批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改造成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明确投资主体，分散投资风险。二是要加强企业管理。国有企业必须转变观念，改革计划体制形成的等、靠、要的想法，面向市场，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机制，全面加强生产、技术、质量、财务、销售的管理，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开支范围和标准，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三是要加大技改投入。市场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产品的竞争，国有企业要生产出质高利大的产品，必须加大投资力度。在此基础上，开发市场需要的产品，提高产品档次，创造名牌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四是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建立涵盖面宽、范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





推进再就业工程 建设的财政作为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少企业停产甚至破产，企业职工裁员下岗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这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引导、保护和发挥好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充分就业政策，国有企业存有大量的富余人员，隐形失业严重，导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能否完善安置，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是现实的问题，也是长远的战略问题。

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施再就业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同时，也要积极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

第一，推进再就业工程建设，财政要积极筹措资金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保障水平低，还不能完全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所需的资金应由政府、企业、社会共同负担。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积极筹措资金，纳入预算，做到专款专用。

第二，推进再就业工程建设，财政要积极参与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社会的“稳定器”，其核心内容是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游离于财政之外，缺乏财政参与管理力度，影响了资金的安全和完整。作为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财政，应积极参与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一是要加快开征社会保障税，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二是要将社会保障资金



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三是社会保障资金的结余部分，要用于购买国债，杜绝风险投资。

第三，推进再就业工程建设，财政要扩大公共投资，增加就业渠道。随着我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实现，我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这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需求不足，社会就业压力大。为了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的实现，需要增加政府的公共开支，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国家财政应筹措一定的资金，如扩大国债规模等，增加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原材料等公共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渠道。

第四，推进再就业工程建设，财政要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实现充分就业，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优惠的财政货币政策，如税收优惠等，给予扶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扶持再就业，一是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就业费，用于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二是对各类企业安排下岗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如所得税减免；三是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的，给予税收上扶持。





贫困地区财政要振兴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扶贫是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努力，扶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世界扶贫做出的重要的贡献。1978 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为 2.5 亿人，2007 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存量为 4320 万人（2007 年我国公布的绝对贫苦标准是人均年收入 693 元），其中绝对贫困人口 1479 万，低收入人口 2841 万。但是，我国扶贫标准是低水平的，倘若按照年纯收入 1300 元新的贫困线标准衡量，全国贫困人口将增加到



8000 万。扶贫的任务仍然艰巨。

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地区，要解决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扶贫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如何加快这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振兴财政是当务之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贫困县来说，要发展经济、振兴财政却是困难重重，就发展经济来说，贫困地区大多都在山区，“开门见山、出门爬山”是那里环境的真实写照，不仅造成贫困县交通落后、通信不便、信息不灵，而且吸引不了资金和人才。贫困地区的这些“先天不足”，使得它们在与发达地区的竞争中落后了，发展经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的振兴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落后的经济使振兴财政成为一句空话。要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振兴贫困地区财政，首先必须解决好贫困地区发展经济中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问题。在人才问题上，应在工资待遇上适当倾斜，并在他们的子女上学、就业上给予照顾，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以便他们安心在贫困地区工作，愿意到贫困地区工作。在资金问题上，贫困地区应重点发展乡镇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努力挖掘民间资金潜力，积极吸引外来资金；与此同时，国家的信贷资金要给予照顾。在技术问题上，贫困地区应积极加强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合作；在信息问题上，贫困地区应在发达地区设立窗口，了解各地市场信息，以生产市场适销产品。

其次，要理清扶贫思路，处理好“输血”和“造血”的关系。国家给贫困地区“输血”，是为了培养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扶贫办法进行摒弃，在扶贫资金结构安排上，应采取新的策略，一是专项扶贫，投于基础

设施建设；二是项目扶贫，通过给贫困地区引进项目、产品，发展民营、合资企业等途径，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

再次，对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贫困地区的环境都十分差，而有些地区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过重大贡献，在经济建设年代却落后了。对它们，如实行和发达地区相同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发展速度。因此，应对贫困县实行特殊政策，促使它们早日脱贫，一可实行特殊税率，适当低于其他地区；二可继续保留减免税，以增强贫困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三可实行特殊的财政体制，对贫困县因实行特殊税制而减少的收入，由上级财政给予补贴，以解决贫困地区的“吃饭问题”。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交易量和交易品种 申请交易附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微信进群 <http://www.7help.net>

财经研究传真经





大兴财税调研之风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来丰富和发展理论，这是我们党从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历来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作为政府综合部门的财政部门，工作有没有作为，工作有没有创新，离不开调查研究。各级财税部门也非常重视



调查研究，不少地方的财税部门也把调查研究列入干部的岗位考核。财税调研是地方财政工作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手段，是地方财政不断改革和发展的的重要途径。

第一，调查研究是深化财税改革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的财政、税收、财务、会计等财政学体系都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逐步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些改革成绩的取得，都经历过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这个过程，经历过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不断争论和推敲，达成共识，再被决策部门采纳，才得以实施的。财政部门作为政府重要的综合经济部门，许多财政政策措施的出台，来自于调查研究。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矛盾、新困难，处理好这些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后财税改革的任务仍相当艰巨，仍需要财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和追求，不断地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地从实践中吸取经验，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新框架。

第二，调查研究是转变财政职能的重要途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这就要求政府加快职能的转化，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审批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服务经济，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经济管理模式。同样，财政也要转变职能，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



财税部门掌握不少资源，财税部门的社会地位很高，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有财政周转金，支持企业发展有税收减免权，财税部门可以说是“车水马龙”，但权力往往容易掩盖了能力。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财税管理日益规范，财政逐步走向公开、公平、公正，现在的财税部门可以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仅靠权力开展财税工作已是举步维艰，财税部门必须靠能力开展工作。而调查研究是财税部门转变职能的一个具体方式，有利于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提高财政的影响力和财税部门的社会地位。

第三，调查研究是财税部门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在各级政府开展了机关作风建设、机关效能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学习等活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改变机关的工作作风。改变机关仍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风气和“拍脑袋，凭主观意志办事”的官僚主义作风。财税部门作为政府重要的综合经济部门，许多财税政策措施的出台，来自于调查研究。一个地方财税部门的领导，如果不重视财税调研工作，这样的领导是不明智的；如果觉得财税调研可有可无，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这个地方的财税工作要有创新是有难度的。随着财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加需要注重调查研究，更加需要财政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通过调查研究，实施换位思考，有利于提高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

第四，调查研究是财税干部学习财税业务的需要。财税部门不仅是政府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而且也是政府综合性很强的业务部门，要做好财税工作，不懂得财税业务，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财税业务要学习，每年出台的财税政策要学习，要领



会。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入，许多新知识要学习，如目前推行的部门预算改革、政府采购、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等都需要学习。调查研究是学习财税业务知识的重要形式，也是学习财税业务的捷径。我们平常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有些属于财政问题，有些不纯属于财政问题；有些我们熟悉，有些我们不一定熟悉，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大量的阅读材料，我们就能熟悉这些知识，对这些知识有新的认识。

第五，调查研究是培养财税干部工作能力的需要。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干部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要做好财税工作，最基本的需要三方面的能力：一是说的能力。财税部门每天要和各方面打交道，要宣传国家财税的制度、政策、法规，需要有说的能力。二是算的能力。财税部门和钱打交道，和数字打交道，财政预算的安排，部门预算的制定，都需要算的能力。三是写的能力。小的写个人总结，大的写工作总结、写汇报材料、写会议交流材料、写研究报告等，都需要写的能力。一直以来，财税部门缺少两种人才：一是计算机人才；二是写作人才（或秘书人才）。通过近几年的引进和培育，计算机人才缺乏的局面得到了解决，但秘书人才缺乏没有得到改观，各级财税部门比较缺少写作人才。而通过调查研究，可以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的写作能力。

第六，调查研究是丰富业余生活的需要。俗话说：无事生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很丰富，但如果不正确引导也容易出问题，许多干部出问题都在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属于业余时间，归个人支配，一般单位不能也不应该干涉，但是，单位可以引导，可以通过共青团、妇委



会、工会、机关党委、财税学会等组织来引导干部，利用好业余时间，丰富业余生活，陶冶生活情操，提高生活质量。而调查研究能丰富干部的业余生活，使干部把更多的业余时间用在在学习上，使干部有事做，就不会有非分之想，使业余生活过得丰富而又充实和有意义。如在浙江省财政系统提出“谦虚、务实、协调”的工作作风，要求干部做到“三个好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在工作之外，鼓励干部“远离酒桌、远离牌桌、远离尘嚣”，“走近书桌、走近球桌、走近山水”。全省不少地方的财税部门都制定办法，鼓励干部好好学习，好好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研究列入干部的岗位考核，对优秀调研成果给予鼓励，把干部从牌桌吸引到书桌，从饭馆引导到书房，这不仅推动了工作，推进了财税系统文化建设，也丰富了干部的业余生活。

总之，调查研究是财税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各级财税部门都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财税部门的领导都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带头作表率，每年把相当一部分的时间用在调查研究上；作为一名财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为了财税改革的深化、财税事业的兴旺发达，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调查研究的重任。





财税调研无捷径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调查研究相当于科学研究，从事调查研究、写调研文章的有没有捷径，答案是否定的。世上没有不费吹灰之力能够写出好调研文章的好事，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写文章的好料。如果说有捷径，也只有那些“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能找到。对各级财税部分来说，财税调研非常重要，各级财税部门的领导和干部都应加强调查研究。可实际工作中很



多人怕调查研究、怕写调研文章。问题的核心是不少财税干部缺乏调查研究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可以提高的，那么，如何提高财政干部的调研能力呢？

第一，提高调研能力的关键是学习。韩愈在《师说》里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如今，我们面临的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里，老知识不断更新，新知识层出不穷，“生命有限，知识无限”，“活到老，学到老”不仅必要，而且必须。我们已进入终身学习的时代，我们必须树立“单位的优势不等于个人的优势，个人的优势在于学习”的理念。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调查研究的能力。

那么，如何学习？学习什么呢？

一是向书本学习，学以致用。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籍是前人实践的总结，是历史的继承、文化的传承。我们一定要向书本学习，学好基本功。同时，在现代信息社会，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一定要有选择，更加注重实用主义，做到学以致用。

二是要多向高明的人学习。韩愈在《师说》里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俗话也说：强者自有强中手。当今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不可能样样精通，学术交流、学术合作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频繁。完全靠“鲁滨逊式”的个人奋斗已行不通，人与人之间要互相



切：

学习、互相合作，共同提高。

财经研究传真

三是要向实践学习，调查研究是学习的好方式。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真理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我们要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四是学习要持之以恒。董必武先生说过：“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学习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求我们树立持之以恒的学习理念，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行不通的。

第二，提高调研能力要有吃苦的精神。我们都知道，写文章需要灵感，写调研报告不但需要灵感，更多的是需要勤奋，而不是所谓的天赋。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是辛苦的工作，马克思花了毕生的精力完成了不朽的著作《资本论》的写作，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座位底下留下了两个脚印，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上倾注的顽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曹雪芹花了十年的时间，完成的《红楼梦》的写作，其中的艰辛和困苦深有体会，他也感慨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台湾作家三毛也曾说过：“饿了可以吃硬囊，困了可以睡牛棚，这样，到了四十岁，你比我富有，物质上、精神上”。这些都反复说明，写文章是辛苦的，不要寄希望有“不花时间就能写出好文章的好事”，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要有“一夜两夜不睡”的吃苦精神，多写多练，才能把调研报告写好。因此，要相信，坚持就是胜利，勤奋就是资本。只要努力了，总会有收获。

第三，提高调研能力要有创新的精神。党的十六大提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是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科技的创新，也包括文化的创新。开展财税调研，写财税调研文章同样需要创新。一篇文章好不好，关键在于创新，创新是评价一篇文章的第一标准。但创新也是相对的，因为创新本身是困难的，只能相对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而言。以亚当·斯密 1776 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为标志，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至今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算起刚刚 60 年，从 1978 年改革开放算起刚刚 30 年，从 1992 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也只有 10 多年，我国的经济理论总体缺乏创新，更多的是引进和吸收。而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也就是把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以解决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这就是创新。因此，我国财政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体现在观点的创新，体现在方法的创新，这些都是创新。

第四，提高调研能力要有想象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文化创造，没有想象力，李白写不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等光辉诗篇。同样，没有想象力，就没有科学的发现。许多发明创造来自于想象。从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现象得到启发，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其实，我们的祖先也非常有想象力，反映我国 7000~8000 年文明的河姆渡文化有个标志是“双鸟朝阳”。古人认为，太阳之所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



因为有神鸟托住太阳，这就是想象力。古人根据这种想象力，创作了“双鸟朝阳”的文化艺术。开展财税调研、写财税调研文章同样需要想象力。但这种想象力不是凭空臆造。胡适先生对文化研究提出过“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的科学论断。就是要求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现象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在联系。应该说，调查研究是长期思考的结果，我们在平常工作中要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想象力丰富了，思路开阔了，撰写调研报告也会得心应手。

第五，提高调研能力要有务实的作风。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最怕的是‘认真’两字。”开展财税调研、写财税调研文章不同于文艺创作，不能虚张声势，也不能弄虚作假，更不能凭空臆造，必须认真对待，要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有过明确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财税调研的基本要求。财税调研的求真务实也是财税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知道，财税工作是直接和钱打交道，必须要账实相符，账账相符，不允许账实不符和账账不符。同样，开展财税调研、写财税调研文章要求原创性，要求用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要真实可靠，不能估算估算。即使对第二手资料，也不能人云亦云，要刨根问到底，要有真实的出处，找到真实的出处。

第六，提高调研能力要有探索的勇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开展财税调研、写财税调研文章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要有探索的勇气和精神。在探索的过程中，要尊重权威，但不能迷恋权威，更不能屈服于权威。重要的是



要突破权威，在权威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千万不能让古人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历史重演。这样，历史才能前进，社会才能进步，财税科研事业才会日新月异，财税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总之，财税科研能力的提高，是不断积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每个人都要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从小事做起，从小文章写起，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





财税写作觅路径

如何写文章，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文章无定格，妙手偶得之”，即写文章如行云飘龙，无拘无束，没有固定的格式和要求；另一种是“凤头、猪肚、豹尾”，即写文章有固定的格式，要遵循一定的写作要求和写作规范；还有一种是“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即介与前两者之间，写文章可以有开阔的思路，大胆地想象，但也要求真务实，不能虚张声势和弄虚作假。这些主要是针对文学创作的，那么，财税写作有没有固定的格式和规范的写作要求呢？应该说是有



的。一般来说财税研究分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而我们平常工作中对财税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研究。财税调研报告和文学作品是有区别的，财税调研报告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式，但还是有一定的写作规范的。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财税调研报告如何写，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一些初写者往往无从下手。一般来说，财税调研报告的写作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只要多写多练，自然就熟能生巧了。

确立主题

从事调查研究，写财税调研文章，首先要确立主题，即写什么，这是写好文章的前提，也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一般来说，主题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作者的写作目的，通过主题来反映作者的写作动机和要达到的写作目的，即反映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使文章写得好、有价值，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确立财税调研文章的主题，至关重要。主题通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 财税改革的热点问题。应用性研究和基础研究的主要区别，基础研究主要研究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而应用性研究主要研究一些热点问题，为现实、为中心工作服务。当前，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在建立和逐步完善公共财政的过程中，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不少热点问题，如在财政管理上，要实行部门预算，建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等；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财政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满足公共需要等，这些问题都是财政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都是财政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成为财政研究的主题。

(2) 政府关心的问题。地方财税调研的主要目的在于应用，宗旨是为现实、为中心服务，主要体现为政府和部门的决策服务。只有为政府和决策部门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财政科研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体现。因此，地方党政机关和财税部门关心的问题，也是财税调研主题的主要来源。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财政如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如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支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这些问题都是地方党政机关和各级财税部门关心的问题，我们在开展财税调研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问题作为主题来研究。

(3) 实际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实际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而实际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调查研究的重点。如分税制改革以来，在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的同时，给地方财政增加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县乡财政。如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增强县乡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是中央和地方财政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财政研究的重点。又如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企业生产困难，大量的产品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这需要产业的转型升级，从高能耗、高污



染、低产出的产业转向低能耗、无污染、高产出的产业，以应对金融危机。财政如何发挥作用，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各级领导非常关心，需要各级财政部门从实际出发，加强调研，这也是当前亟须研究和解决的热点问题，是财政调研的重点。

根据主题的要求，财税调研主题的确立，是有一定的要求：

一是主题要有时代感。要和当前财税改革和发展的现状结合起来，反映财税改革和发展的最新成果，揭示财税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要和财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相一致。

二是主题要有针对性。一看到主题，就能反映主题的写作内容。主题要针对问题和情况而写，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不能为写文章而写文章。

三是主题要有地方特色。开展财税调研，一定要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不主张人云亦云，最怕提出的观点和思路“放之四海而皆准之”。虽然没有毛病，但没有特色，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对实际工作起不到指导作用。

四是主题要选小。写文章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打井”的思路；另一种是“摊大饼”的思路。井只有打得越深水才越多，而饼摊得越大就越难以下口，中心不突出。财税调研主张“打井”的思路，主张选小题目做大文章，把文章写得深、写得透。



切：

财经研究
研究
传播
真经

收集资料

作为社会科学，财税调查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追求创新，财税调查研究要求有创新，但更多的是在他人或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马克思也提出，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因此，资料收集是调查研究的重要一环，要通过报刊、网络等途径收集他人或前人的研究成果，掌握研究动态，为调查研究打好基础。

(1) 要紧扣主题收集资料。在知识经济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也很多。因此，要根据主题的需要，从众多的信息中，寻找和主题关系密切，对课题研究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或不密切的，要学会舍弃。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约时间，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调研成果的质量，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 要选择最新的资料。财税改革和实践发展很快，财税理论的发展也很快，新的理论不断产生，新的政策不断出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对财税调查研究来说，财税调查研究要有价值，必须要超前。要取得超前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必须掌握理论研究的现状，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收集新颖的资料。否则，研究的成果要么人云亦云，要么滞后，这样，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对实际工作也没有指导意义。

(3) 要真实可靠。财税调查研究不同与文学创作，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收集的资料，掌握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



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确立了主题，收集了资料，是不是就可以写调研文章了，答案是否定的。还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这是调研报告写作不可缺少的环节。当然，跳过这个环节也可以写文章，但这只能是闭门造车，只能是人云亦云，要把文章写出新意，反映真实情况是有困难的。调查研究涉及的内容很多，要规范的事情也很多，在繁忙工作中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一般来说，可以把调查研究和工作结合起来进行。

(1) 专题调研。调查研究是财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财税政策措施的出台，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一些重要的或亟须研究的主题，应进行专题调研。我们可以结合调研主题，设计好调研提纲和调研表格，根据预先设定的调研对象，通过开座谈会的形式了解情况，收集资料，或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采取问卷调查，有针对性地收集第一手资料。

(2) 日常调研。在日常的工作中调研，这应是调查研究的主要形式，也是容易做到或能够做到的。大家平时在工作中，要做个有心人，要有钻研的精神，通过一些表象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问题的所在，收集和掌握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如我们一些从事财税报表工作的同志，对每个月的财经数据，要进行分析，通过一些财税数据分析经济形势，提出一些应对举措，为中心工作服务。如我们一些从事税务稽查工作的同志，对每个月的税务稽查案件，应进行一些分析，从中能够挖掘出不少对完善税收征管有价值的资料，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工



调研报告的撰写

确立主题、收集资料、实地调查研究，这是做好财税调查研究的必备环节，是做好财税调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完成了，接下来的是财税调研报告的写作，这是财税调查研究的最重要环节，也是财税调查研究成功的关键。

(1) 拟订写作提纲。起草调研报告，必须拟订写作提纲。这是调查研究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逾越的一环，是提高调研成果质量的前提。写作提纲的起草应该在对收集的研究资料和调查环节收集的材料进行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对调研提纲的要求，能细的尽量细，不仅要有大的框架，而且对每部分的各项内容、可能碰到的问题，甚至是必要的细节，最好列出来，做到胸有成竹。

(2) 观点要鲜明。观点是财税调研报告的灵魂，好的观点，往往能起到使人看到眼睛一亮，听到耳朵一振的效果。因此，对调研报告的观点必须认真提炼，作者赞同什么，反对什么，必须要清晰，尤其是对策性的研究报告，观点必须准确、鲜明、实用，发挥调研报告的示范效用，以指导实践。

(3) 文字要精练。财税调研报告文字的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语句通顺，文字简明扼要。避免为了凑字数而东拉西扯，言之无物、空洞乏味，千万不要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4) 结构要合理。结构合理主要体现在写财税调研报告要规范。一般的应用性财税调研报告格式要包括现状、问题、对策等部分，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到不同的财税调研报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对一些重大的调研报告，还要涉及理论问题，以及国际借鉴等。但无论如何，财税调研报告结构要合理，层次要分明。从规范性的要求来说，完整的财税调研报告，“主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内容都要有，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看出作者调研报告的创新之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容易出现违反知识产权问题。

(5) 要反复修改。人们常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是有道理的。一篇好的财税调研报告也是改出来的。财税调研报告初稿完成了，并不等于财税调研报告的结束。财税调研报告要反复修改，做到精益求精。当然，财税调研报告主要靠作者本人修改，也可以请别人帮助修改，甚至可以邀请专家对财税调研报告进行鉴定，以提高财税调研报告的质量。

(7) 要避免抄袭。在网络时代，写财税调研报告参考的资料多，“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会事半功倍；用不好却适得其反。有了网络的便利条件，有些人不好好动脑筋，却想歪点子，想走捷径，大量抄袭，通过电脑拼凑写财税调研报告，这不仅不能起到解决问题、探讨思路的效果，反而败坏了学风，甚至会导致身败名裂。最近，不断揭露的学术抄袭案件，应引起大家的注意，千万要避免抄袭。





财税课题研究不神秘

每年各级财税部门都要承担一定课题研究，有些课题是来源于政府布置的，有些课题是上级财税部门布置的，有些是社科基金争取的，有些是财税部门本身提出的。不少单位和个人对财税课题研究有恐惧感，不敢或不愿意承担课题研究。那么，财税课题研究有什么要求？财税课题研究和财税调研有什么区别？这是做好财税课题研究应该要了解、明确的，也是做好课题研究的保障。



财税课题研究的基本要求

财税课题研究和一般调查研究的区别是，课题研究是集体的研究，是集体劳动的结果，处处体现集体的智慧。课题研究体现了合作上的分工，分工上的合作。因此，财税课题研究要成立课题组，制定课题研究计划，明确课题研究的分工。

(1) 成立课题组。课题研究要成立课题组，这是课题研究的基本要求。课题组有什么要求？应该说课题组没有固定的模式，但考虑到地方财税部门主要从事的应用性研究，研究是为财税部门的行政工作服务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课题组还是有要求的。课题组一般要求由行政领导担任课题组长或负责人或牵头人，课题组成员原则上要求3人以上。因为由行政领导担任课题组长，课题研究更能够得到领导的支持和指导，课题研究的成果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地方财税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2) 制定研究计划。研究计划是整个课题研究的大致框架，要明确课题研究的目的是，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效果。同时，要明确课题的性质，是临时课题，还是年度课题，或是跨年度的中长期课题；是单位内部课题，还是上级部门布置的课题，或者是有关部门争取到的课题；以及课题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

(3) 明确课题研究的分工。总的来说，课题研究是集体的劳动，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大体的分工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一个人起草课题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集体进行讨论修改，

最后由课题组组长定稿，这种研究主要适合一些小课题的研究。二是由多人分头起草。对一些大课题，根据课题的要求，可以由几个人分工起草课题报告，再指定课题组的具体成员进行统稿，在此基础上再由课题组成员进行讨论修改，最后由课题组组长定稿。

(4) 要采取多种课题协作的形式。财税课题研究，即要有理论的要求，也要和实际密切结合，重点在应用。根据课题研究的要求，课题研究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一是科（处）室之间的合作。主要是财税部门内部，整合资源，科（处）室内部或科（处）室之间进行合作研究。二是上下级财税部门之间的合作。有些课题，由上级财税部门牵头，又需要下级财税部门合作，或提供资料，可以采取上下级之间的合作。三是实际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财税部门有些大的课题，可以邀请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一起参与研究，借用外力，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研究。

(5) 要发挥学会在课题研究中的作用。地方财税学会是从事财政税务理论和实际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是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在财税课题研究中，地方财税学会要发挥好组织者、协调者、参与者的作用。一是组织者。作为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财税学会要发挥联系面广的优势，根据财税部门的要求和课题研究的需要，组织财税部门的有关科（处）室和有关财经院校，积极参与课题研究，承担起课题研究的组织职能。二是协调者。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财税学会要协调好科（处）室之间的关系、领导和科（处）室之间的关系，以及财税部门和有关财经院校之间的关系，使课题研究能顺利开展和按期保质完成。三是参与者。财税学会除了发挥好组织者和协调者



的作用外，还要积极参与课题的研究，发挥好财税学会服务中心、服务现实的作用。

财税课题研究经常出现的问题

课题研究是财税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财税部门的课题研究也参差不齐，完成的课题成果质量也高低不一，有些课题成果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分析不透彻，论证不充分。课题研究必须要以理服人，要有理有据，既要有面上的分析，也要有典型的调查。而我们有些课题成果，要么问题、原因分析得比较充分，而对策苍白无力；要么问题提得很好，而分析又不充分。有不少课题成果提出的对策要么缺乏可行性，要么缺乏新意，甚至脱离实际，这些问题都影响了课题研究质量。

二是没有地方特色。课题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主要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用来指导实际工作，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是课题研究的灵魂。而有些地方的课题成果，课题雷同的多，有特色的少；观点大路货的多，创新的少；面上的分析多，点上的材料少，从而使课题研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是文字数量少。课题研究不同于写评论文章，也不同于写一般的调研文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课题研究的基本要求。而我们有些地方财税部门完成的课题成果非常短，只有一二张纸，文字上只有 1000 ~ 2000 字，这样，就难以把问题讲清楚。

四是没有抓住热点问题。课题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开拓

财税工作的思路，课题研究必须和当前财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结合起来。而有些单位完成的课题成果总是老生常谈，每年完成的课题成果变化不大，没有根据变化的财税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研究思路，研究新问题，导致课题研究的成果质量也大打折扣，难以发挥好作用。

五是完成的课题成果地区分布不平衡。每年地方政府和上级财税部门都要把有关课题布置到地方财税部门和有关财经院校进行研究，但各地对课题研究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课题研究开展的情况不一。有些地方财税部门领导比较重视，不仅抓好重点课题研究，甚至要求每个科（处）室都要承担课题研究，并把课题研究列入岗位考核，课题研究成果完成的数量比较多，质量也比较好。而有些地方财税部门完成的课题成果数量较少，有些单位甚至没有开展课题研究。

财税课题研究要规范

课题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课题研究一定要规范，通过课题研究既要达到研究问题、厘清工作思路的目的，又要达到加强合作、提高研究水平的效果。为了把课题研究搞得更好，避免少走弯路，要把握好几点：

（1）要选好题目。搞课题研究，既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文不对题，更不能偏题，选好题目是课题研究的前提。如何选好题目，好选题的标准是什么，固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至少要体现是不是当前财税改革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是不

是地方党政机关和财税部门关心的问题，是不是代表经济发展、财税改革的方向，等等。

(2) 要理论联系实际，有地方特色。理论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作为地方财税部门搞课题研究，必须走理论联系实际之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课题调研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志，也是地方科研的优势。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同时，要选择有地方特色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样，完成的课题成果就有声有色，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3) 要有数量上的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课题研究应该采取的研究方法。财税部门替政府当家理财，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的。财税部门开展课题研究，除了要有定性的分析外，更要有定量的分析，离不开数量的分析。要通过数量上的分析，甚至是精密的计算，把问题讲清楚，以理服人。

(4) 要有一定的文字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正确、逻辑严密、结构严谨、文字精练，这是写课题报告的基本要求。但课题研究不同于写一般文章，搞课题研究，既要有面上的分析，也要有典型的分析；既要有质的分析，又要有量的分析；既要提出问题，也要分析问题，更要解决问题。因此，课题研究成果文字上需要有一定的容量，上万字的课题是常有的，有些课题成果甚至是一本专著。那种只有 1000 ~ 2000 字的成果，只能算是一般的文章，不能算是课题成果。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经济学能走近 普罗大众吗？

记得儿时，父母常常会教我们背一些唐诗宋词，比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等等，这些诗词我们往往会脱口而出，它们常常伴随我们终身。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魅力，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优势，这些也可以说是中国小孩最早的启蒙教育。



这些传统的文化为什么会流芳百世、源远流长？我常常思考这些问题，也往往百思不得其解。人生阅历的增长使我明白，核心是因为这些文化元素已走进普罗大众，流入我们的血液，融入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进入财经学院，开始接触经济学。大学毕业后，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从事了财经工作。不知不觉，接触经济学一晃已二十余年，虽然对经济学还不能说耳熟能详，也不能说自如地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但是，作为一位经济工作者，怀着使命感和责任感，尽量不荒废光阴，在经济学的世界里，与经济学共舞，积极参与财经问题的调查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尽心尽力，也希望自己能在经济学的领域有更多的话语权。

近二十年的财经工作，我发现了不少现象，经济学的文章越来越长，经济学的书籍越来越厚，经济学书籍的销量越来越少，很多书只有几百册、几千册的销量，不少书还是作者自己购买，即所谓的自费出版。不少人即使买了经济学书籍，往往也束之高阁，装饰门面。经济学的书籍成了摆设，经济学书籍离普罗大众越来越远，这不知是经济学者的不幸，还是经济学的悲哀。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经济学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经济学，我们的社会离不开经济学。中国有13亿人口，经济学书籍应该有广阔的市场，而我们的不少经济学书籍的销售往往只有几百册、几千册，为什么？这需要好好反思，是我们的作者出问题，还是我们的读者出问题？难道是现代社会不需要阅读，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人们没有时间阅读？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看来还是应从我们的作者中



寻找原因。

这几年因电视媒体的宣传，上“百家讲坛”而走红的文化名流，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易中天的《品三国》第一次就印了55万册，而于丹的《论语心得》第一次更是印了60万册……这些无不令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羡慕不已、感慨万千。这些文化名流成功的关键在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们用生动形象的语言，风趣诙谐的事例，把枯燥无味、高深严谨的历史人物、文化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趣味横生，引起读者的共鸣，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同样，这几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茶座》，以其清新高雅、风格别具的特点，用普通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交流、阐释大家相互关心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信息，受到了众多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被誉为“经济学领域的院士科普书”，在经济学队伍中影响广，书的发行量也大，成了不少读者茶余饭后的休闲读物。

我认为，《经济学家茶座》的成功，主要是我们经济学者改变了研究问题的方法，把一些复杂的经济问题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不仅同行能明了，普通的读者也能看明白，即“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对一些简单的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运用所谓的经济学术语，故弄玄虚，云里雾里地绕一大圈，把读者看得眼花缭乱，最后又回到原位，不少读者看得是糊里糊涂。结果是：问题可能没有好好讲清楚，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使经济学失去魅力，经济学失去了大众。

我们的经济学基础研究，需要高深的理论，即所谓的“阳春白雪”，这是经济学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下里巴人”，这是经济学普及的需要。自从1776年亚当·斯

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就是发展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 30 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越来越热门。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经济学开始在世界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被世界银行推为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潮流，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应该承担起“经世济民”的重任，让经济学走进普罗大众，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责任和义务。

在这方面，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应该好好学习古人。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但古人对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认识在某些方面不亚于现代人，留下了许多富有哲理的经济思想。如关于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有“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关于人的自利性问题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关于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如关于节约粮食问题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关于重税对经济社会的破坏有“苛政猛于虎”；如关于百姓负担问题有“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人君口”，等等。古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揭示，涉及经济方面的思想，没有高深的学问，语言简洁且富有哲理，人们一看就能明白，就能记住，印象深刻，难以忘



怀。原来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可以这么写，真可谓经济学像诗一样，多么美妙，多么洒脱，这应该值得我们现代经济研究的反思。

其实，对我们的文风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了。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指出：“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不可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具有生命力。”这同样适合经济研究。

当然，经济学是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社会科学，主要用于“经世济民”，解决社会问题，经济政策要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有不少是应急性和时效性的，经济学的生命力可能没有文艺的生命力强，但经济学要保持生命力，也要有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要和我们的文化结合起来，要和我们的社会和大众结合起来，经济学的影响才能进一步扩大，经济学走进普罗大众才有可能。

这几年，我对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新的尝试，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在研究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更多地结合人文精神，运用一些人文术语，把经济术语和人文术语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报告的可读性。这种研究，刚刚开始，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支持，希望有好的效果，也希望不要偏离经济学的方向，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参与。

哲学大国、数学王国成就了德国人的严谨，文学大国成就了法国人的浪漫，科技大国、教育大国成就了美国“硅谷”。



的辉煌。如果中国在经济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强国的同时，又能成为经济学大国，经济学和中国的经济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如果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能更多地从人文角度思考经济问题，更多地从民众接受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那么，经济学走近百姓，成为百姓大众的精神食粮，应该不再遥远，指日可待。

一家之言，姑且为之，代后记！

余丽生

2009年8月30日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新思维

财经 新思维

CaiJing
XinSiWei

ISBN 978-7-5058-7990-4

定价：22.00元

ISBN 978-7-5058-7990-4



9 787505 879904 >